

◎ 温 任 平

文化人的心事

一个对自己有企求的知识人，凭著气魄承担与淑世襟抱
观照华人社会文化，剖出事物的精灵
描绘情境的脉络，书写世纪末情调



温任平，

1944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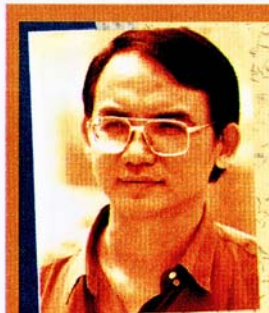
著名诗人及专栏作家。

著有诗集3种：

《无弦琴》

《流放是一种伤》

《众生的神》



散文集2种：

《风雨飘摇的路》

《黄皮肤的月亮》

评论集4种：

《人间烟火》

《精致的鼎》

《文学观察》

《文学·教育·文化》

曾于1981年与音乐家陈徵崇策划出版国内第一张现代诗曲的唱片与卡带《惊喜的星光》。

他也是《马华当代文学选》的总编纂。

曾任天狼星诗社社长，

推广现代文学运动甚力。

他也担任过大马华人文化协会语文文学组主任及

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研究主任。

现于星洲日报撰写“静中听雷”专栏。

大将观点 04

文化人的心事

温任平 著



大将事业社 出版



大将观点 04

文化人的心事

作者：温任平
策划编辑：徐婉君
封面设计：史美星

社长：傅承得
发行人：傅兴汉
行销顾问：林谷焯
创意顾问：游川
法律顾问：王瑞隆律师
业务经理：何明燕、郑敬源
出版：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发行：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Gr. Flr., Vision Learning Centr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 L., Malaysia.
Tel: 03-2066288 Fax: 03-2066266

E-mail: mentor@po.jaring.my

印刷：Oriengroup Sdn. Bhd. (211571-M)

初版日期：1999年10月20日

定价：RM 20.00

版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9768-38-7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Woon, Swee Tin, 1944-

[Wenhuaren de xinshi]

文化人的心事 / 温任平著

(大将观点：4)

ISBN 983-9768-38-7

I. Malaysia essays (Chinese). I. Title.

II. Series: Dajiang guandian; 4

895.1452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出版缘起

留住历史的记忆

在马来西亚，许多肯思考、有理想或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和无奈：不论是过去或现在，都不易找到本地内容的中文论述。残缺不全的剪报、零星散乱的出版，象征我们的历史记忆：片纸只字、鸿毛麟爪。先辈挣扎求存，无暇为我们留下珍贵的记忆；这一代呢？打算让后人承传什么？了解什么？

因为历史长期空白，因为记忆归零，所以根源不足珍贵，错误不断重演。从政、经、文、教界到社团，“旧病复发”或“重新开始”的例子，比比皆是。最后导致的，不只是时间、精力和资源的浪费，还包括聪明才智的错用与年轻一辈信心的丧失。但是，谁来书写历史的记忆？谁来留住历史的记忆？再一次，我们“等待果陀”？

大将事业社的答案是：你。活在当下的你；参与历史的你。书写历史的你；阅读记忆的你。

我们决定开辟“大将观点”书系，留住华社知识份子思想与言论的精华。因为在时代的大洪流里，知识份子始终是国家和社会的中流砥柱，始终代表著道德良心与真知远见。大将事业社虽限于能力、举步维艰，但没有这一步，永远没有下一步；不先留住当代，便可能沈入历史的深渊。所以，在这项庞大艰辛的回忆建构工程里，我们决定先留住最光辉耀眼的部份：智慧。也因为里头不只有过去，还有将来。

但我们的答案，仍然是你、在你。

就像大将事业社的命名，是希望国家和华社出现更多的大将：“大将观点”书系，要留住历史的记忆，便得有书写和阅读的基础。否则，观点归零后，又是等待未知的开始。而我们究竟还有多少时间和机会？

所以，亲爱的朋友，请来留住历史，共创未来。

大将事业社社长 傅承得

序

张景云

翻阅温任平这部文集，首先想到写专栏的辛苦，不是要赶截稿时间，而是要时时保鲜，让读者一再而三的产生惊喜。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人的心事》所收的文章，温任平在知识和观念上能不断保鲜，尽管这些篇什都是大约10年前的旧作，间中社会与文化环境不断变迁，细心的读者决计不会有吃馊饭的感觉。

在这一系列特约评论之前，温任平在80年代初已经写过一些短文，脱下文艺人的长袍，走出文学的殿堂——对他来说，现代文学确是一座圣殿——抒写他对某些社会文化现象的看法。1988年到1992年的这系列文字，是他更刻意的跨出文学界域，企图用一个文艺人的性情去观照华社若干社会文化“世纪末情调”的努力。

“世纪末的情调”之所以颓废，因为新旧文化价值并峙而不能相融，今天人类的处境更加孤绝，“后现代”也仅道出其中部分面向。温任平10年前有选择性的用孤立聚焦的手法“评击”某些社会文化现象，所用的是随笔的体裁和笔调，但却能跨越这个局限，参考宏大，观察入微，尤其言浅意深，启发读者作更深远的思考。

跨出文学界域的温任平，在这60余篇短评里讨论的课题涵盖几个领域，如社会文化潮流、商业社会趋势与消费文化、微观文化、马华文学的内外条件，以及社会与生活观念，跨度大固然是其整体特点，评论大多数越界课题时都能保存作为文艺人的自性与本色，和而不同，又不著头巾气，这是尤为难能可贵之处。

这些文章使我想起Roland Barthes一系列以Mythologies为总题的短文，Umberto Eco后来也有类似的发挥，学理哲思都很“后现代”，是晚近西方文化界少见的精品。这个联想不是比较，那样说将是不伦不类，我只是觉

得马华文化界应该有人做这种小事、写这类小文章，剖出事物的精灵，描出情境的脉络。中华文化圈里也有不少学人小品，多数是以情调取胜的新瓶旧酒，令人有“叫中华文化太沉重”之感。

中华文化圈子里，人们以情调为启灵剂，跨出文学界域的温任平至少窥识到其中有一种Aldous Huxley所说的“思想禁欲状态”，这应该是催促他写作这系列文字的动机。

看温任平谈超级市场社会学、形象与促销、新贫阶级与新富阶级、弹性工时、职业中途异离发展等等工商社会与消费文化现象，而文字上没有丝毫顾盼之态，应该说是马华文化的一大造化：一个爱惜羽毛的现代诗人走下了十字街颈。譬如他分析“经验工业”时有如下洞见：

“如果大人先生们觉得这种寻梦行为迹近儿戏，他们其实说中了大部分事实，许多经验工业都有游戏的色彩，……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提供超乎实用层次的心理附加价值，……包括自豪感、新奇感、美感与快感以及不同程度的参与感。”

我个人比较喜爱他厘清若干社会与生活观念的篇什，譬如谈观念人与行动人、生活需要设计、学习爱自己、成就动机背后、对命/运的健康迷信观，其中一篇说“何必耻言名利”，在观念上完全没有头巾气。我不能说自己认同他的全部看法，但是这里边有不少篇文章，在辨谬匡执上是很 有意义的。

温任平难免对文学情有独钟，集中关于马华文学的文章大约有10余篇，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而这些文章所处理的课题，皆是文学的社会与文化面向，可说是周延的外篇，因此将它们收在集子里，倒没有不能合流的问题。他谈文学作“秀”、作家从政的“机会成本”、文学结社与同仁杂志、校园文学以及文学出版业，或言人所未言，或见解独到，今天读来仍不失其意义，对将来的读者也会有参考的价值。

综观这60余篇文字，不难发现温任平在某些课题上的先见之明，譬如在〈一个文化人的两件心事〉中建议把茨厂街一带发展成历史保护区，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老屋活用式的保护法，赋古迹予现代社区生活意义。他

也喜谈文化热门现象，热眼热心，譬如他所说的“新山模式”，以及后来称为儒商的“新商人”，姿态和见地都颇得体，化争议为无争议。

温任平的读者都知道，他是一个对自己有企求的知识人，在《知识份子的灵魂搜索》中，他指出知识份子的特质在于“气魄承担”，对华社知识份子提出诸多崇高的期许，显见他本质上是乐观者。若不是乐观者，然而为了激扬正气，让社会呼吸到更多光明与纯洁的思想，文思不期然朝那方向走，在我这个厌世者看来，就觉得这种淑世襟抱更为可敬了。

1999年9月

（作者现任南洋商报总主笔）

自序

《文化人的心事》是我的第10本个人结集，收入1988年迄1992年在南洋商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共63篇。我没有根据文章性质分辑，而是顺著它们的发表日期排次，这种排次或更能让自己与读者看出这5年内个人观察、思考的某些发展脉络。

我个人甚少热题热写，我不想这些评论随著事件的过去成了朝尸烂报。即使华社与政党现象这些容易事过境迁的问题，我也会依循其根源症结（root cause）下笔，像我谈：情势律、同命感、患难意识、互信共识诸课题，置诸今日华社背景来审察，也许仍有其一定的意义。

其他评论内容从观念人、行动人、感性消费、生活设计、机会成本到新贫新富、牛群直觉、孤岛关系、集体领导、灵魂搜索……牵涉的多是概念／观点的议题，有它们的普遍性，不致有过时之虞。一些评论反而有点像在“预先透露”（foretelling）社会的某些新形态，像弹性工时、炫耀性消费、复古情调之汇为某种潮流／时尚，都是些信手拈来的例子。

即便是就特殊事件发言的文章，如《十二月的舞展及其他》、《全国大专文学奖评审有感》、《三十而立的现代文学》、《科威特经验的启示》等篇章，除了现象的陈述，里头也有某些“馀弦”（naunce）——我不敢说那是微言大义——给有心人去聆听体会。

特别要在这儿一提的是发表于89年5月26日的《北地忍不住的春天——谈当前的中国学运》，我在文章中摘录老作家巴金在《家》的一段人物底内心独白：“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们？难道爱国真是一种罪？纯洁、真诚的青年真是国家的祸害？觉慧不能相信。”我也提到“学生是爱国者，我爱学生。冰心”的标语。文章发表后一周，六四血腥镇压爆发。《北地忍不住的春天》成了一个不祥的预告，北方铺天盖地而来的不是初春，而是慑人心魄的冬寒，幽魂似地久久不散。

撰写特约评论的那段日子，恰好读著詹宏志、刘大任、汉宝德、高希均、孙震、马森几位先生的著述，部份文章的创作冲动与意念启发，可能来自他们的刺激（我尤其佩服詹宏志先生的前瞻能力），加上自己对国内／区域情况的观察了解，有所感乃撰写成篇。一些观点则引申自 Alvin Toffler、John Nasbitt 等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型变底估测。亚洲社会与先进西方国家难免有文化性的／结构性的歧异，不过我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别人的看法仍可借镜，供我们参照。

我对自己的了解是，我有不务正业（如果文学是正业）的倾向。从“特约评论”题材内容的庞杂，读者即不难窥见一斑。从创意促销到密宗修行，从劳资利益到经验工业，从演讲做秀到饮食文化，都是我有兴趣探测的场域。吾非通才，却常有踰界的企图与野心。

而南洋商报的“特约评论”恰好提供了一个绝佳园地，让我跨界，或夸夸其言，或吐露心事，十分过瘾。这儿应该感谢当时的商报总编辑张木钦先生对我的爱护与容忍。现任商报总主笔张景云先生也于百忙中为我写序，使拙著生色不少。还有傅兴汉、傅承得的鼓励，曾瑞燕、谢川成的支持，使我有机会把这些同一单元的评论文字，整理出版，都应该一并向他们申谢。

目录

出版缘起／傅承得／3

序／张景云／4

自序／7

消弭戾气·重建华社／13

观念人与行动人／16

青少年“次文化”的省思／18

根源性的文化交流／21

内忧外患的马华文学／24

在分歧中寻求共识与互信／27

生活需要设计／30

青年参与社会服务的意义／32

从“期待超人”到集体领导／34

“超级市场”社会学／37

克服害羞·善遣寂寞／40

文学做秀意义何在？／43

人海中的孤岛关系／46

我看武侠小说／49

让电视每周放假一天／52

12月的舞展及其他／55

何必耻言名利／58

有“言”千里一线牵／61

“感性消费”初探／64

67 / 学习爱自己
70 / “全国大专文学奖” 评审有感 3
73 / 观念与创意的世界
76 / “新贫阶层” 的动向
79 / 形象与促销
82 / 新富阶层的符号与特征
85 / 作家不是 E.T. 4
88 / 谁是杜佛勒 ?
91 / 弹性工时与社会新形态
94 / 文化建设需要商界挹注
97 / “牛群直觉” 与股市动向
100 / “急功近利” 面面观
103 / 成就动机背後
106 / 平心论 “女强人”
109 / 寻梦者的乐园
112 / 北地忍不住的春天
115 / 知识份子的 “灵魂搜索”
118 / 西式管理，中式口味
121 / “陈群川” 一词的概念传递
124 / 既要强悍，又要美丽
127 / 文化总体的微分观察 111
130 / “命” “运” 论衡

职业中途异离发展 / 133
名教 · 文字咒 · 政治权术 / 136
“机会成本” 举例 / 139
有挫折，而无挫折感？ / 142
中国象棋的文化背景 / 146 iv
现代人的 “迷思” / 149
✓ 天狼星诗社：“神话王国模式” 的兴衰 / 152 5
✓ 三十而立的马华现代文学 / 156 6
与姚新光谈相声衣钵 / 159 △
近打购物中心的文化景观 / 161
一个文化人的两件心事 / 165 ✓
✓ “核心文学细胞” / 168 67
演讲活动的省思 / 171 △
劳资利益的均衡 / 174
“情势律” 与 “突破策略” / 177
✓ “後现代主义” 的工业美学 / 180 7
华文出版业景观 / 183 △
✓ 我看马大 “校园文学” / 186 8
“丸不出盘”：新年的文化效应 / 189
科威特经验的启示 / 192
密宗：业障转化 / 195
复古潮流的社会诱因 / 198
文化社区：总体营造 / 201

消弭戾气·重建华社

没有一个以华族成员为主干的政党愿意自绝于华社。华团的意愿，马华、民行、民政的领袖不一定言听计从，但一定会郑重考虑。

重组华人新村计划搁浅

近几年来，华人社会真是多灾多难。先是马华党争延绵两载，使马华公会元气大伤。接下来新泛电事件爆发，陈群川锒铛入狱，重组华人新村的计划与理想看随著他的身系囹圄而被搁浅。

合作社风暴跟著又引爆，好些一向被信赖与赞誉的华商及名流涉嫌失信，有些已被法庭定罪，其他尚在候审。不旋踵政府发动大逮捕，又囚禁了多位政党与华社领袖。华人社会屋漏偏逢夜雨，处境凄凉，这些年来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信心与信念顿呈动摇，在这人心浮动的时刻，如何纾解华社的困境，重建自信与理想，恢复英锐之气，应该是十分迫切的问题。

变革应审慎

但是我们不能为了渴切于重建，而采取一种粗暴的态度去对待现有的华社组织与制度。如果我们以为打碎现有的社会组织结构，便可建立一个崭新的、生机蓬勃的新社会，这是极其危险的盲动思想。任何尝试解组社会的运动，都会为华社带来灾难性的危机，“破而后立”的做法，用到当前大马华人社会的重建工作上面，肯定是弊多于利的。当前的华人社会再经不起大地震那样的变革。我们只能在既有的华社结构与思想形态上，审慎地著手，看看有没有可能寻出凝聚团结族群之道。

当前的社会与政治现实是马华公会是唯一的华人政党。马华与华社之

间积怨颇深，步骤未能一致。民政党是一个多元种族政党，不过党员以华族占大多数。在野的最大反对党是民主行动党，也以华裔党员最多。民政与马华经常为了政治利益，而互相倾轧，在政府内边口和心不和。民行党以马华为第一号政敌，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看清楚了国内华社的情况，才有可能对症下药。

三党鼎立的僵局

华社目前有4千多个注册团体，以地缘性组织而言，广东会馆、福建会馆会员最多，力量最广远。丛聚组织则以各州中华大会堂、中华总商会最具代表性。这些团体宜乎召开一项联席会议，来讨论一下当前的华社处境与形势，看看有没有可能把上面的那种马华、民行、民政“三国鼎立”的僵局打破。这个僵局能打破，则民族团结有望，即使鉴于政治的利害关系，华团无法促成三强臻至什么和解或合作的方案，至少一些问题的症结会在讨论与磋商的过程中被凸显暴露出来，这也比长期把问题扫到地毯下，不去面对它好许多。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华团与政党间的对话会带来若干建设性的成果。

华团的力量

华团不在政府里头，没有政治实力，这是它的弱点但也是它的长处，因为没有政治利害的掣肘，华团较容易发挥它的协调作用。华团领袖如果寻求与马华、民政、民行的掌舵人对话磋商，三党相信也乐意参与，因为没有以华裔成员为主干的政党愿意自绝于华社，华团的意愿，三党的领袖不一定会言听计从，但一定会郑重考虑。

华团也可扮演监督的角色，当华团发现马华与民政在争取或维护华族权益未能协调，甚至互相制肘时，华团可适时地表示它的反感。去年发生的一连串关系到华教前途的风波，便出现甲党邀功，乙党企图牵制另一党有所

表现的自私作为，像这类党团至上，罔顾族族利益的行径，华团可以直接道出它的不满，让有关政党了解任何伤害到族群权益与国家利益的行动，都会受到华社的唾弃。

至于马华与民行党，要它们目下化敌为友自是不可能的。华团的介入充其量也只能提供某种缓冲与制衡。这两个政党，一个在政府里边，一个在政府外面，都可说是为民喉舌，只是方式策略均不同，如果双方能体认这事实，便可对自己底能量、作用及局限“了然于胸”，这种了解应有助于减轻存在于两党的戾气。合作或不能谈，但某个程度的默契则仍可臻至的。如果这两个政党都能处处以大局为重，则华社的分裂局面便可避免。

党团“高峰会议”

前面提到华团的召开联席会议，我觉得各社团代表除了可以讨论当前华人的政治处境外，也应探讨合作社风暴之后的华人经济地位一类的重大课题。会议可分几次召开，每次集中讨论一课题。以免“贪多务得”，要讨论的问题太多太杂，反而每项都谈得不够深入。

过去华社“时兴”召开小型研讨会、演讲会，由两三位学者发表高见作为导向，在目前这种方式恐怕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只有华团政党领袖的召开“高峰会谈”，找出问题，寻出答案，以实际的步骤克服时艰，才能为华社的重建与复兴提供巨大的动力。

23.3.1988

观念人与行动人

行动人不用把观念人视为阻手碍脚的假想敌，观念人也不必处处唱反调。

知识份子观念人，政治工作者是行动人。

知识份子以创发、传播思想观念为职志，批评时弊，对不合理社会体系内边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提出针砭。知识份子是藉其言论提醒、鞭策当局纠正政事的偏倚不当，务求社会的种种恶劣习尚减至最少，所以知识份子是社会的良心，他的逆耳忠言无非为了社会民生整体的改善。

政治工作者从事政治活动，组织政党，争取群众的支持，目的是为了掌权执政，拥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实现治国理想，满足声威需求与自我实现的愿望。政治工作者当中亦不乏才智之士，他们兼有行动人与观念人的性格特色。不过这种两者兼备的理想型人物毕竟是罕见的，即使这种理想人物在开始阶段观念与行动并重，等到有关人物拥有若干权力后，其行动人特征便日益凸显，相形之下其观念人性格则日渐褪色萎缩。

任何政治性的群众运动，都需要行动人与观念人的领导。行动人深谙群众心理，懂得怎样把群众化为实质的力量，所以行动人搞组织，策划各种步骤与活动，观念人则提供理论的支持与思想的导向。政策的实施与推行必须有理论的根据才能让遵循者口服心服，“权力”才能“合法化”(Legitimation)为“权威”(Authority)；观念人则需行动人去实现他的构思，使理想能开花结果，因此观念人与行动人都需要对方的能量支援去追求共同的(或同中有异的)目标，这是行动人与观念人合作的基础。

理论上行动人与观念人应该互为扶衬，但是问题来了：观念人重理想，行动人重现实，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有距离。行动人在成功掌权后的作为往往不能满足观念人的许多美好构想，而观念人的訾议不休则使行动人

感到不耐，这局面往往演变成行动人与观念人关系紧张，难以合作。

贤明的政治领袖宜乎重视观念人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可以作为国家与社会兴革的参考。有批评才有进步，观念人的批评只要用意良善，有建设性，都可斟酌情况，考虑接受。而观念人在提出意见时，态度宜温和，言词宜慎重，避免“情绪走火”气浮于事，徒然造成与行动人不必要的对峙。对峙只会造成分歧冲突，而分歧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

行动人是“执行人员”(Executive)，观念人是“思想储库”(Think tank)，两者只有协调、配合才能对社会国家的建设作出最大的贡献。行动人不用把观念人视为阻手碍脚的假想敌，观念人也不必处处都唱反调。观念人为反对而反对，这是另一种虚无的表现，任何批判行为的后面，都必须有一个建设性的动机，这样的批判才会有价值。

总而言之，行动人与观念人的关系不必为“敌对性”者(antagonistic)，敌对所造成的分裂、化约作用只会造成两败俱伤，对国家兴革是一种斫伤。这两种人物的关系应该是“共生性”(Symbiotic)，这样才能互为匡济，相辅相成，综合衍生为社会建设的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创造力。

30.3.1988

青少年“次文化”的省思

5个人当中有4个是青少年，年轻一代素质的好坏影响实在太大了。父母师长应设法了解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与压力来源，并给予正确的引导，协助他们找到人生的目标与生活的意义。

18

穿乌鸦装去贺岁

1987年2月10日《南洋商报》发表社评“华族传统习俗与‘代沟’”，针对青少年全身黑色衣装向长辈拜年的刺眼现象提出批评，1年之后的戊辰春节，青少年仍旧肆无忌惮穿著乌鸦装前去贺岁，这现象正如社评所指出的显示了“华人传统习俗正受到社会变迁的无情冲击。”，而乌鸦装以及它所代表的青少年次文化（Subculture）势力的持续与强化，实在不容忽视。

青少年次文化除了以乌鸦装、灯笼裤（裤筒宽阔，裤脚窄小的不均称长裤），头发染色这种奇装异服，怪诞仪容作为族类（Peer Group）的衣饰表征外，还有他们特殊的行为模式。他们喜欢呼啸来去，群聚于电子游戏场、桌球中心、百货公司、迪斯高舞厅，听流行的西曲与粤曲。这些行为模式有很明显的奢侈逸乐倾向，不但消费而且有强烈的浪费趋向。

不过，如果这些活动在时间与金钱方面都有所节制，或偶一为之，问题不大，或至少可为成年人所容忍。但这股次文化并没有在这个阶段就煞车，有迹象显示这波次文化自道德层面迅速滑落，成为一种与主体文化分歧、冲突的“对抗文化”（Counter Culture）。

“对抗文化”的出现

这股“对抗文化”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青少年满口粗话，抽烟喝酒，赌博打架，飞车竞逐，甚至参加私会党，吸毒偷窃，恐吓勒索，非礼强

暴女性，加上一些妨害风化的行为，可以说是“对抗文化”最引人侧目的表现，青少年犯罪数字日增，显示了对抗文化的暴力倾向抬头；而另一方面，未成年少女与成年少女在酒廊、舞厅、按摩院、娼寮不同的程度的出卖色相，则反映了青少年次文化颓废堕落的一面。这种不良趋势如果不加以遏制与疏导，肯定会携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对社会整体产生内在的“癌化”作用（Canceration）。

80%人口是青少年

根据一项调查，大马全国人口约80%是青少年，也即是说5个人当中有4个是年轻的这一代。今日的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社会未来的栋梁，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很硬的事实。如果今日的青少年大部份品德败坏，好逸恶劳，愚昧荒诞，则未来这些栋梁无异一根根朽木，由他们来支撑大局，则社会前途，国家命运危且殆矣。了解青少年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则找出青少年问题的病因，寻出缓和疏导的策略已成当务之急。

就笔者所见，青少年次文化逆潮的形成主要的根由有五：（1）家庭的忽略（2）学业的压力（3）成长期的困扰（4）商业文化的推波逐澜与（5）创造力贫乏所造成的盲目趋附现象。

商业宣传宜自我约束

让我在这儿稍作引申：父母于儿女的管教疏忽，使青少年有隙可乘，逃避学校，游荡街头，极易受坏人误导而走入歧路。破碎的家庭，不睦的双亲，也会驱使年轻的一代在行为方面放纵败坏。而沉重的功课，升学的焦虑，师友的期许所造成的心理负担，加上青春期的精神未能平衡，青少年由于不胜负荷而需要找寻某种方式来宣泄心中的无助、苦闷与压抑感。商业文化利用各种媒体（其中以电视的广告宣传最为有力）促进消费，鼓励收看者趋附时髦豪华，强调感官享乐，遂造成今日青少年竞相竞逐时尚，赶上潮流

19

的狂猛歪风。而当这些青少年找不到足够的金钱来满足他们的时髦欲，他们只好铤而走险进行各种不法勾当，如是这些青少年往往成了犯罪集团的猎物或牺牲品。

家庭教育的改善，学校纪律的加强，警方的惩处傲尤，以及家庭、学校与警方的互相配合，固然可以收到良好的遏制作用，不过预防好过治疗，疏导胜于镇制，父母师长应设法了解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与他们面对的压力来源，并给予正确的指导。生意人促销产品，搞广告宣传，应考虑到“社会责任感”，而采取自我约束，通过多方面的合作，才有望解开青少年问题的症结。

重新拥抱主体文化

说起来所有的成人都有这个义务引导他们的后辈走上康庄的道路，让他们知道人生的目标，自我完成与实现的需要，使他们回到青少年主体文化的学习、阅读、创作、研究、服务、运动、康乐等心智与体力活动里，而从这些活动与训练建立起自我纪律，发掘出自己的潜能与兴趣，为自己将来的踏入社会工作就业作好准备。

青少年当然也可以有他们的消闲方式，除了以上所述的各种活动，还可以野餐、旅行、露营、去肯德基吃鸡喝 root beer，逛街购物，听音乐看电影，这些消闲方式只要不耽溺成习，都属无可厚非，成年人大可不必处处制肘，事事禁止，使两代关系紧张恶化。只有了解加上关怀加上引导，才能协助青少年找到生活的意义。

7.4.1988

根源性的文化交流

——为第三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而写

新马菲泰等国的华文作家，写自身“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关怀与现实拥抱，不能视之为“中华特质的背弃”（Betrayal of Chineseness）。

第3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即将在4月11日开始，一连5天假吉隆坡联邦酒店举行，本届会议的主题是“促进文化交流”。笔者于是届会议提呈的论文题为〈文化交流的重点试探〉，篇幅较长，兹摘录若干要点，就教于文化界同侪。

文学传承的相同

亚洲华文作家有许多共同点，除了大家所使用的语文是共同的中华语文外，在文学传承及思想根源方面应该是同血缘的。亚华作家，包括笔者在内，都是读著诗经楚辞，孔孟老庄，唐诗宋词，红楼水浒出身。我们虽不一定深谙诸家哲学，也不一定熟诵诗三百，但由于我们自幼浸润在这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里，我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可说十分相近。

虽然亚华作家有著许多共同点，但是由于我们来自不同的区域，有著不同的社会阅历与文化经验，所以彼此的作品各有特色。这些特色表现为各异的地方色彩，呈现多元的内容与面貌。关于这点，只要大家稍为比较一下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马的华文作品，便不难察觉不同区域的华文作品的歧异性。

这种歧异可分好几方面来探讨，笔者关注的是，亚华作家自幼便沿袭中华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伦理观念与价值规范。这些观念、规范与现实时空接

触会出现怎样的回应？

让我们来检视一些具体的例子。譬如“忠”、“孝”这些传统观念在不同环境背景会产生怎样的回应呢？

唐人街意识的扬弃

来自亚洲各国的华文作家，国籍不同，各有归属。中国大陆与台湾文学界的朋友，习惯性地称呼这两个地区以外的华人与华文文学为“华侨”及“华侨文学”，究其实乃是一种“本位主义”的错觉，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今日的“华侨”已非侨居，而是落地生根于亚洲各国，成为当地的公民，并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建设。这些“华侨”事实上已摆脱上一代那种“唐人街意识”(ghetto consciousness)与过客心态，并主动地适应，配合新环境的需求，自我塑造“新华人”的身份。这些“新华人”正是亚洲好些新兴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元社会的重要成员。

新马的华文作家身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我们所最熟悉与最关怀的当然是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我们所面对的种种问题与困扰，形诸文字，自然也以这些为常见的题材。新马菲泰等国的华文作家写自身“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关怀与现实拥抱，自不能视为“中华特质的背弃”(Betrayal of Chineseness)，事实上大家仍不难从这些地区的好些华文作品里嗅到一种血浓于水的文化乡愁。

“新华人”的身份

今日我们探讨亚华作家如何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与如何进行文化上的交流，有必要体认“新华人”这个事实，并进一步对“新华人”努力学习当地的语文，认真看待当地的历史文化，全面参与当地政经文教的活动，并且认同成为当地效忠不二的国民底积极意义有一个通盘性的认识。“忠君爱国”的思想，在中国大陆、台湾两地，由于政制的不同，诠释有异，至于这两地

以外的其他国家，“忠君爱国”这观念只有放在实际情况里、去诠释才不致“表错情”。

现在让我们来检视一下“孝”这个观念。在家庭普遍瘦化的现代社会，孝的功能已弱化褪色，但孝与其他伦常关系在不同环境背景所面临的考验却有著程度上的差异。中国大陆与台湾就很不一样。我们读台湾小说家王文兴的《家变》，会对小说里头两代的磨擦纠葛和后来演变成的对立仇视感到于心戚戚然，不过如果我们同时也能读到大陆作家金兆的《追悼会圆满结束》里女儿批斗父亲，妻子斗争丈夫种种“大义灭亲”的行径，我们会觉得同样是倒行逆施，后者是惊心动魄许多。同属不孝叛逆，后者却为大陆的特殊政治制度“合理化”(rationalised)，阶级感情取代亲情，党的利益重于一切，“儿子打老子”的逆行于是成为向党及国家赎罪的方式。居住在中国以外的华文作家要了解孝及其他伦理关系在大陆受到怎样剧烈的冲击，就必须了解大陆特殊的政治系统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促进文化交流，不能偏重形式，而忽略内容。本届亚华作家会议不仅安排各地区代表报道各国的文学情况，也安排了一项华文报副刊座谈会，这显然十分有助于彼此的沟通与了解。只有当我们对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投入较多的关注，文化交流才不致流于浮泛或表面化。谨在此祈祝第3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举办成功。

11.4.1988

内忧外患的马华文学

电视把人们变成只能作机械反应的“单面向人”，他们拒绝作多面向的逻辑思考，他们畏惧白纸黑字印成的文学。

马华文学最尴尬的问题是找不到多少部够份量的作品，这种情形，诗、散文、小说都如此，戏剧更不必说了。至于文学批评，只有三几个人零星地在写，而且写出来之后也不一定能找到发表的园地。在严重缺乏讨论与评介的状况下，也许有一些水准颇高的作品发表了之后被忽略，久之被遗忘，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写作持续力不足

就我的观察，马华作家写上5年的已算难得，能持续不辍创作逾十载者称得上稀罕。通常作者的写作期大约是在高中时期（16岁以后）开始，写个3、5年，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后，便开始慢下来，再过一两年储够了钱成家立室，便进入全面熄火停工的状态。所以我们的作家永远停留在青春期到成长期这阶段，心智臻成熟，文笔稍熟练的时候，也正是他们告别文坛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作家年龄，心智都稚嫩，作品的青涩以致于贫乏毋宁是必然的现象。

然则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这现状呢？主办文学工作营，研讨会，成立出版基金协助我们的作家出书，提高稿酬，举办文学创作比赛颁发奖金给有才华的作家，这些方法都可行，近年来也有好些社团正在做著，但这些推动文运的方法都有它们各自的局限。

专栏围限创作才华

文学工作营，研讨会一类的活动往往只能燃起对文学的短暂热情，事过境迁，热情也就消退得一干二净。对个别有才华的作家底奖掖，往往只能捧起三两个“写作界明星”，而作家在获奖后，名气是初步奠定了，但能不能持续写下去，保持作品的水准进而精益求精，则仍是一个未知数。我们看到好些作家，名气大了，创作反而少了，而且有纷纷“改行”写专栏的趋势。专栏文章叙事议论，批评时事，千字左右的框框要收到某种启迪民智的效用，这逼使作家发展出一种新的文体框式，作家长期囿限在这种自设的框式里，对文学创作往往是十分不利的。

替作家出书确实帮了个别作家的不少忙，可惜设有出版基金资助作者出书的华团寥寥可数，还不能蔚为气候。提高稿酬固然可以提高整个写作界的士气，只是提高稿酬的呼吁虽时有所闻，报馆与杂志社所作出的“调整”却微不足道。

马华文学所得到的助力有限，已如上述。物质条件的恶劣，使大多数马华作者都捱不下去而中途掉队。有人批评马华小说家没有魄力与耐心去写长篇，这话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客观因素的不利于长篇小说的滋长，除非是名作家，一般作者就算有能耐把长篇熬出来，也多卖不出去，最后的下场是“束之高阁”，这不快的现实使小说家知难而退，宁可多写短篇。至于诗集滞销，搞文艺刊物亏蚀，这已是“文坛常识”了。这情形很可悲是吗？是的，但马华文学的困扰并非到此为止。

马华文学的最大威胁来自读者群的萎缩这个事实。电视挟其声音色彩光线的强势，予观众视觉的、听觉的各种感官刺激与满足，把文学读者逐一俘虏。甚至有文学阅读习惯的读者现在都得减少一部份读书的时间，转移到收看电视的消闲活动上面去。

“单面向人”的诞生

本世纪最了不起的思想家之一的麦克努汉（Marshall McLuhan）在60年代

初期曾预言电子将支配人类世界，传统靠印刷来传播学问、艺术的时代即将没落。他的预言不幸逐步应验。越来越多的人在电视面前俯首称臣，变成只能作机械反应的“单面向人”（One dimensional man），他们拒绝作多面向的逻辑思考，也畏惧立体式的复杂推理与研索等心智活动。他们满足于小荧光幕的映象所提供的“感官立即性”（Sensuous immediacy）。这种世界性的危机显然也影响到我们的马华文学。尤其在香港连续剧涌入国内市场之后，真正还能找到余暇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人就更罕见了。

26

当然除了来自电视文化的挑战外，近十多年来华文教育水平的普遍趋于低落，也直接地影响到马华文学的作者及读者素质。现行的教育体制，鼓励华社新生的一代把大部份精力与时间都用在国语及数理的学习、使用上，这对文学兴趣的培养恐怕是十分不利的，我读过好些文章，批评年轻作者语文的驾驭能力有欠娴熟，感性泛滥，文字生涩，这些批评如果确实，我猜想那应该是整个华文教育走下坡的表征。马华文学面对内忧外患，读者不增反减，作者力不能继的状况，前景实不容乐观。

14.4.1988

在分歧中寻求共识与互信

华人只有在面对共同的灾难如黄河决堤，蝗虫来袭时，才能携手合作。

“各党团都有自己的立场，要把大家聚在一起恐怕不容易。”

这是丹斯里拿督黄琢齐的顾虑。丹斯里黄与陈凯希先生于4月11日假联邦酒店设晚宴款待聚首部门的亚华作家，宴会过后，笔者向他请教有关华团采取主动联系各党团的可能性，他当时所作出的反应。

党团之间的分歧，包括目标与策略运用方面的分歧，我们不难理解。立场不同造成彼此行事作风的歧异，正是丹斯里黄琢齐一针见血指出的问题症结。我们关心的是，这种分歧如果持续并且恶化下去，华社岂非分崩离析，永难团结？我们难道不能异中求同吗？为什么我们不尝试在歧异中寻求互契甚至合作的某种基础？

“执政”与“在野”构成了立场的不同。政党与社团，一为政治性，一为联谊性，效能也不一样，甚至执政党之间也有单元性与多元性的差异。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大家都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天空下，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大家所面对的政经文教的种种问题与困扰是一样的。

27

整体利益重于本位利益

最近15华团与马华就华小行政职位问题举行对话，报载华团将与民政举行另一个回合的会谈，这些接触是令人鼓舞的。立场不同所造成的隔膜不是不可以克服的，问题在于接触的双方面有没有诚意，更重要的是，接触的双方面有没有意识到大家所面临的问题底严重性。为了民族的权益与国家的未来，许多琐细的恩恩怨怨都可撇开。允许我进一步申论，身为领袖如果只懂得维护狭隘的本位利益，而忽视了涵盖面更广的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他或

他们其实已不能有效地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中继续扮演领导角色。

谁最清白？

不过这次对话也引爆了马华与民政另一场争论，旧恨新仇，一起并发。我们虽然相信真理愈辩愈明，但同时也为两党的不睦以致冲突的升级感到忧虑。这场“谁最清白”的政治纷争方兴未艾，看来还会持续一些时候。而双方都觉得有争辩的必要，因为这场论争关乎党的形象，会影响到来届的大选成绩。从一个比较广的角度来看，马华民政之争反映了华人社会互相倾轧的窘境，这种互相倾轧的局面对党与党之间日后的合作实在是十分不利的。党与党的对峙只会削弱华人的整体力量，从而伤害到华族的整体利益。

前面笔者一再用“整体利益”这些字眼，因为只有有关各造真正省悟到整体利益的重要性，他们才不致做出任何对整体利益不利的事，他们才会对自己的言论及行动负责。

华社是唯一的输家

我们的好些领袖，口里在喊维护华人权益，实际上却把党团利益看得比民族的权益还重要，他们缺乏一种政治卓识与文化宏观，常常为了政治上的蝇头小利置喙不休，而忘了有更重要，更迫切的问题等著他们去维护、去争取。从这个角度看：马华民政之争，谁都不会胜出，华社是唯一的输家。

患难意识与同命感

立场不同所导致的分裂要如何才能消弭呢？历史告诉我们：华人只有在面对共同的灾难如黄河决堤、蝗虫来袭时才能携手合作的。然则我们的领袖确乎应该了解大家所面对的政经文教的困难是共同的，从而萌生一种在群体中生根的患难意识，只有在这种意识成形之后，一种“同命感”以致于

“同舟共济”的需求下才会产生。那时所谓立场不同，旗帜不同，单元多元的不同的种种争论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有关各造如何寻求互契，如何以实际的行动建立彼此互信与共识的基础，聚合所有游离的力量，为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马来西亚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

29.4.1988

生活需要设计

生活设计目的在于打破枯燥的闷局，增进生活情趣，使身心健康，让自身的创造力得以发挥，而以提高一己的人生境界为鹄的。

很多人抱怨生活太忙，根本挤不出时间来做自己爱做的事。工作、睡觉、吃饭、如厕……日复一日，做著同样的事，“除非天塌下来”否则这种机械式的循环将持续到老死。

男的在外面忙著应酬，女的在家里忙著家务。下午有人忙著午睡，晚上更多的人忙著看电视。某些人忙著一天出席三四个会议，另一些人却忙著拉脚打八圈麻将。太阳升起，太阳沉落，一天又溜过去了，你觉得这一天充实吗？你可曾有一刻想过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老掉了大牙的问题。

生活是需要设计的。不要让生活刻板化，刻板的生活会使你麻木不仁，犹似木偶（或机械人）；更不要让生活杂乱无章，漫无止汨，误打误撞过一生。

不要以为生活设计是有钱人的玩意儿或专家学者的游戏。每个人都在生活，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内容，如果我们能把自己的时间分配得好一些，生活即使不能因此变得更幸福，至少它会变得容易忍受一些。

照我看，生活设计至少要考虑到脑力活动与体力活动的某种均衡。白领阶级案牍劳形，体力活动太少，精神透支太大，长此以往，健康便会弱化。如果当事人能察觉此点，他便可以在生活设计里安插一些保健或运动的项目，增加一些康乐活动，使身心得到适当的调剂。保健的方法从打球、晨跑、爬山、游泳到其他的康乐活动如野餐、郊游、唱歌、跳舞、都有助于松弛神经，恢复活力。

对蓝领阶级来说，挥汗劳累了一整天，需要的，相信不是体能运动，而是适度的消遣，包括收看电视，聆听歌曲，读书阅报，最好能在娱乐的同

时也能获得一些新知，使心智充实，让个人的精神生活有所滋养。

生活设计目的在于打破枯燥的闷局(break the routine)，增进生活情趣，使身心健康，让自身的创造力得以发挥，而以提高一己的人生境界为最终鹄的。前面所论仅及于体力与智力活动的相辅而行，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人生企管学”（这是笔者杜撰的名词）。只有脑力活动而缺乏体力活动，健康很快会亮起红灯；只有后者而缺乏前者，则苦捱苦干只是变相的“做牛做马”，当事人的内心其实是十分苦闷空虚的。

我以为只有在心智活动与体能活动都能兼顾，工作与消闲都没忽略的情况下，生活才有情趣可言，个人的兴趣，禀赋才有机会发掘和表现出来。只有不断提高生活的素质，让理想引领自己追寻生命的美好，“人生境界”，“生活意义”云云才不致虚无飘渺，才能落实到真正的体验里。

不要用“忙”字诀来推搪休憩、消闲的机会，贵为一国首长的能忙里偷闲打打高尔夫球，政府高官也晓得游泳以保健（劳工部长李金狮先生便是一例），我们再忙还是可以每周抽出若干时间，暂时撇开日常事务，去散散心，在球场上挥挥汗的。下班回家，在住宅的庭院里栽花植树，锄草培泥，既收体能活动之效，又能消闲作乐，十分利便。

生活设计不妨以每周为一单元，这样设计起来才不致于太复杂，对于可能会干扰到生活常态的因素也较易估计。一周过后，成绩如何，效果如何，冷暖自知，有没有什么地方仍需加强改善的，则可在来周的设计蓝图里予以补充删减，以配合自己的需求。笔者个人从生活设计里获益良多，不敢怀璧自珍，兹公诸于世，并愿与天下追求更美好人生的朋友们共勉。

4.5.1988

青年参与社会服务的意义

大学生作为发展中国的知识主干，他们走出学术的象牙塔，步入生活的十字街头，以理想提携现实，以行动匡弼社会，岂非正是我们应该鼓励的？

32

笔者与滨城理大的陈业良博士有数面之缘，据他相告，这些年来他都有安排理大教育系的学生到郊区小镇为乡间学生作辅导。这种课业辅导，属于义务或半义务性质，学生只需每月付出数元，补贴电费或“讲师”的车马费，至于其他开销，则由陈业良博士接洽其他乡团赞助。

这项大学生下乡的教育辅导计划，用意良好。如所周知，教育工作不能纸上谈兵，必须身体力行。大学生必须落实到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作业中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

环境因素对学生会有怎样的影响，家庭背景对学生性格、性情的形塑性，学生本身智力高低，种种客观因素所造成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年轻的讲师只有在剑及履及的实际教学与辅导经验中，才能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种教育辅导，是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年轻人最可贵的是那一份初涉社会样样都跃跃欲试的工作热忱，这种热忱使他们不太计较金钱报酬甚至利害得失，而更重视工作本身的成效所携来的成就感与满足感。这份服务热忱宜乎得到鼓励与引导，让它成为改善社会的实质力量。

其实仅凭一腔热忱仍不足于成大器，年轻人必须从服务活动中认识自己的能力，察觉自己的弱点，改善自己的脾性，充份发挥自己的才具，才有大作为可言。所以参与社会工作不啻进行“实习”，并在实习过程中自我教育。

我认识一位家庭富裕的女士，她禀性良善，同情疾苦，在我的鼓励下，她参加圣约翰救伤队。她的受训过程还称顺利，但在实际的服务活动中

却遇上困难。第一趟在篮球比赛中出差，她便无法“忍受男生的汗臭”，而且受伤球员那种口吐白沫的神情也使她“作呕”。这位女士对自己的反应感到羞耻。她想不到自己在面对需要帮助的伤者时，感觉与反应竟会是这样的。如果她不参加救伤服务，也许她永远不了解自己真实的一面。这位女士为自己的“泄气”感到羞耻，我则认为不必。这种对伤者的呕心反应毋宁是人之常情，是爱心与责任感使当事人克服这种自然反应。护士也不是天生就具备服侍病黎的能力的，这里头有许多主观努力的成份。我对那位女士的劝导是如果主观的努力仍不能克服这种本能的厌恶反应（就像一个怕看到血的人不能做医生一样），她其实可以另行选择别的社会工作以服务人群。

33

青年参与社会服务，除了增进对自己底了解进而发掘出自己的兴趣与潜能外，还可以由此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可贵。你诱导一个人改邪归正，这便是成绩；你使一个懒惰的学生求上进，这便是成果；你的言行如果使一个人（或一群人）得到启发，这便是你的成就。这种成就感让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从而产生一种“有力感”。

年轻人应该从基层做起，参与社会工作，深入民间，为落后贫穷地区的同胞服务。不要以为SRP，SPM毕业生“活该吃苦”，而大学生一跨出校园便坐冷气间，担任行政高职，“从此平步青云”，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心志的砥砺，无论对小学生还是硕士博士都同样重要。

我们担心的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出身优裕，生活富足，好比温室里的小花，经不起以致于不愿去经受户外的现实风雨。他们视社会服务为“自讨苦吃”。更多的年轻人，则孜孜于眼前的利益，“赚钱第一，理想免谈”，对于冷酷而功利的这一群而言，社会服务云云是傻子才会干的事。这两类年轻人都没有为理想吃苦的浪漫气质与道德勇气，这实在是很可悲的。鉴于好人好事理应褒扬的立场，我们欣喜听到理大的在籍学生下乡从事教育的实习工作。大学生作为发展中国的知识主干，他们走出学术的象牙塔，步入生活的十字街头，以理想提携现实，以行动匡弼社会，岂非正是我们应该鼓励的？

10.5.1988

从“期待超人”到集体领导

华社思想层次的普遍趋于成熟，扬弃个人崇拜可谓关键之所在，“一人系天下之安危”的思想基本上是反民主体制的。

大马独立以来，华社面对的难题层出不穷，政经文教所面临的挑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9年是一个分水岭，五一三事件过后，华社的困境愈形窘迫，在那样的低气压下，华社遂把希望寄托在一些领袖的身上，希望他们能扭转乾坤，为华社打开一条出路。这种“期待超人”的心态如实地反映了国内华裔族群的精神苦闷。

超人形象的没落

于是一批“超人”出现了，拿督林敬益、拿督曾永森、拿督李三春、陈群川……都可以说在相当的程度上扮演过超人的角色。还有，已故丹斯里李延年（华社寄望他登高一呼组织全国华团总会），能言善辩的林吉祥也在不同层次上扮演过超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上述领袖的超人形象都无法维持长久，华社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华人救星、现代陶朱公的崇高形象，在现实逆势的冲击下，不是褪色，便是殒落。

时至今日，华社的超人梦大抵已经幻灭，而这个从“期待超人出现”到“了解超人之难期”的认知（recognition），我觉得十分重要。华社思想层次的普遍趋于成熟，扬弃个人崇拜可谓关键所在。“一人系天下之安危”的想法基本上是反民主体制的，里头蠕动著不少封建独裁思想的遗毒。

家长式统率

“个人崇拜”直接或间接鼓励寡头决策或强人领导，过去雪州中华大会

堂要看“老人家”的脸色行事，这是早年文教界“公开的秘密”。10年前笔者曾受邀列席大会堂的一项理事会议，我颇为吃惊地发觉连苏天明、梁志诚这些少壮精英也得“自嗟幼辈”，深觉改革不易。“老人家”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丹斯里拿督黄琢齐主持），但他的硕大影子笼罩全场，“老人家”的意愿也多次被提到，予人一种强烈的“家长式统率”甚至“遥控”的感觉。

集体领导与集体负责

再看马华公会，拿督李三春在党选举中击败拿督曾永森，又在大选击退强敌中选为芙蓉区国会议员，当时的拿督李三春，声誉之隆，如日之中天，大家都以为他必定大有作为，惟不旋踵拿督李下台求去，党内爆发接班人危机。马华其他领袖，没有人具备李三春那样的强人实力足以镇慑群雄。而李三春退隐前不能预见党内之领导危机而作出安排，终于酿成惨烈的党争，使马华元气大伤。如果马华当年走的是今日的集体领导路线，那场延绵超过两年的内斗或者可以避免。

从“期待超人”，希望某个人能为族群带来奇迹与突破，到相信众人的智慧与能力，后者显然踏实稳健许多。从这个角度看，15华团的携手合作，可以说是一种“集体行动，集体负责”的表现。事实上15华团扮演的是类似全国华团总会的角色。15华团由15个社团单位所组成，它们有各自的领导层，各领导层通过它们的代表互相咨询，化零为整，采取集体的方式与各政党谈商、协调，并同时表达华社的意愿，这运作虽然仍欠完善，但基本上它是健全的，直到今天为止，15华团的组合所采的步骤予人的印象是“反应敏锐，并能采取主动”。

民主与理性化

再看今日的马华公会，总会长拿督林良实出国去了，市上传言他拿

的是“政治病假”，不过马华在他的缺勤下，由李金狮，黄俊杰及整个中委会所组成的集体领导层，丝毫没有紊乱之象，我觉得这是马华走向健全的征兆。期待超人的动能或能制造强人，但强人并不是三头六臂刀枪不入的金刚，一旦强人颓倒，便容易出现树倒猢猻散的乱局。集体领导治众人的良知良能于一炉，弹性大，韧度强，较经得起外来的考验与打击，纵使一环一节出现纰漏，补救也较容易。华族的社会建制（institutions）的逐渐走向集体式决策与领导，一方面是民主化，另一方面也是理性化的成果。

3.11.1988

“超级市场”社会学

敏感的人可以在超级市场里感受到社会的脉动甚至总体经济的讯息。

每次走进超级市场，总有许多感慨，觉得现代生活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超级市场售卖的商品，从手表到鸡蛋，从内裤到肉肠，从Cologne到臭丸，从各种酒类到各款衣裳。从电子游戏到男女鞋袜大展，林林总总，活色生香。如果我们说超级市场是一部有血有肉的社会学，谁曰不宜！

为甚么我说走进这样的市场，会觉得现代生活得到与失去的都十分可观，问题的答案读者或许会在阅完本文后窥见一斑。

变相的公园

不管你喜不喜欢，超级市场肯定已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份，而且是重要的部份。除了特殊的例外，每个家庭每周总得光顾或游逛超级市场一两趟，有些人（尤其是妇女与孩童）甚至每天都得跑超级市场。对大多数人而言，超级市场不仅是购买日常用品的所在，也是娱乐、散心、零食的理想地方。国大的一名社会学讲师告诉我：“有了超级市场，连公园也少人去了。”换言之，超级市场已成功地抢走了一部份公园的游客，它是购物、娱乐、零食中心，也是“变相”的公园，虽然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公园”里头没有多少株（包括装饰用的盆景）洋溢著绿意的花草和植物。

超级市场成功地抢走了华人的杂货店、洋货店、鞋店、布店、文具店、玩具店、运动器具店、唱片行的生意，甚至连传统的华人巴刹也受到它的威胁。超级市场的兴盛，和华人杂货店、洋货店的没落成反比。不管你喜不喜欢，超级市场已成了你的社区最易辨识的文化特征与生活符号。

反映文化的面貌

不要以为我在夸大其词，超级市场的确可以让我们看到文化的“面貌”，因为文化本来就是生活的方式与习惯，包括衣食住行也包括意识观念，行为与价值选择。而超级市场里摆卖的东西大多数与人们的衣食住行休戚相关，哪种商品畅销，哪种商品滞市，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意识观念与价值抉择。

38 超级市场有别于博物馆，博物馆是用来观瞻的，让观众发思古之幽情，它的基调是“过去式的”(Past Tense)；超级市场是用来提供消费的，它不会去卖那些售不出去(或不受欢迎)的东西。相对于博物馆的过去式，它不仅是“现在进行式的”(Present Continuous Tense)同时也是“未来式”(Future Tense)而充满了种种变化的可能性。怡保的一间超级市场曾经摆卖过中国古董，一个月后即收盘，后来转而经营中国玉石，2个月后又因生意额太小而停止营业。超级市场里头有许多货架，它们上面的货物每周都在调整。市场的管理层密切注意哪种商品可销，哪种商品滞销，并且打著算盘(应该说是按著电子计算机)调整货架上的商品组成。畅销货自然获得较大也较显眼的摆置空间，滞销品则放到较僻的角落“聊备一格”(这就是为什么锁头一类的商品永远都塞到最僻的一角)。这种调整是为了赚取更高的利润。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这完全合理。不管你喜不喜欢，超级市场货架上的商品组成忠实地记录了有关社区的文化品味，消费需求甚至消费偏嗜。

品味与偏嗜

什么叫著“消费偏嗜”，我看就以速食面为例谈谈，据一项调查，速食面当中以“叻沙”(Laksa)调味的最销，它比咖喱调味、牛肉调味及其他方式调味的快熟面的销量都好，理由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从这资讯看出一般人都较喜欢吃些又辣又酸富于刺激性的食品。速食面的畅销说明了社区成员选择既快捷，又经济的方式来解决吃的问题。所谓“快捷”其实是

仓促草率，所谓“经济”通常往往是营养不足的代称。而速食面所征示的仓促、草率，粗糙而缺乏养份等特色，其实正是现代生活“丑陋的一面”底写照。

生活方式的遗忘

有一天我到超级市场搜索一种叫著“玻子”(以白泥渗和洋灰制成的弹丸)，遍寻不获，整个玩具部都找不到这样的东西。女店员对我说：“而家D细佬有咁多嘢搞，边处会去买玻子呀。”这道理我明白，看著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玩具，我了解像“玻子”“毽子”一类的商品已缺乏商业价值。这些商品的被扬弃实际的意义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在死亡，某种生活方式已被人遗忘。

无论如何，超级市场仍是一个值得我们常去走动的地方。因为都市生活时间太少，泊车困难，我们不可能为了买五种商品，而走五家商店，并且把车子兜来兜去泊在五个不同的地方。没有一个都市人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如果连超级市场我们也放弃不去，除了上班的地点与住宅之外，我们还能去什么地方？不是每个人都肯去图书馆或天后宫的。超级市场透露最“当下”(马来文有一个很传神的字Masakini)的生活型态，敏感的人可以在超级市场里感受到社会的脉动甚至总体经济的讯息，寂寞的人在超级市场里听人声，看热闹，杀死时间。大伙儿都可从超级市场寻得满足感，我们还抱怨些什么？

6.11.1988



克服害羞·善遣寂寞

两个人当中有1个害羞内向，3个人里头也有一个觉得自己寂寞孤独，这不寻常的现象，我们岂能不关注？

害羞的人比比皆是

根据美国史丹福大学心理系教授Philip Zimbardo的调查，台湾的大学生，有50%认为自己“害羞”。换言之，每两个人当中便有一个“害羞的人”。这项抽样调查虽以台湾大学生为对象，但我想用在国内华裔大学生身上相信“虽不中亦不远”。

另一项调查显示，“觉得自己寂寞的人”，3个人里头就有一个，害羞、寂寞是一种心理并发症：害羞使当事人的人际关系困难，不易与周围的人沟通，觉得自己孤立，这种孤立的空虚感便是寂寞。

那些在教室内，在会议室里，在研讨会上选择坐在最后一排，或不受人注意的角落的人。通常都较害羞，正如在酒会里喜欢躲在一角喝酒、或佯装欣赏音乐的人，都有害羞的倾向。

害羞的人在陌生人多的地方，会觉得浑身不自在，与陌生人交谈时会紧张流汗，唇乾口涩，举止失措，甚至词不达意。害羞的人只能与家人、近亲或一二老友从容自在地谈天，一旦面对不熟悉的第三者或第四者（甚至邻居），心理上便“受制”，表现不自然，连笑容都是挤出来的。

害羞、腼腆显然弊多于利。好处是害羞的内向性格使当事人较谦逊有礼，无形中减少与人发生冲突的机会；坏处是缺乏朋友的支援，少了许多向人请教学习的机会。在事业上孤军作战，得不到朋友、同事、上司的实质协助与精神上的支持，纵有所成，通常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劳力，要走更多的冤枉路。而由于缺乏可交谈咨询的朋友，往往苦在心头无从宣泄，精神蒙受的困顿也较严重。

担心说错话

人何以会害羞，我想除了先天性的因素外，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应该更大，尤其是童年到少年期的那段经验与训练，孩子日后性格的形塑更具决定性。害羞的人通常都怕自己“讲错话”“应对不得体会招人讥笑”“自己的意见无足轻重”“不懂得怎样与不熟悉的人攀谈”“附和别人的见解害怕别人会把自己视为应声虫；提出不同的看法又担心会激怒对方。”这种种心理症结，都可究本追源在当事人的童年／少年时期的家庭与学校教育里找到根由。当事人必须要了解自己害羞的原因，才可能通过心理自信的重建，逐步克服害羞的毛病。重建自信，需要当事人自觉的，不懈的努力，而只有“关怀他人、参与生活”的内在动能才能使害羞的人从自我禁锢中解脱，变得积极和开朗起来。

寂寞不一定是坏事

人总会有感到寂寞的时候，而这不一定是件坏事，一个害羞内向的人容易受到寂寞的侵袭，心灵感到空虚失落。如果当事人能够将这种腐蚀性的寂寞转化为创造性的寂寞，则寂寞反而是思考、研究、创作的温床。人只有在静下来的时候，才能想得透澈，也只有在绝少外在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从事学术性的探索或艺术性的营造。一个性格外向，生活离不开声色犬马的人，是不可能在思想或艺术的领域里有什么大作为的。

名画家齐白石为了作画，曾在住宅前竖起“齐白石已死”的木牌谢绝亲友的骚扰。梭罗隐居华顿湖畔逾两载，从冬眠后复苏的虫鸟，体认到人类的新生意义与可能性。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曾经多次“失踪”隐匿起来专心写作，这些都是善于把握寂寞的正面作用的艺术家的思想家。对这些哲人与艺术家，寂寞并非“生命的败退”，而是“生命的进取”。

害羞是要克服的，但要注意的是：重建自信的渐进程序，操之过急有时往往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只要有不断尝试、不断改善的意愿，腴腴终是可以克服的。至于寂寞，则没有人可以完全躲开它。人活在这个世界，总有面对存在性的大寂寞的时候。此所以陈子昂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慨叹。有时事业、生活、感情上的不如意，也会使我们油然而生起难堪的孤寂感。在嘈杂器闹，人际交往频繁的现代生活里，偶尔有机会静下来面对寂寞，说不定还是一帖清凉剂，让我们能暂时抛开俗务、清醒地面对自己呢。

42

12.11.1988

文学做秀意义何在？

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口才缺缺的作家，大可多花时间写些好作品以飨读者，不必在台上抛头露面。讲的人背脊直冒热汗，听的人也得为他捏一把冷汗。

近年来文学做秀的风气渐渐兴盛起来。作家做 Show 并非在台上唱歌舞蹈，而是在台上谈文学，课题大抵离不开诗、散文、小说、戏剧、翻译、报导文学、文学批评这七大范畴，而以前三者为公认热门。

这些文学演讲大多在学校假期间举办，听众以在籍高中生或大学生为主要对象。至于主办的形式：讲座、工作营、研讨会，名目各异，但要作家在台前现身说法，学员在底下静坐聆教的动机则一。这样的“学习画面”衬之以学员提问，作家答覆，据说便是演讲成功的保证。

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好些学员的提问，据清楚内幕的人透露，还是老师写字条要学员走到麦克风前面照念的。这样做是为了使场面活泼些，同时也让作家觉得他的口沫不是平白消耗的，他讲的东西，不仅有人在听，而且还有不错的反应。在礼貌的照顾方面，主办当局的苦心，甚至是值得赞扬的。

43

冰山底下：学员的表白

但这现象凸出的只是冰山的一角。下面抽样摘录的是一些学员聆听的感受：

“XXX 根本没有准备什么，乱讲一通，他手上连讲稿都没有。讲的是尽人皆知的东西，我们根本学不到什么。”

“XXX 的华北口音好难听，他讲十句，我大概听不上两三句。”

“闻名不如见面，XXX 的文章写得不错，在台上讲话却那么砸，真想



不到。我们大伙坐在下面都在找周公。”

“真不得了，刚才X X X那番伟论，一大堆的主义，什么超现实主义啦，未来主义啦，后现代主义啦，达达主义啦……他提到每个作家总没忘了加上诞生与逝世的年份，还有文艺复兴，狂飙运动，伊壁鸠鲁学派……唉啊，胀死人，我看我的胃痛又要发作啦。”

“X X X的开场白倒也风趣，可惜只有那5分钟。一进入主题，他便照著讲稿直念，像学生朗读课文，更像电视的新闻报告。演讲是这样的吗？”

44

锦口绣心者难求

“演讲是这样的吗？这句不客气的质询，也许正是许多学员心里盘算著想提出，又不便启齿的疑问。

我们的作家似乎欠缺那么一点自知之明：不是每个能写的都是能讲的（同理，不是每个能讲的即是能写的），锦口绣心的人百不得其一。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口才缺缺的作家，大可多花时间写些好作品以飨读者，不必在台上抛头露面。讲的人背脊直冒热汗，听的人也得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无需讲稿的即兴演出

有些作家大约是近期“红”了起来吧，到处受到征召。今天得去某中学华文学会演讲，明天得去某少年营发表创作心得，忙起来那里有时间精神准备什么材料，反正上台随便扯它半个小时到45分钟便算交了差。于是从自己的大学生生活扯到友情爱情学业事业，天南地北，“盖”个不亦乐乎。至于讲稿，当然是不必准备的，杀鸡焉用作家的牛刀？这样子粗制滥造的文学Show，浪费主办当局的人力、时间、金钱，更苦了那群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年轻学子。

文学演讲总得照顾到听众的程度及需求（其实任何演说都应顾虑到听众的接受能力），对著一群中学生谈结构主义批评或者荒谬剧场，同属不

宜；而面对一群大学生讲些“散文的文句要流畅，思路要清晰”一类的初中生作文常识，不觉得肤浅浮泛些吗？

演讲要有技巧

还有演讲的技巧，以及传达观念的方式也是值得作家斟酌的。演讲不是读书。演讲不仅要有表情、手势，而且还得“有血有肉”。所谓“有血有肉”指的是演讲本身的生命活力。只有当作家全力以赴，用整个生命的能量去演绎、传达，他讲的课题才能生动清晰，没有冷场，让听众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对著讲义照念如仪，是没有力量的。一个成功的演讲家，甚至还须密切注意听众的反应，随机应变。

作家演说虽不能做到像演讲家在台上那般八面玲珑，但表情达意必须清楚，叙事说理要有条理，事前要作充份的准备，临场要讲得用心投入，这些要求不能算太苛吧？

文学做秀方兴未艾，看来这类活动仍会相当频繁。我建议主办单位在选择做秀人选时，除了考虑作家的名气学问才情之外，还得审度一番当事人是否真个能讲，“拉牛上树”，何苦来哉。还有，主办当局也应该有这份“道德勇气”向演讲人催讲议，杜绝作家“黄牛”。

17.11.1988

45

人海中的孤岛关系

现代人把自己的感情封锁起来，对什么人都虚与委蛇，虚情假义，当然找不到知心的朋友。

现代生活的人际关系，最令人感到忧虑的是最严重的“疏离”（alienation）。人与人互相认识但并不相知，点头之交满街都是，有感情内涵的友谊却十分难得。现代生活的频率愈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趋表面化，这样下去，人类迟早会沦为茫茫人海中一座座互打旗号而没有实际往来的孤岛。

人口激增与都市化

人口激增是使到人际关系冷漠化的其中一个主因。根据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显示，自1900年到1960年间，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而从1960年到2000年（仅仅40年的时间），世界人口又激增一倍。人口的剧增使人际接触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频密，再加上“都市化”又把人们聚集在一些空间有限的区域里，于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碰头便成了谁也没有可能避开的“生活压力”。街道上，目之所及，耳之所聆，莫非人潮人声。巴士与购物中心，更是人山人海，摩顶接踵，使人目为之眩，神为之夺，感到精神超荷不支，心烦意乱。

人是最懂得去适应以求生存的动物。精神超荷是吗，不要紧，人的感官系统会自动过滤掉一些外在的“刺戟”，他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人鲍鱼之肆固然不闻其臭，处身于喧哗拥挤的人群一样可以气定神闲（香港人在嘈杂的茶楼阅报，日本人在繁忙的地铁翻看岩波文库，都是一些例证）。人的感官可以选择他喜欢听的，喜欢看的，而把一些他厌恶的外来刺激挡住，不让它们造成骚扰或干预。

虚情假义

至于人际关系太过频繁，穷于应付是吗，不要紧，他可以碰到什么人都打哈哈，拍肩膀，天南地北地闲扯，“用热切的眼神望著对方”，交换名片，“热情地握手”，然后是一声拜拜过后，名片往角落里一扔，便把对方忘得一乾二净。现代人经常都慨叹“相识满天下，知心无一人”，究其实造成这后果的正是人们自己。人把真正的感情封锁起来，对任何人都虚与委蛇，假情假义，当然找不到知心的朋友。

也许现代人的虚情假义，有其不得已的根由。人每天上班，总有那么多的应酬，见那么多不想见又不得不见的人。有些是同事，有些是顾客。早上10时有一个约会，中午1时有一个饭局。下午3时有人要来看自己，4时自己得去看别人，5时半得送公司的某个大户上机，晚上7时半又得出席老板的女儿生日宴会。他的感情明显地超荷饱和，如果他对每个人都“真情流露”，那会消耗太多的精神，“要他的老命”。为了缓和这种压力，他与所交往的人维持著一种浮浅的、礼貌的关系，“不动真情”，实属情有可原。

契约与互惠性关系

现代社会的许多人际关系，往往建立在契约性与互惠性的基础上：上司与下属，业务上的股东或伙伴，彼此没有什么交情，但是基于契约与互惠原则，他们又不得不凑在一起，携手合作，甚至天天互相对面。也许有人会说这种人际关系很荒谬，是的，的确很荒谬，但这也是现代生活的特征之一，只要我们是现代生活的一份子，恐怕都难以遁逃，不过这种现代生活的负面作用也不是不可以纾解的。

纾解之道

纾解的方法不是对每个认识的人都“交心”，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险的，而是“要尽一切可能让自己不要变得冷酷”“努力去关怀社会群众”

并且“尝试在茫茫人海中找寻可以结交的朋友”。

我有一个近乎偏激的看法，人一旦变得冷酷，他其实已失去了人的属性，而成了“非人”(unhuman)，而如果他要维护自己的感情使它免于冷酷，他除了关怀自身之外必得去关怀爱护他身旁的族类，发挥“民胞物与”的本性，而人不能因为人际交往频繁了，便丧失了寻找知己朋友的内在渴求。只要人们肯努力去寻索，总能找到3、5知己，可以深谈，可以交心，可以患难相顾的。

48

人的感情生活，不能任其枯竭；人在面对愈来愈机械化的现代生活，不可让他的感情随之机械化。人不能离群独居，他需要友情的滋润，而只有在感情上有所归属，在思想上有所交流，他才是真正的人，并且在人所组成的群体里生根茁壮。

22.11.1988

我看武侠小说

我国考试局选用武侠小说《儿女英雄传》，作为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国文学”的必修书，可谓十分大胆的创举。这是否意味文化界一般上对于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已经首肯了呢？

教育文凭考试必读本

几年前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国文学”一科，以文康著《儿女英雄传》为其中一部必读本。《儿女英雄传》是一部道地的武侠小说，成于清代中叶，与石玉昆著《三侠五义》齐名。清朝自道光以迄光绪，国力日衰，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之乱，人心浮动，社会秩序荡然。文人墨客，精神十分苦闷，于是便虚构一些侠客出来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故事，作为心理补偿。继起的《小五义》、《彭公案》、《七剑十三侠》一类的武侠小说都可以说是这种精神需求下的产物。

我国考试局选用武侠小说作为“中国文学”必修书，可谓十分大胆的创举，实行以来，舆论听不见反对的声音，这是否意味著文化界一般上对于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已经首肯了呢？我看未必。一般读者，还是绝少把武侠小说视为严肃的文学作品。他们读小说无非为了消遣娱乐，打发时间，而不是在作品里寻求什么启示或“艺术满足”。

武侠小说有它独特的“魅力”，这点我们大致都同意。名学者如英千里、陈世骧、夏济安、刘绍铭等都是顺手拈来的“武侠小说迷”。武侠小说名家如平江不肖生（代表作：《江湖奇侠传》）、还珠楼主（代表作：《蜀山剑侠传》）、白羽（代表作：《十二金钱镖》）、朱贞木（代表作：《七杀碑》），以及崛起于50年代而为今日读者所熟悉的梁羽生、金庸等人的作品，布局缜密，人物凸出，构思新颖，可读性都颇高。这些名家在作品里所展现的神州大陆的山川河岳、乡土风情、历史背景，尤能满足中老年读者内

49

心深处的“中国孺慕”。

古龙、倪匡、温瑞安

新一代的武侠小说家，在中国史实与掌故抑至于地理知识的把握方面，虽逊于他们的前行代，但在情节的渲染铺陈方面，却更进一步翻新出奇，内容技巧尤见变化。已故古龙，擅于编剧的倪匡以及风华正盛的温瑞安，他们都深谙电影语言，懂得怎样用麦拉眼去布置场景，引出人物，推展故事。

以上所述还不能解答武侠小说有没有文学价值的问题。学者教授喜读武侠小说，可能纯粹为了消遣，初与“文学认可”无涉。英千里晚年尝谓好的文学作品对他的刺激太大，他的心脏经受不起，只好躲到武侠小说的世界里。而武侠小说情节的引人入胜，结构的诡奇悬宕，说起来也是所有流行通俗小说的娱乐条件，并非文学的“艺术价值”。

要有思想内涵

我以为武侠小说的“文学性”，仍需建基于普遍人性的刻划以及社会价值的反映上面。武侠小说除了文字运用要娴熟，结构要严谨，情节要精采之外，其主题意识是否能予读者某种启发，正是作品的最严峻考验。我们应该像要求文学（说部）那样要求武侠小说，它必须要有思想内涵。高信疆认为武侠小说应该反映“时代的感受性”，把个人在时代最真实的喜怒哀乐之情表达出来，使它“成为时代的代言者或反映当代人性的工具”，便是以严肃文学的尺度衡量武侠小说的成就。

或谓武侠小说囿于题材必须与武打有关，不容易于其中阐发什么高深的人生道理、某则以为不然。那些只写江湖恩怨与黑白仇杀的小说只能称为“技击小说”“功夫小说”甚至干脆“仇杀小说”，这些小说里头只有“武”而没有“侠”，实在不配称为“武侠小说”。甚么是“侠”，根据史家司马

迁的说法，“行果诺诚，赴士困厄，不矜伐，不聚敛，谓之侠”，他们是锄强扶弱，勇于抗暴，重义气，有志节的英雄豪杰。

侠义精神的回响往

虽然现实生活里没有“驭剑如飞”或懂得“登萍渡水”的武林异人，但侠的响往却活在华人的“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里，成了晋族文化传统的一部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股快意豪情，正是我们自小就企慕的侠义精神。生活的屈辱，际遇的迍邅，更使读者在精神上与豪迈的侠士沟通甚至产生心理认同。

从象征的层次来看，“侠”所征示的是天地间维护正义的力量。我们读武侠小说会感到激奋、痛快，正足说明这些小说里头有某些奇妙的东西，触动了我们心灵深处最纤细敏感的某根弦。武侠小说如果能摆脱拳头加枕头（暴力血腥加上黄色桥段）的媚俗框框，转而侧重于侠的本色与精神的描绘，凸出“重言诺、轻生死、除暴安良、伸张公理”的中国人文传统，则武侠小说一定能在中国文学的堂奥里占一席位，这是可以断言的。

27.11.1988

让电视每周放假一天

匈牙利星期一没有电视节目，冰岛每逢星期四让电视休息，“强迫”国民自形体与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到外面观赏，参与舞蹈、歌唱、戏剧、画展及其他的文娱活动。

52

日本朝日新闻曾访问举世闻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请他谈“现代”的特征以及“现代”的危机，汤恩比的谈话极其鞭辟入里，可惜无法在此尽录。他指出“现代”的最大特色是“科技的进步”，而这进步对物质发展有利，使世界在各领域的变化速度迅速，但这种科技进步“对于提高人的善意、良心、以及改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反而是不利的。”

为暴力而暴力

而就“现代”的危机，汤恩比除了指出代沟的严重化，环境污染，生态受到破坏这些问题外，他还特别语重心长地指出电视的不良影响，以及以电视为主的其他多元传播媒体所直接或间接促成的“各种暴力的增加，特别是没有动机的，为暴力而暴力的增加”。

换言之，电视一类的资讯媒体，很可能会成为现代文明的诅咒与罪恶之源，因为它们传播扩散扭曲了的资讯，造成了道德的污染。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不能提高人的善意与良心，反而造成人们之间的仇视、怨毒与伤害，以电视为主的大众传媒角色的被滥用、误用，实难辞其咎。

在电视前面困极睡去

许多家庭妇女，晚餐过后便扭开电视，一直到深夜。劳累了一天的上班族，回到家，冲凉吃饭过后，大多对著电视，不仅懒得参与其他活动，同

时也让“思想放假”，甚至连与家人在厅里欢聚谈天的天伦之乐也大幅“削减”。许多人在电视前面困极睡去，那个方盒子的荧光屏最后出现的空白，也许正是人们精神与心灵生活的最佳写照。

没有人能完全躲开电视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收看电视是每天的例行活动，就像刷牙齿、挖耳朵那样，你不一定喜欢这样做，但你不得不做，因为不做你会觉得“不爽”或“若有所失”，但同时意识的深处，某个声音在提醒你，这些习性是“不良的”、“没有什么意义的”。很多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警觉性较强的中产阶层，他们既需依赖电视消闲又会咒骂电视耗时费神，这种惯性的耽溺与事后的懊丧，长此以往，往往会造成病态的忧郁与不安。

思想与形体的禁锢

当然电视也有它良好的一面，它可以传递资讯，收到教育群众的功效。问题出在社会商业化之后，许多节目的摄制不讲求传达什么正确的观念与知识，而以刺激观众的感官为能事。走低级趣味、黄色桥段、暴力血腥的电视节目蔚为“主流”。人们虽然可以通过节目的选择，来躲开电视的负性影响，但实行起来往往遭遇困难，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可能会持异议，爱看打杀节目的孩子们更难与你“长期合作”。

就算你能贯彻“选择节目来看”的原则，但电视提供的教育仍是有缺憾的，因为它只引领（相对于“激发”）观众思考。观众是被动地被灌输某些意念（有些时候还是“假知识”），而不像读书，做研究那样主动地在发掘问题，寻求真知。电视不但局限了观众的想像空间，也禁锢了形体的活动，使可怜的人们困在厅的一角“动弹不得”。

电视播映6天制

在欧洲，匈牙利星期一没有电视节目，冰岛则每逢星期四让电视休

53

息，“强逼”国民自形体与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到外面观赏舞蹈、歌唱、戏剧、画展以及其他的文娱活动。

每逢电视放假，冰岛与匈牙利的大城人潮汹涌，文化性与艺术性的活动特别蓬勃。朋友三五成群，去聆赏音乐演奏者有之，一家大小联袂去看部好电影者有之，充满了人文的喜悦。

就国内的情形看，要把电视从现行的7天制减为6天，在可预见的将来似无可能。不过，人们却可自主地实行6天制，让电视每周放假一天，并且利用那天的时间，进行其他方式的休闲。或带孩子去游泳，或携家人去书展，或去听歌，或去观舞，或者干脆胼手胝足栽花种树好了，这总比天天对著电视好些。我们不可能把电视在休闲生活中取消掉，却可选择、以致于限制它的输出，不让它泛滥成灾。

29.11.1988

12月的舞展及其他

要艺术生根，仍需大众传媒的宣传与知识引导，行内行外的批评与反应，一方面引起广泛的注意有助于普及，另一方面形成建设性的回馈，让艺术工作者有机会反省检讨，俾改善增益。

这些日子常常接到新山陈再藩（即诗人画家小曼）打来的长途电话。每次谈过电话，我都激动得不能自己。

我自信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这些年来的知识训练与薰陶使我不轻易在重大的问题上动感情。陈再藩是一个热心的文化工作者，熟读金耀基与高希均，懂得接洽人事擅于营谋筹划，是观念人与行动人的综合体。他与我通电话，彼此的观点在电话线里互相碰撞，迸出火花，他感性的、甚至是情绪性的声音鞭挞我，掎击我，一直在提醒我不要忘了自己是个血犹热心未死的人。他的语言掀起潜伏在我体内原本刚锐的血气，使我激动，而且不能自己。

陈清水、陈连和出击

昨晚再藩又再来电，这趟是告诉我舞坛的新动态：陈连和12月中下旬，会先后在吉隆坡天后宫、新山宽中礼堂演出他的《蝴蝶梦外一章》、九舞的得奖名作《路》、《邀月》、《恋爱故事》等一干舞蹈项目。而另一位舞蹈家陈清水也将在12月下旬，到槟城、首都巡回推出他的“古典文学发表会”，舞目包括《黛玉葬花》、《白蛇传》、《林冲夜奔》、《秋瑾》等。两陈同时出击，声势浩大，肯定是舞蹈界一件盛事。

我与陈清水有一面之缘，曾并坐天后宫礼堂观赏《源之夜》的演出，可惜迄今仍不曾看过他编的舞剧，甚憾。再藩一再向我推荐，以他眼光之老到，相信成绩应该可观。据悉，陈连和观赏《黛玉葬花》尝喟然长叹：“美

得令人心痛！”行家评语，不会是没有根据的。

陈连和的舞，我只观赏过〈蝴蝶梦外一章〉，那是一出令我落泪的舞。舞者陈连和饰演梁山伯，他把梁山伯的绝望与悲苦，用身体语言强烈地戏剧化、具体化而且动态化了，“代人感”使我内里煎熬辗转，而终于不得不泪下泫然。近年来我聆歌读书看影片，接触多类的艺术表现，即使内心如何感动，仍晓得自我抑制。我已年逾40，行事多少得讲求一点分寸，大庭广众那样的挥洒热泪，虽说任真尽情，仍是我所愿意避免的。但是陈连和的舞鞭挞我，掎击我，并且冲破我感情的堤防，迫我落泪，使我激动得不能自己。

整合、沟通、挹注

从12月的舞展，谈到彼此最近的读书状况。再藩告诉我他正在读著高希均的《迷失中的城市》，我告诉他我阅读著孙震的《迈向富而好礼的社会》。再藩目下努力做著的是文化意识的普及化，他坚信“节，也是一种传承”。他从凸出华人的节庆著手，通过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企图唤醒民族于传说、神话、历史的“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我告诉再藩我目前把力量放在观念的传播与知识的灌输方面，而观念知识既为一体之两面，自可双管齐下。我认为知识观念不仅可以改变人们的心态与人生观，还可以充实，更新生活的内涵，有助于社会总体品质的提升。

我们谈到文化界的一项隐忧，当前国内的艺术文化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分歧与孤立化的现象。国内搞绘画的搞绘画，唱歌的唱歌，弄陶塑的弄陶塑，写作的写作，舞蹈的舞蹈，各有各的天地与活动空间，仿佛彼此互不相干，很少人会想到基于艺术的共通性，而尝试进行某种程度的整合、沟通与挹注。

反应与回顾

要艺术生根，仍需大众媒介的宣传与知识引导，行内行外的批评与反应，才能一方面引起广泛的注意有助于普及，另一方面又能形成建设性的回馈，让艺术工作者有机会反省检讨，俾有所改善增益。许多活动热闹了一两天便沉寂下来，至于活动的意义、影响及未来的取向，大众传媒没拨出多少版位去进行报导去讨论，而文化界、艺术界人仕多冷眼旁观，绝少有谁出来撰写专文进行探讨，这与台湾文化界的情况相去甚远。林怀民领导的云门舞集，诗人余光中、画家何怀硕、剧作家姚一苇等本行虽非舞蹈，但他们不仅衷心赞赏且一再撰文深入评析讨论，这情形在国内是难得看到的。

再藩与我都希望12月的舞展能引起多方的注意与回响。放下电话，我告诉自己，激动是不够的，甚至激动得不能自己仍是不够的。只有出席观赏，看到美妙的演出把外行人的不成熟底观感与印象写出来发表，才是对待艺术表现的扶掖力量。我们不能让艺术工作者永远寂寞，我们没有理由吝于鼓掌。

2.12.1988

何必耻言名利？

台大校长孙震博士，定于本月11日早上假首都希尔顿酒店主讲“台湾经济的自由化与实践”。

报载台大校长孙震博士即将前来大马演讲，笔者不认识孙博士，却读过他的两本论著《成长与稳定的奥秘》，《迈向富而好礼的社会》，觉得他的言论中肯且富于启迪作用，于新观念每多阐发，颇仪其人。

孙博士是经济学家，讨论问题用到他熟谙的本行知识乃理所当然。难得的是，他在撰文议论事象时，每能辅以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理念，使他的文章的可读性提高了不少。

《迈向富而好礼的社会》一书有两篇文章谈到“名”与“利”。作者以其清晰的思路、专业的知识，分析得既深刻而又浅显易解。本文尝试转述孙氏于名利的看法，并稍加引申，让读者有缘窥见“孙震思想”之一斑。

孔子曾看管仓库

孙震指出孔子甚少言利（“子罕言利”），不过孔子也不是完全没有追求财富的念头。用孔子自己的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之好。”孔子年幼时做过杂工（包括替人看管仓库），是用劳力换取财富。但孔子于不可求之财富，则淡然置之，无意强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反映出孔子不贪不义之财的潇洒襟怀。

孔子之后的诸儒则以言名利为耻，孟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视言利为小人之为。这种观念经继起的儒者一再强调，浸假形成知识阶层普遍以言名利为耻的畸形心态。大家心里虽然衷名利，嘴里却不敢或不便承认，“心是口非”，言行相悖。

其实追求名利并无不对。孙震以“社会报偿”（Social reward）“经济报偿”（Financial reward）的称谓来代替“名”“利”二字，并说明“名”指的是工作或职务的社会地位与评价，而“利”指的是工作或职务所换取到的金钱报酬。名利的追求，只要不是埋没天良，不择手段，凭努力循正途去获取，何耻之有？

社会之所以能进步，端在社会中的成员努力追求物质的富裕与精神的满足，前者是利，后者是名。名缰利锁，谁也逃不掉。个人无名利之心，便无进取之念；社会内部缺乏名利的趋骛，等于说“社会报偿制度”以及“经济报偿制度”两者都濒临崩溃，社会机能无法操作运行，危机便出现了。

两只无形的手

“经济报偿”与“社会报偿”这两种制度是两只无形的手，使社会的人力资源分配到各行各业去，使各工作领域都有人愿意“服务”。伐木、建筑、推泥的工作危险吗？不要紧，重赏之下有勇夫。“经济报偿制度”在这儿发挥了它的效能。从事舞蹈、绘画、人文或科学的研究，金钱的报酬可能极为有限，但当事人精神方面的成就感反而极大。此所以对于大多数的艺术家、学者、科学家而言，工作本身的意义以及社会的认可与赞许，远比金钱的酬劳重要。

孙震也指出仅凭“经济报偿制度”仍不足推动社会向前迈进，因为财富多至某个程度便会“失效”。对于一个富翁来说，衣食住行样样第一流，再增添的财富对他的物质生活便起不了作用，这时候社会报偿反而能引起当事人的兴趣。此所以一些大富豪腰缠万贯仍不断进行合并、收购，以扩大他的商业王国，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去年自己的银行排名世界第23，今年则希望挤进20名之内。有人千方百计要成为健力士纪录之最，目标亦不外为了“争名”，“夺利”反而是次要的考虑。

颜回的人生态度

笔者觉得孙震“批判”颜回的“一簞食，一瓢食，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人生态度，最有启发性。颜回的个人抉择也许是十分理性的执著，但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如此，大家都长期追求精神的快乐，而忽视了物质的富足，社会又怎样会丰富进步呢？孙震说得好：“一个社会没有进取的勇气，只知道调整自己的需要，不断降低自己的目标去适应技术所限定的社会生产力，这样也只是自我安慰。”这句话我想也适宜用在个人身上。一个人不思进取，只知道调整以致于降低自己的目标与需求去适应环境，还说自己不慕/淡泊名利，那简直在自欺欺人。

孙震博士的卓见洞识，自然不是笔者这篇短评所能概括的。他书上所论及其他观念如“外部不经济”(external diseconomies)都颇有兴味，值得向国人引介，碍于篇幅，唯有俟诸来日。

9.12.1988

有“言”千里一线牵

千里一线的电话相通，何如面对面的促膝谈心？信赖一个人，不能仅凭声音，还得审察其形貌表情。

再忙也得听电话

林伍因为腰腹常常作痛，到政府医院求诊。医生替他做了“扫描”之后，告诉他得留院。林伍心里忧虑，便追问主治医生自己患了什么病。是不是肾结石、胃溃疡、膀胱感染……医生避而不答，只要林伍少安毋躁，住院疗养。林伍本想再问，但看到医生面露不豫之色，只好忍住，但心里十分牵挂，终于他想到一个妙策：

“请问Dr.Wong在吗？哦，你是Dr.Wong。请问2号病房的那个病人林伍情形怎样？……我可以等……哦，如没什么变化三两天可出院，那太好了。我？您问我？我不是他的亲人，我就是林伍啊。谢谢您Dr.Wong。”

上面那番话是英语的中文翻译。聪明的林伍，通过医院里头的公共电话，终于探听到自己的病情。电话就是那么神奇，医生再忙、再不耐烦、再木讷寡言，总不得不去听电话和讲电话。医生肯“开金口”，病患者的情况便会露出若干端倪。

现代缩地术

电话的好处多极了，真个做到有“言”千里一线牵。甲在天涯，乙在海角，只要一方肯花钱拨出对方的正确号码，便能谈天、交心，或互诉衷情，或谈商业。通电话是现代人都能把握的缩地术，把异国他乡都缩短拉近成了左邻右里，可以方便地互通款曲。

但是电话亦正如电视，如果滥用误用不懂得选择性的使用，也会造成

不同程度的“灾害”。这儿“灾害”指的是荒废正事、浪费时间。

常看到政府与私人机构的员工，在办公时间内打私人电话，轻忽怠慢公事，影响服务素质，降低工作的“生产力”。有些私人电话，双方话匣子一打开，便扯个没完，时间1分钟1分钟地溜逝，半个小时一下子便过去，那段时间内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业务电话打进来，却因为电话尚在“讲话中”而驳不上。有些生意或业务讲求分秒必争的高效率，一两个电话接不上，对方便会联系他人或别间公司接洽买卖。想想看这会造成多重大的“无形损失”！

书信论学的传说

对很多人来说，通电话可以暂时名正言顺地撇开当前的不快现实（包括面前的文牍），躲到咀嚼体操的虚幻世界里。工作烦起来会想到摇电话与友人“聊聊天”，或者希望朋友恰在此际打电话来“解解闷”，都是变相的逃避，而这种颇能掩人耳目的逃避主义，乃古人所无，是现代科技的恩赐。

古人如果彼此需要联络，近者登门造访，远者写信请教。现代人不时兴这一套，因为拜访太麻烦，邮递更费时，反不如电话那样便捷。当然一些公务仍需书信为凭才符合程序，但信件往还往往只是例行手续，实际磋商老早便通过电话进行。如此一来，人们打电话的时候多，摇笔杆的时间少，语文旷废日久，自然便会退步。

记得已故唐君毅教授曾赞扬中国知识份子“书信论学”的人文传统，这传统在五四、三四十年代人物的书札仍可得到印证。随著生活节奏的加速，电话的日益普遍，“书信论学”的人文传统经被“电话闲聊”的科技现象所逐渐取代，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变成了一出口便消失在电话筒中的声音，慎密的思绪淡化成稀松的言语，我们宁不慨叹文化的“无形损失”！

相交却无由深交

而电话之所谓加强人际联系，思之亦非尽然。千里一线的电话相通，何如面对面的促膝谈心？信赖一个人，不能仅凭声音，还得审察其形貌表情。此所以电话那么发达，唯男女“相亲”仍得双方叙面，不能假借电话听声辨形。

有时听报馆的朋友谈起：“某某人我和他通过多次电话，我和他可说‘认识’的，就是缘悭一面。”这句话透露了一个重大玄机，电话这种本来要造福人际关系的科技产物，反而造成实际的人际疏离。认识而素未谋面，相交却无由深交，很多时候都是电话以及电话使用者造成的，这现象，文学批评有一个颇恰切的术语谓之“嘲弄”（irony），然则人们为什么不想想，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嘲弄的播弄呢？

22.12.1988

“感性消费”初探

进入80年代，日本商界倡言“感性消费时代已经到来！”而什么是“感性消费”，以及它未来的趋势、取向与潜能，国内还没有多少人真正去留意。

64

椰菜布娃娃登陆

5年前，吉隆坡与怡保两地的美罗超级市场突然宣布让顾客“领养”一种叫著 Cabbage Baby 的布娃娃。领养的手续包括填表、出“报生纸”、付钱，还得签名保证善待它，爱护它。而Cabbage Baby——暂译作椰菜布娃娃，正如其他的玩具布娃娃，并没有生命，它的样子也不怎样讨人喜爱，苦瓜脸，衣著平凡。椰菜布娃娃一上市，我第一个便冲进去“美罗”，我很快便听说这种布娃娃在美国市场出现时曾掀起“领养”的热潮，我要看看这是什么东西，魅力在那里。

椰菜布娃娃在国内并没有造成什么领养热（其实是购买热），这和美国家长蜂拥认养、大排长龙的情形，相去不啻霄壤。椰菜布娃娃从美国被引进欧洲、日本，一样受到热烈的欢迎，何以在马来西亚登陆，却无功而返？我的看法是，5年前国内消费者感性消费的需求，还没有臻至接受椰菜娃娃的水平。如果椰菜布娃娃（或它的同类）在1990年卷土重来，胜算就高多了。

Christian Dior的销售情况

马来西亚的感性消费不能与欧美比较，亦远逊于港台两地（日本更不必说了）。这项客观判断并不带任何褒贬的意味，因为感性消费的高低/强弱，不必等同道德表现的高低/强弱。

我每到港台两地，总会找些时间逛化妆品商店与Boutique，在台北的中正机场与香港的启德机场，我也没忘了浏览不同摊位上各种牌子的香水、哥龙。我们的时装款式约落后港台一年以上。当Christian Dior（一种简称为CD的化妆产品）出现在香港大大小小的女性商店最显眼的位置超过3年后的今天，整个怡保市没有一家CD的分店，近打超级市场曾设CD销售单位，但经营不久便移师他往。就算在吉隆坡也不够普遍，印象中只有八百伴、金河、梳邦等几家规模较大的超级市场有分店。这证明了国内感性消费仍在初步苗长，“含苞待放”。

65

女性贴身工业

国内的感性消费在化妆品、内衣、丝袜、泳衣、卫生棉这些“女性贴身工业”仍不够蓬勃、多元。至于美容、皮肤护理这些女性服务业，愿意付数千零吉去学的人不在少数，不过美容/皮肤护理课程的内容，就和讲师的素质那样十分参差不齐，学员有些语文基础甚弱（当中有不少是SRP考试筛出来的离校生），很明显的，这些女性服务业的总体品质仍有待改善。

这改善牵涉到观念的彻底改变。美容学院的主持人不能再没有选择性的收生，学员应该像参加其他行业的专业训练那样，应该具备最低的学术资格（没有若干教育的根底，吸收新知不易）。不是每个人都适宜从事化妆品的促销，美容、皮肤护理这一类需要“心思细腻，有耐性、态度温和、谈吐大方”的工作。因此收生必须先经面试，验明申请者是否适性，这是训练高品质美容专业师应采的步骤。

高品质、高代价

还有我要在这儿提出“高品质、高代价”的观念以取代“薄利多销”的落伍观念。任何感性消费工业都不宜薄利多销，因为感性消费的对象是中产

或中产以上的逸豫阶级，逸豫阶级喜欢名牌（我们付给名牌的“冤枉钱”便是感性消费），讲究时尚与风格。生产者必须了解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然后提供“感性的满足”。有时这种感性的满足只是在一条牛仔裤后面多绣上一个商标／图案，但对于消费者本身意义却不寻常。消费人享受那种“虚荣”，好，但他得为那虚荣付出额外的金钱代价。

因此当一些怡保的美容师告诉我，她们只收费10元、15元时，我知道她们的服务促销方式错误。美容、肤护不是卖猪肠粉，贱价那里来的高品质？我甚至有点担心一些妇女会被劣等化妆品弄坏了她们一生只能拥有一次的肌肤。

环境情调工业

近年来感性消费文化的逐渐崛起，有一个颇为显著的征象，是环境情调工业的抬头。咖啡屋多了，卡拉OK也自日本南侵，紫藤坊开了一间又一间，然后是人长久茶坊……不能说像雨后春笋（那会言过其实），但可真是方兴未艾。顾客多付一点钱，买冷气、装饰、布置、设备构成的环境情调，这便是我所说的感性消费。

也许富于冒险精神，勇于创业试探的商贾会好奇／热切的问，感性消费的未来取向怎样？还有什么感性消费行业可以大展拳脚？前面谈过的各行业，到了饱和点没有？能不能企业化，注入大量资金搞热它？我不能在这儿答覆这些问题。要知道答案的商家得付出金钱去购买拟定企业战略的情报与观念。

24.12.1988

学习爱自己

给自己一点压力，让压力成为恒在鞭策自己的力量，让自己在健康的压力下不断改善自己，不断在求进取！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句沉重的话道出了人类自私为己的事实。只是“自私自利”并不等于真个懂得爱自己，不少极其自私的人非但不懂得怎样爱惜、爱护自己，反而有意无意间进行自我毁伤，浪费青春，虚掷生命。

自我映象与自我实现

笔者曾撰文讨论过“自我概念”（Self concept），说明人必须真正了解自己。我认为“爱护自己”必须建立在“了解自己”这个基础上面才是稳固的。了解自己的能力和才干，知道自己的优点与缺点，懂得自己的性向与兴趣，对自己是什么料子，有一个透澈的、清晰的“自我映象”（Self image）之后，人始能就已获知的自我资讯，改善或纠正自己的缺点，加强并利用自己所擅长，通过“自我调适”（self adjustment），迈向“自我实现”（self fulfilment）的目标。

爱惜和爱护自己当然不是纵容放任自己。懂得扩充自己的生活内涵，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不断求进步，让自己活得愉快充实才是真正爱护自己的人。此所以“爱自己”也是一种学习。人都有惰性，难免会苟且偷安，所以生活、知识层面的扩展需要主观的努力，克服怠惰心，提升进取心，才能为功。参与各种益智性的活动，进行有计划的阅读，参加语文课程（如国语、英语、日语）或其他才艺训练（钢琴、插花、美容、裁剪、舞蹈、绘画、服装设计均属于此类）都需要毅力，才能持续不懈，有所成就。如果跟著大伙“扩充经验，拓展视野”只是赶时髦，仅有那5分钟的热度，那不是在学习爱自己，而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生活的铁三角

一个不懂得爱自己的人，通常都是时间的奴隶，浑浑噩噩渡日，不懂得怎样分配时间去从事有益身心的活动。懂得爱自己的人则不然，他善于把握、主宰时间，工作时勤奋，消闲时适性、运动时尽情。他了解工作、消闲、运动是生活的铁三角，缺一角都不行，所以每一角他都照顾周全，不使其偏废。他明白脑力消耗如果没有适度的休憩便无法长期健康运作，而过度的休憩与逸乐，懒散一旦成习，适足以戕伤心智与灵性的发展。

爱自己的人，不会允许自己耽溺于嫖赌饮吹一类的恶习，他晓得这些恶习不仅耗财，而且斫丧身心。这种斫丧来自“自我映象”的破碎/破灭，当一个人因为赌博、酗酒等恶习而变得自暴自弃，他的价值观即告扭曲紊乱，什么新知的追求，观念的把握以致于生活品质的改善与提升，对他都成了毫无意义的“高调”，只有能为他换取到片刻感官刺激的金钱对他才是有用的东西。人，一旦沦落到那种地步，便可以说是澈头彻底失败了。

给自己一点压力

很多人都主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这看法大致上是对的，但是没有压力的人生其实是颇乏味的，没有压力与挑战，便没有克服艰难、击退挑战的成就感。而且人生活在没有压力、风平浪静的环境下太久会变得慵懒、无聊、呆滞，甚至连应变的本能都会衰退，连天赋的敏感都会钝化。持平的看法应该是不断给自己一点压力，让压力成为恒在鞭策自己的力量，笔者以为真正爱自己的人都懂得怎样给自己压力，让自己在健康的压力下不断改善自己，不断在求进取！

笔者有缘认识到几位自学成功的人士，他们出身平凡，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只有一位大学肄业），但他们仪态大方，神采焕然，谈吐合度，见解新锐。在任何环境与什么人相处，他们都从容淡定，洒脱自然，绝无患得

患失的窘态。他们挥洒自内在而与外表融浑在一起的那份坦荡与自信，是从生活的体验与历练得来的，也是知识与观念潜移与默化的结果。

爱自己的人追求卓越，谋求突破，不让自己懒下来，爱自己的人懂得“活到老，学到老”的平凡道理，而且身体力行，爱自己的人，晓得在适当的时候给自己一些压力，一些鞭策。你爱自己吗？你愿意学习爱自己吗？

27.12.1988

“全国大专文学奖”评审有感

本届全国大专文学奖的散文作品，约有40%处理流浪主题与亲情主题。这种题材的偏嗜现象是否反映了大专文艺青年的某些心态与郁结？

70

潜能丰富，成就可期

这是笔者第二趟担任槟城理科大学主办的“全国大专文学奖”散文部份的评审。读毕57篇散文作品，身心俱疲，但心情却是欣喜兴奋的，因为参赛的大部份作品文笔都不错。我甚至敢大胆地预言，近三分一的同学有丰厚的潜能成为未来马华文坛成就可期的散文作家。在马华文学有份量的散文作家日趋寥落的今天，能亲睹新一代在他们的作品里展其身手，试其清音，毋宁是一件快慰的事。

但赞美不是这篇评论的目的，这篇短评甚至不能算是一篇文学批评。我更关心的是当前的在籍大学生，在他们的作品里流露出来怎样的意识与心态。

我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57篇作品当中有12篇是处理搭巴士、火车、船只及其他交通工具的经验，以及旅程中所引发的感想／遐想。另外11篇是写母亲、父亲连带地写家人与家乡的怀念／回忆。前者处理的是流浪主题，后者可以泛称为思亲／思乡主题，这两个主题加起来占了57篇作品中的40%强，成为全国大专学生文艺青年所喜欢或有把握处理的“强势题旨”（Major theme），这现象就有些不寻常，值得我们去探讨。

流浪主题与思亲主题

我之所以把流浪主题与思亲／思乡主题合起来观照，因为这两个主题

实为同一硬币之两面。流浪主题所反映的飘泊感，以及安全感的欠缺／丧失，往往要依附到思亲或思乡的情愫上面才能重获心灵的慰安与精神上的解脱。

在12篇以流浪为题旨的作品中，除了其中两篇流露出徜徉山水乐在其间的wonderlust之外，大多数的篇章宣泄的反而是游子的无奈、抑郁情怀，精神所蒙受的困顿以及肉身的疲累感。笔者曾尝试从“流放文学”（Literature of Exile）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但我找不到流放文学／放逐文学特具的“国家、民族、文化问题所形成的种种纠结与矛盾”。文学批评家Harry Levin尝谓：“在流放中的作家是人生经验最深刻的证人。”但我们的大专文艺青年肯定不符这标准；事实上，他们最缺乏的正是人生的深刻体验。

71

以亲情为“枕垫”

也因为这样，我手上这些作品里头的流浪情节只能算是“游子情意结”的具体化与戏剧化，缺乏流放文学的思想境界与深度。这种“游子情意结”之所以产生，根由大概如是：一群20来岁的年轻人，离乡别井到吉隆坡、檳城、怡保、新山等城市的高等学府求学或受训。他们离开故土，却又眷恋著故土的人事人物，感觉到隔绝的孤苦难熬。这种孤绝感再加上功课的压力、境遇的未尽如意，便形成这群大专文艺青年内心的郁结，下笔为文，创作的神思长上了羽翼，作者要嘛想像自己正在流浪与被放逐，并著意描绘流放过程中所遭遇到各种异质因素的冲击，要嘛便是刻划自己与父母家人相处在一起那种温馨，以亲情作为“文化枕垫”去对抗陌生的环境所带给自己的压力。

关于“文化枕垫”一说，那是孙隆基于他的巨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一项发现。作者指出中国文化里头有许多“枕垫”，方便中国人在面对打击与挫折时退到“枕垫”里去寻找庇护。孙先生的见解或许可以用来解释当前好些大专文艺青年的情况。他们在面对新环境的层压，心理上一时适应不来，于是便在他们的作品宣泄流放的情绪（逃避不快的现实），而他们

当中的不少人却选择躲到亲情（对父母的位依恋）那种“母胎化”的环境去重觅安全感。

如果我的推论正确，那么这23篇作品所处理的流放主题与亲情主题，反映出来的真相是：约40%强的大专文艺青年（指参赛者）他们不满现实，思想稚嫩，感情敏锐但脆弱，心理上有相当强烈的依赖倾向。同类的作品太多，我想对任何担任评审工作的人都是很累的事，所幸他们当中不乏文字、技巧都臻上乘的好手，所以其中仍有两三篇，受推荐进入最佳10名之列。

1.1.1989

观念与创意的世界

把“走路”与“音响”这两个观念组合起来，这个创意导至“随身听”（Walkman）的发明，并为日本新力公司带来巨利。

Dunhill, Marlboro, Salem

让我们比较一下3家外国商业机构的广告促销意念与设计。以名称的英文字母先后来排序，这3家公司分别是“登喜”（Dunhill），“马波罗”（Marlboro）与“沙林”（Salem）。

“登喜”的广告设计以上流社会人物的聚会、休闲、运动为背景，凸出手表、钢笔、皮包、衣服、领带等产品的精致美观，画面以金、红、黑三色为搭配，来营造一种高贵、豪华的气派。“马波罗”以牛仔、皮靴、马匹加上原野的策骑，来展现一个自由粗犷，令人愉悦而又接近大自然的西部世界。“沙林”则以舞者的动感，歌者的引吭，色彩的跃动来凸出一种现代感，一种活力奔放的情调。

3种不同的广告形式都有它们各自的机心与主题，传递著某种特殊的创意与感性。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往往系乎一念，这一念包含很浓的感性需求成份，哪种产品能提供消费者“感性的满足”，那种产品便能畅销。广告摄制人塑造某种形象，让消费者“认同”（identify）。“登喜”的董事长／总经理／高层主管的形象，以及“沙林”热力四溢、劲道十足的歌舞艺人形象都有它们的拥趸，这些拥趸由于心理认同的驱使，而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产品的忠实消费群。

绾接异质观念

也许有人会提出下面的质询：手表、钢笔、服装这些物件为什么一定



要与上流社会扯上关系？你不觉得“马波罗”香烟与西部牛仔的原野策骑风马牛不相及吗？劲歌热舞怎会与“沙林”搞在一起的？

问题的答案涉及观念与创意。把两个异质的观念绾接在一起，而又合乎逻辑便是创意。上流社会的生活形态与公司的产品排列组合在一起，突出产品的优越性，是创意。原野策骑的牛仔世界，既粗犷而又接近大自然，正是烟霞客所响往的境界，是另一个大胆的创意。劲歌热舞洋溢出来的现代感，适足以满足消费人追求时尚的心理，这样的创意谁说不宜。著名广告人李奥彭列（Leo Burnett）曾指出每种产品都具有自身的戏剧性，广告设计人的任务是把产品内在的故事成功地说出来或演出来。

价值连城的创意

观念与创意不仅用在广告术与各种传播媒体方面，所有的艺术表现（文学、雕刻、美术、建筑、电影……）莫不需要通过创意去重组观念，去形塑另一个新颖的世界／境界。

创意可以卖钱，因为它是企业创新（Innovation）的原动力，新发明，新产品甚至新计划的出现，有赖商业创意提供灵感。

日本新力公司的总裁盛田昭夫，某日在街头见到孩童，一边拿著录音机，一边在唱歌跳舞，灵机一触（那是创意发出火花），于是便把“走路”与“音响”这两个观念组合在一起，发明了一种携带方便可以边听边走的电器产品Walkman。关于Walkman所造成的购买热潮及销售数量，已经被公认为是奇迹。最妙的是这项发明几乎不涉及技术上的任何突破，它只纯然把走路与音响这两项看来毫不相关的活动绾接在一起，便替新力公司带来巨利。创意有时并不复杂，但却价值连城。

台湾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漫画家蔡志忠，他用轻松、解颐的手法来表达先圣严肃深刻的哲理，出版了一系列的漫画集，一时洛阳为之纸贵（《庄子说》漫画册出版于1986年，到1988年3月已售出78版，其他画册销售亦可观），为各方瞩目（蔡志忠于1985年当选为中华民国10大杰出青年），连亚洲周刊

都为这位漫画大王作出封面人物专题报导。

另一个例子是《柏杨版资治通鉴》这套书的策划与出版。这套书的创意指导詹宏志先生与他的朋友，看出资治通鉴这部经典之作有它的市场潜力，而柏杨加上资治通鉴肯定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组合，基于这个信念《柏杨版资治通鉴》的写作工程于焉开始，资治通鉴通过博学多识的柏杨底诠释，对现代读者又恢复了吸引力。

联想与启示

从这些事例，笔者联想到目前国内企业界、文化界甚至政界的低迷不振景象，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社会普遍缺乏创意。我们不晓得怎样去凸出主题，我们在传达讯息与感性方面出现了授与受之间的断层。我们都过于墨守前规，缺乏冒险犯难的精神。我们更没有“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相斥的因素冶于一炉”的智慧与勇气。

12.1.1989

“新贫阶层”的动向

房屋贷款的偿还，汽车的分期付款，子女教育费的日益沉重，把月入两三千零吉的中等家庭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一个庞大的“新贫阶层”（The New Poor）便出现了。

76 一个人数众多的“新贫阶层”（The New Poor）正在迅速崛起，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骨干，这现象在国内似乎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属初探性质，着重于讨论这个阶层的身份符号、消费习惯以及感性需求。

月入数千仍叹穷

必须在这儿先指出的是，“新贫”有异于大家所熟知的“赤贫”。“赤贫”指的是无收入的失业人士或收入低微，三餐不继的阶层；而“新贫”家庭每月所得1千到4千零吉不等，奇怪的是这些月入4个数码的人口手头却常感拮据。

“新贫”外表看不出任何贫穷的迹象，他们有汽车（多是达善、多裕达与愈来愈通行的国产车 Proton Saga）、洋房（单层或双层排屋居多，间中也有人拥有半独立或独立式洋楼者），子女除了在学校受教育外还念补习并且学著其他的技艺（电脑、芭蕾、钢琴），衣食住行大致上都还体面，绝无挨饿受寒、衣衫褴褛的窘态。他们撙节度日，每月却难得有什么储蓄。

借贷造成的经济支绌

造成新贫阶层经济拮据的主因是大量而又必须的借贷。房子是以贷款方式购下的，汽车是供期的，每月需偿还的款项占了薪金的三分之一或更多。加上子女的教育费，以及日常生活水准的维系于不坠，剩下的闲钱便极有

限了。

新贫阶层的成员包括大部份的公务员以及私人机构的中下层／中层／中上层白领。这些社会成员都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教育，其中有不少还是大学生。他们重视生活的品质，现代生活的三C（汽车 car，冷气机 cooler，彩色电视 color TV）对他们而言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除了这三项，冰箱与洗衣机也成为“应该买下来的物品”。由于手头没有什么现款可资周转，新贫们只能又采取分期付款的“下策”先行购置，再逐月摊还，于是每月从薪水那儿被扣去还债的数目便愈来愈大了。

不要忘了上述那些电器都是耗电的（尤其是冷气机），每月的电费开销相应地增加了。加上私营化之后的电话费比从前调高了不少，新贫家庭花在偿付电话、水电、瓦斯这类开销估计达薪金总额的15%到20%，换言之，1千零吉的薪水得拿出百多200元去支付这些杂项，新贫们表面不敢声张，内心却暗自叫苦。

每周打一次牙祭

为了改善经济处境，不少勤劳肯干的新贫们毅然选择兼职。多赚点外快，是为了让自己手头宽裕些，可以买些自己喜爱的物品。可能的话，星期天一家大小到酒楼打打牙祭（不少新贫家庭一周6天搭伙食），偶尔也可携同家人到国内的旅游胜地像槟城、波德申、邦咯、福隆港、金马仑、云顶盘桓两三日。

新贫选择的副业，以代理保险，担任家教，替一些商行整理账目以及从事直销生意居多。家教的科目以国文、英文、数理最热门，直销则以 Amway 产品，矿泉壶等较普遍。

最苦的是45岁到55岁的新贫们。踏入中年，孩子们一个个念完中学，跨进学院或大学的门槛，孩子得送去吉隆坡、檳城甚至海外深造。教育费一下子猛涨，使本来在经济上已捉襟见肘的新贫们有雪上加霜之感。

价廉物美主义

由于经济不够宽裕，新贫们不得不十分警觉，能节约就节约。他们的消费取向是以“价廉物美”为准绳。他们买不起名牌，不过却晓得细心从普通牌子当中寻求配件。以服饰而论，只要配搭得宜，一件价格廉宜的棉质衣裙也能衬出时髦的趣味。新贫的主妇们不能像富家太太每隔数天就去美容护肤一趟，但却可以每月去一次。高价商品，他们买不起，却无碍他们浏览橱窗。

新贫阶层的男仕很少会为了虚荣去购买Louis Philippe, Arnold Palmer, Belano, Crocodile一类昂贵的T恤或衬衫，但他们却可从Orlando, GQ, Padini, Charlie, John Master 这些品质良好价格合理的牌子寻得感性的满足，当然不是“最大的满足”，但“也差不多了”。

大抵而言，新贫们懂得等候购物的适当时机，超级市场如有大倾销，主妇们必定倾巢而出，觑准良机，“择肥而噬”。新贫们平日十分留意各类商品的情报，鉴赏能力颇强，对产品与服务的品质及价格非常敏感。

新贫阶层的问题是物质倾向过强，对于进补保健，个人修养、精神生活的提升关注得不够，不过这已牵涉到其他的文化、社会因素，这方面的探讨只能俟诸来日。

22.1.1989

形象与促销

人们在讲究产品素质的同时，也重视产品的包装，市场上品质良好的同类产品实在太多了，能区别的只有产品的形象。

黄沾、倪匡、蔡澜

报载香港文坛3名嘴黄沾、倪匡、蔡澜已被亚视成功罗致出来主持一项清淡节目。一般香港电视观众颇看好预告中的新节目，因为3位名嘴都博学多闻，阅历丰富，再加上他们谈吐风趣，鬼马抵死，相信内容必定荤素杂陈，甚为可观。

3位名嘴都深谙自我宣传、自我推销之道，黄沾的不文古惑，倪匡的吹嘘逞强，蔡澜的杂学多才，通过他们的专栏文章，已出版的书籍及经常出现的各类访谈成功凸出了各自的“形象”，国内读者/观众虽说无缘识荆，对他们却不会感到陌生。

黄、倪、蔡是文化界/娱乐界的“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形象通常都是大众传播媒体刻意制造出来的。60年代的某位女演员号称“大哺乳动物”（中年观众应该还记得她的艺名吧？），80年代又出现另一位“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耳材”的女星，我不必透露她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她是谁，为甚么？因为大家都记得传媒提供的那个“形象”，那个“概念化了的人”。

“概念化了的人”和“真实的人”差别往往很大，甚至南辕北辙，完全不是那回事。兹举一例，大家都知道香港艺员卢海鹏擅于搞笑，他乔装其他歌星艺员登台演唱，举止神态模仿得颇为神似，令人绝倒。在大家心目中，他是善于“扮野”的笑匠。不久前他来大马参加演出，一些记者竟以为此人“搞搞笑”，大声喊他“光头佬”，卢海鹏的反应是一脸肃然，不予理睬。

认识卢海鹏的人，都知道他绝非“癫癫废废”之徒，平日虽也开开心笑，但却不喜胡闹。真实的卢海鹏虽然与概念化了的卢海鹏相去甚远。把概

念化了的视为真实的人便难免要碰钉子了。

形象与实质

娱乐圈讲究形象、包装，政界、企业界亦同样讲究形象包装，但包装要装得像就不能没有几成真本钱。张仲文胸脯伟大，才能冠以“大哺乳动物”，利智人颇美艳，身材又好，才有宣传人员替她想出“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这种耸人听闻的标语。

前政界某红人被誉为“现代陶朱公”，那是因为当事人确是长袖善舞，搞大企业搞得有声有色，这些都是实际的表现与真正的条件内涵。至于“现代陶朱公”后来搞到一身债，甚至被控上法庭，他的经营方针何以不灵光，他的企管策略那里出了岔子，大众传媒当然不会为当年错塑形象，误导读者甚至造成相当程度的社会灾害作出什么解释或澄清。公众得为自己识别的不足付出代价。

促销游戏的重点

在过去，国内工商业的竞争讲究的是成本能不能压低。成本廉宜（廉价的劳工与原料），产品售价不高，竞争力便相应提高，有条件争霸市场。70年代以降，人们愈来愈重视品质，愈经久耐用，坚固结实，功能多效果好的产品，市场竞争力愈强。迈入80年代，人们在讲究产品素质的同时，也重视产品的包装，因为市场上品质良好的同类产品实在太多了，能区别的只有产品的形象。促销游戏转而强调产品的特色、身份、气氛、情调以争取消费人的心理认同；产品要凸出的是各自的形象。

只要大家稍稍注意报章杂志的广告，60年代与今日的广告标语内容重点可谓大异其趣。过去的广告语强调产品的便宜、耐久、经用，今天的广告措词则凸出产品的优越、高贵与权威感。

“个人企业特色”

产品要卖出去便得讲求形象和包装，个人要打响知名度也得讲究形象与包装。公共关系学有一新颖的术语谓之“个人企业特色”（Personal Corporate Identity）。皮礼士利的“猫王”形象，佐治男孩的“男扮女装”，梅艳芳的“坏女孩”形象（妖女是坏女孩的改装，基调其实相同），这些形象正是他们各自的Corporate Identity，使他们成为拥趸的偶像。

黄沾、倪匡、蔡澜3人点子多，又喜“语不惊人不死不休”，这些条件恰好是他们的个人企业特色，这种特色甚至在金牌司仪何守信身上都找不到。亚视出奇招罗致到这3人搞Talk Show，难怪无线高层要“槌心口”的。

3.2.1989

新富阶层的符号与特征

受薪的上班族纵使衣著光鲜华丽，在一流的大公司任职，他们仍属“经济的弱者”。上班族的生活命脉为企业老板所操纵而非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旦被解雇生活马上便发生问题。

写成了“新贫阶层的动向”，友侪要我也谈谈“新富阶层”（The New Rich）的情形。下文笔者先比较新富与新贫之间的区别，然后再论及新富的行为特征与符号系统。

个人对贫富的看法不采用国民平均所得以及贫穷线一类的依据，我的根据是最粗略的，也是最常识性的。我觉得“穷”是“当你觉得钱不够用，或处处得节省，因为不撙节便无法应付日常的开销”；而“富”恰恰相反，“富”的情形是“钱包麦克麦克，永远有化不完的钱，可以随意买自己喜爱的东西。”

一点豪华主义

在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可以随意买自己喜爱的东西”这句话里的“随意”二字。新贫阶级也能买自己喜爱的东西，就是不能随意。新贫为了买一双漂亮的高跟鞋或一只名表，往往要盘算了好久。许多时候，他得储蓄数月，甚至一两年，“集中火力”一举购下心目中的“奢侈品”。这种节衣缩食挤下一点钱来痛快用一次的购物方式，日本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Hakubodo Institute Of Life and Living）的研究报告称之为“一点豪华主义”。

经济的弱者

新富之所以致富，原因很多，现代社会是一个内部流动性极大的总

体，富有者可以因为生意失败一夜之间打入穷籍，而贫者如果肯努力向上，碰到机会能够把握，也可摆脱贫穷晋身富有阶层，至于其他靠所谓横偏财翻身一变成成为富者亦所在多有，在这里我们不必追究他们致富的原因。我们要区别的是新富与新贫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经济状况宽裕，可以随心所欲从事各种消费活动，而后者常常都面对“有心无力”的困窘。

另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受薪的上班族纵使衣著光鲜华丽，男的打领带、穿部长装、女的穿时髦的服饰在一流的大公司上班，他们仍是“经济的弱者”。虽然大部份上班族错觉自己属于所谓“中等人家”，事实上一旦他们被解雇，生活便发生问题，他们的生活命脉为企业老板／雇用者所操纵，而非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是如假包换的“经济的弱者”（The Financially Weak）。马来西亚政治的成功其中一个征象便是，许多实际上是“经济弱者”的贫者却认为自己是“中等阶层”或“小康之家”。这种错觉的最大“贡献”是它奠定了社会稳定的基础。

信用卡的持有者

新富的身份符号不仅可从他们的消费行为看出，也可从他们的拥有物及其他活动面向窥见。新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通常是VOLVO, BMW与Mercedes Benz，由于日圆上涨，目前能拥有簇新的 Honda Accord 已被公众一般上视为富者（或小富）。不少新富家庭往往拥有两部或两部以上的车子，一些家庭甚至雇有自己的车夫，而更明显的另一特征是，新富阶层的许多成员是信用卡的持有者与使用者。

新富在服装方面讲究品质的豪华精致与“追上潮流”，他们喜欢买高级用品与名牌商品，妇女多数有自己的服装设计师为她们缝制衣饰。新富为了显示他们的身份，通常总爱参加一些为特殊阶级而设的休闲俱乐部，即使他们不会游泳，他们也愿意化个几千零吉申请成为市内游泳协会的会员。新富爱打网球，高尔夫球，女性则十分关注美容护肤及其他的 Keep-Fit 课程，对电影，歌曲等流行的新生事物通常都相当留意。

在住宅的大厅上，新富总爱买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来装饰门面，当然玻璃柜少不了X.O.一类的名贵洋酒。男仕们当中有不少喜欢在酒廊，卡拉OK，歌厅，夜总会流连，打发他们的闲暇或进行他们的社交活动。

家居似酒廊

就笔者所视察到的，新富的通病是“暴发户心态”的流露，这情形尤以教育程度偏底，致富的过程迅速（比方说中了马票或从事某种商业投机活动找到钱）最是显著。

这些新富的骄者表现可从他们日常的器用与消费行为窥见。他们如果购下新车，总喜在车子里里外外安装许多不必要的炫耀物，把车子弄得怪模怪样。由于常常流连于酒廊、夜总会，当他们装修住宅时（这也是一种炫耀行为），往往会不知不觉以酒廊歌厅的内部装饰设计为蓝本，在大厅里挖个大洞置放沙发者有之，天花板髹漆成五彩缤纷者有之，普通排屋周围墙壁却砌以昂贵的大理石者有之，予人的印象不仅是不协调而且还十分俗俗。

新富要改善他们的品味，恐怕仍得从读书、寻求新知著手，高希均教授建议新富家庭应以书柜代替酒柜是有他的睿见的。物质的丰富化必须加上精神的充实化，才能真正落实提升生活素质的理想。

11.2.1989

作家不是E.T.

——文学做秀收费论

国内有关投资、就业、股市分析的讲座，主讲人收费过千零吉是平常事，何以作家上台现身说法，讲知识观念，主办当局却从未想过付任何酬金？

余光中来马演讲

余光中教授前些时候应邀前来吉隆坡讲演，这是他第2次访马，演讲费据文化圈内的朋友相告是1千元美金。上回（1982年）余先生前来大马，主办当局是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笔者负责联络与接待。余先生那趟来马演讲，事前并无要求酬劳，但我在文协理事会上仍为他争取到五百零吉的演讲费。

作家做秀，给予酬金，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歌星艺员演出一晚，报酬上万者所在多有。邓丽君做秀一晚收费高达40万台币（约值马币4万），我们的名作家／诗人／画家／舞蹈家／作曲家做秀一趟要求合理的金钱回报，何来不妥？

或许有人会说，作家是清高的，讲钱就俗气了。说这种话的人，大概以为作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E.T.吧？国内有关投资指导、股市分析、就业机会、专业研讨的讲座，讲师收费过千零吉是平常事，何以作家、文化人上台现身说法，谈创作技巧，文学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的知识观念，主办单位却不付任何酬金？何厚此而薄彼？作家也是人，他们也有常人的感受。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心里同样会感到愤懑不快的。

物轻情义重？

文学做秀，说来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讲题有了，得找资料，有了足够的资料，得爬梳芟治，使这些资料变成自己理论的血肉，这思考、整理的过程是相当艰苦的。做秀前的两三天，作家通常情绪会特别紧张，伤风感冒咳嗽喉咙痒一类的毛病纷至沓来，成药买了一罐又一罐，等到毛病治好了，中气又不足了（大概是吃药后的副作用），又得吩咐家人炖鸡来调补。当然买药和炖鸡都是消费行为，要自掏腰包的。

上台的24小时前，任何有点showmanship的作家都会温习讲稿一遍，并且作“最后的冲刺”，啃下一些与讲题有关系的辅助资料/次级资料作为后备之需，避免被听众的提问难倒。然后是主讲人台上的讲演，奋战一个多小时，唇焦舌敝，主办当局为表谢忱，颁赠纪念牌一盾，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有勇气询问这纪念盾值三块还是五元，鉴于“清高”那顶帽子，又想到“物轻情义重”的古训，作家只好哑子吃黄连，不敢吭声。当作家想到家里的杂物室还存放著二三十个大同小异的纪念盾时，他只好对著记者的镁光灯苦笑

合理的酬报

可能有人会辩说，主办当局邀请作家演说，通常都会负责作家的交通及住宿费，因此作家并没“吃亏”云云。说这话的人只用到他的小脑，大脑显然还是在休假状态。如果不是为了做秀，作家大可住在家里，何必客居酒店？如果不是为了做秀，作家何必风尘仆仆，南下北上？即使主办当局愿意提供来回机票，那又怎样？那不过是改变一下舟车劳顿的方式和节省一些时间而已。说起来主办当局负责作家的交通膳宿，乃理所当然，根本不是什么“恩赐”。应该关注的是，作家准备讲稿所花的时间心血，他演讲时所付出的精神魄力（不用付出精神魄力的演讲不配称为演讲），有没有得到合理的酬报？

可笑的是，有些主办当局把交通住宿费视为付还给作家做秀的酬劳。而有些主办当局事先虽与作家谈好了交通膳宿的安排，做秀完毕却忘了“付账”。更有些主办当局事先说好奉上150元，事后却“因经费不足，仅能付上马币100元，并祈笑纳”，林林总总的怪招，直把作家当E.T.来耍。

个人的不快体验

笔者的个人体验，也许可供读者一察。10年前雪州中华大会堂邀笔者前去演讲（另外2位主讲人是谢天平博士、郑良树博士），负责联络的当事人电话里嘱咐我凭著大会堂给我的一封信便可“投宿吉隆坡任何一间酒店，因为这些酒店都是大会堂的成员”。结果笔者在武吉宾登的联邦酒店、帝国酒店、金碧酒店都碰了钉，因为3间酒店的柜台小姐都异口同声表示“没有凭信住店的规矩”。1988年笔者又应吉隆坡某学术机构之邀前去演讲，交通费一项，笔者回来怡保之后还得通过某文友代为催收，1个月后才收到Money Order。其他还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难忘体验，以后有机会当一一揭发，这种“文化剥削”是应该让它曝光的。

看来作家只有自爱、自强，不做hypocrite，敢高声抗议，他才能摆脱上面那些剥削与不合理的待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做的秀。笔者愿意以行动实践主张，1989年开始的任何演讲，一律收费。我的演讲原则是“全力以赴，绝不欺场”，别人付账也应乾净俐落，不许拖泥带水。这样对双方都公平。

16.2.1989

谁是杜佛勒？

越来越多建筑物的内部装备采用“组合性”，用各种可移动／装配的屏风构成，就像人与人的关系那样，可以因不同的需要而重新调整。

2月12日、13日《南洋商报》综合版一连2天刊出了杜佛勒(Alvin Toffler)夫妇的访谈录。谁是杜佛勒？为甚么这位美国作家能成为国内的新闻焦点之一？

杜佛勒是《文化消费者》、《未来的冲击》及《第三波》等书的作者。杜氏的书已被翻译成多国语文，当然包括中文与日文。杜佛勒对未来人类社会的趋势所作出的预言式观察，不仅引起欧美学界的讨论，在亚洲地区也广受注意。

受委 AT&T 顾问

杜佛勒曾担任《财富》杂志的副总编辑，并为另一份刊物《地平线》撰写“生活形态的未来”专栏，在任职康乃尔大学客座教授期间，他专研的课题是未来社会的价值变迁。他也曾担任过洛克弗勒兄弟基金会，IBM等大机构的学术顾问。

1968年，杜佛勒尚未写出他那部遐迩闻名的巨著《未来的冲击》，有一天他接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一通电话，AT&T开出十分优渥的酬劳，邀请杜氏担任公司的顾问，为AT&T“研究企业的新使命，并厘定自我革新之策来完成这些使命”。

经过4年的资料收集与整理，杜佛勒提出了一份10册厚的报告，从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的角度探讨了AT&T的运作系统，在他的报告里，他大胆地预测AT&T日后将解体。AT&T果尔于1984年由1分成6，分支成为

6家公司，杜佛勒的“预言”应验了，这发展使学界更肯定杜氏的洞识与睿见。

一用即弃文化

笔者无可能在这篇短论评析杜氏就未来社会的趋向所提出的观点。这儿只能扼要地谈谈，俾读者窥见一斑。

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杜佛勒观察到一种“一用即弃文化”(Throw-away Culture)。他用许多实例告诉大家，未来社会将日益趋骛“一时性”(Transience)“新奇性”与“多元性”。物品一用即弃，不单纸巾、餐具、牙刷、打火机、原子笔到纸制的衣服，都是一用即弃，就连汽车，住所，工作以及各种人际关系也会日趋“一用即弃”。越来越多建筑物的内部装备采用“组合性”(Modular)，用各种可移动／装配的屏风构成，就像人与人的关系那样，可以因不同的需要而改变或重新调整。

过去与现在奉行／遵循的一些人际关系，譬如婚姻制度，杜佛勒认为将会崩溃，而新的制度或方式将取而代之。人们结婚、离婚、再婚的次数将增加，不过因分手可能造成的感情打击反而淡化。

许多父母都不愿意有孩子的负累，至少是不想过早有孩子的牵绊。未来生活的匆促步调促使男女都为自己的事业而奔忙，无暇顾及子女，因此子女的培育将是中年甚至退休之后才考虑的事。

媒体分众化

在《第三波》一书里，杜佛勒用第一波(农业文明)，第二波(工业文明)，及第三波(新文明)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分成三个重要阶段。所谓第三波的新文明包括了我们所熟知的用语如“资讯时代”、“电子时代”、“核子时代”、“世界村”(Global Village)以及Daniel Bell说的“后工业社会”。“第三波”一词涵盖了上述用语的内容。

《第三波》是一本厚达644页的书（比《未来的冲击》薄了些），里面讨论到多项课题，自无可能一一枚举。这儿只能谈谈〈大众传媒的分众化〉这章节。

据杜氏的观察，第二波是大众传媒，尤其是报章最能发挥资讯扩散、言论影响的全盛时期。1973年，美国每日售出6千3百万份报章，5年后（1978年），报份的销路非但没有随著全国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反而降到每日6千2百万份的低水平。各大报的读者人口都显著萎缩。同时期各色各样、内容五花八门的小型杂志则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市场。不同兴趣、嗜好、职业、品味、信仰的读者都可各适其所找到自己喜欢的刊物。这种“分众化”（De-massify）的趋势抢去了不少日报的读者，日报为了要应付这挑战，逼得增加地方版及性质多样的副刊顶住颓势。

杜佛勒目前正在撰写另一部题为《权力的转移》的新著。为了寻得第一手翔实的资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作实地考察。对中国政治变革新形势有兴趣的读者，相信都等著看他的这本新作。

22.3.1989

弹性工时与社会新形态

朝九晚五造成上下班的大量人潮，交通系统因超载而瘫痪，弹性工时把上下班员工分成一小批、一小批，应可缓和交通拥挤的情况。

温瑞安与方娥真

我的弟弟温瑞安没有吃早餐的习惯。通常他一觉醒来已是中午12时，梳洗过后，到外头用的是午餐。他的工作时间是在晚上11时过后。从午夜11时到凌晨3时是他伏案写作赶稿的时间，他每天都得应付好几个武侠小说连载与专栏。他的作息显然大异于我们所熟知的朝九晚五。如果没有应酬，他会提早开工，有时炎炎午后便见他躲到房里孵文字的豆芽去了。

前天狼星诗社社员方娥真，开始在香港明报周刊当娱乐记者时每天都得上班。后来升任专题撰稿人，每周仅需回杂志社一趟。回去是把写好的专题稿子交进去配图排版。至于方娥真怎样物色“对象”，如何收集资料，怎样进行采访，杂志社不管这些。总之每周限期的最后一天一到，稿件好歹都得交上。娥真可以每天写一点，也可留待最后一天才匆匆赶出来，工作时间由她自己安排与支配。

第三波带来新文明

这种作业方式谓之“弹性工时”（Flextime）。一些行业如产业经纪、汽车代理、保险招徕员、新闻从业员、公关人员、广告人、直销商及作家等等，他们的工作或业务有很大的伸缩性，并不囿限于冷气办公室的一角，也不受时间的硬性规定。他们弃朝九晚五而取弹性工时，像温瑞安、方娥真两人那样，毋宁理所当然。

社会普遍“都市化”的结果，更多传统上较具稳定性的行业将弃朝九晚五，而采用弹性工时的灵活安排。据著名未来学教授杜佛勒在其巨著《第三波》(The Third Wave)的报导，“弹性工时”这概念是在1967年首由西德一家航空公司“试用”。由于交通阻塞，航空人员一齐赶到机场上班时个个疲态毕露，公司高层几经讨论终于决定让职员分批上班，以便躲开交通拥塞。试验的结果发觉航空人员的工作效率大增。

于是，“弹性工时”的作息方式便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公司、工厂及大企业都跟著仿效。1972年，全西德有2千家公司采用弹性工时，1977年，西德有五百万员工采用这种新的作息程序。而这种作息程序很快就由一些跨国公司像Nestle及Lufthansa“移植”到美国去；不出数年，弹性工时的作息观念便传播到世界各大都会去，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说起来，弹性工时肯定会比朝九晚五，更适合人们的体况，习惯与个别需求。有些人过惯夜生活，非凌晨4、5点不能入睡。一睡便非日上三竿不能起床。有些人习惯早起，凌晨5时便到外头晨运去了。弹性工时让不惯早起（或早起脑袋昏沉）的人，10点以后才上班，也提供机会让那些夜猫子担任晚间的工作或职务。

一些家庭妇女（尤其是单身母亲），早上得买菜，做家务，送孩子到托儿所或学校去才能上班，弹性工时显然对她们较适合，要她们清晨8时上班可能常常会迟到。即使能即时赶到，也可能因家务、孩子的事处理欠妥，心神恍惚，影响到工作表现。

都市是不睡的巨人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除非有什么天灾人祸，都市人口的激增乃势所必然。随著人口、车辆的增加，将来的城市交通拥塞问题一定更严重。朝九晚五造成上下班的大量人潮，交通系统因超载而为之瘫痪，弹性工时把上下班员工分成一小批、一小批，应可缓和交通拥挤的情况。

目前的都市节奏是，白天繁忙，午夜过后速率即大幅减缓，75%以上的

人口都上床歇息去了。将来的城市将会白天、晚上频率大致相同，都市成了“不睡的巨人”(Sleepless Gorgon)。从工业生产，科技运作，到服务业各个项目都是24小时不间断运作地进行。换言之，社会的生产力(Productivity)将随弹性工时这观念的引进而跃升。在国内，我们看到24小时银行电脑提款服务，24小时的加油站，Seven Eleven的登陆，这些都是杜佛勒笔下的第三次浪潮所掀起的一些“浪花”。

不过，正如杜佛勒所说的，掀起第三波的动力来自电脑的普遍使用，尤其是家庭电脑的普及化。未来的人际关系与联系，许多时候都得依赖电脑所提供的资讯。在弹性工时全面（或接近全面）施行后，只有电脑才能准确地告诉人们，自己业务上的伙伴、亲戚、朋友或要见的顾客他们在那里，他们上的是日班抑是夜班。电脑所作出的协调将愈来愈重要。也许那一天会到来，人们约女友／男友去看场电影，也得先看电脑的“脸色”。

24.3.1989

文化建设需要商界挹注

“新商人”(New Merchant)从过去酒色财气、吃喝玩乐的话题，渐而把重心转去时事大局一类的重大议题。

“为富不仁”这句成语的形成，反映华人自古以来对富有的商贾的一种负面评价。在这个社会里，唯利是图，寡廉鲜耻的奸商为数当然不少，不过如果我们以为“凡商必奸”那就肯定会一支竹竿打翻一船人。

这种对商贾的歧视心态，一方面乃传统因素使然。过去的社会阶层是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商人根本没有甚么社会地位可言。另一方面，商人为了牟利，埋没良知，什么龌龊的手段都用出来，很多人身受其害，自然对商人反感。

偏见与歧视的形式

而这种歧视心态，以搞文化活动的知识份子为甚。读书人从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了解到自身的地位（“士”的尊崇身份）已被本来排在四民之末的“商”所取代。文化人读书不少，知识丰富，但却没能拥有他们认为“俗不可耐”的商人底经济实力，内心难免愤愤难平。积郁于中，寝假形成对商贾的一种偏见。说得直接了些，文化人对大商家的财富力量是既羡慕且妒，内心深处总觉得这些生意人能发达，赚得都是不仁不义的钱。

而商人长久以来“浸”在这样的一个歧视商贾的文化传统里，自己也变得自暴自弃。“既然大家都认定我唯利是图，我就唯利是图好了，管他娘的！”商人在缺乏自觉性的道德约束下，不择手段，不讲原则，纯以赚钱牟利为鹄的，囤积居奇，无所不用其极，这就会酿致社会灾害。而商贾巧取豪夺自然会引来文化人与一般社会成员的不齿，这就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成了国家建设的巨大障碍。

我觉得文化人有必要从“士农工商”的古老秩序中挣脱出来，正视当前的时代社会现实，并且承认工商业活动是一种正当的行为，赚钱谋利，只要合理，也是为公众所知，并为社会规范所接受的事实。

从“强盗贵族”到“新商人”

文化是以社会为基础，并以社会的改进为目的，如果“文化”与“商业”对立，势必两败俱伤。文化活动如要真个有所作为，必须能得到商界长期性的支持，而文化蓬勃，亦可潜移默化，以致于改变生意人的“商贾习气”与“商贾思想”。传统的商贾孜孜求利，类似“强盗贵族”(Robber Baron)，受过文化熏陶并且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商人”(New Merchant)，则可扮演文化建设后面强而有力的支柱。

过去笔者在某些场合与商贾攀谈，总觉得格格不入，言不及义。近日有缘与一些生意人会面闲聊，我颇惊喜地发现我们的商贾也在读书，他们除了关心自己的业务也留意到华社政经文教的形势与发展。有者勤习书法，有者醉心绘画，有者不仅对消费人运动的经济性有他们的一套看法，甚至能就此运动的心理层面，文化层面以及政治指涉提出甚高明的看法。这些现象毋宁是令人欣奋的。

议题转向时事大局

我也留意到多位商界领袖（其中一位是缪进新先生，笔者就读美罗中华中学初中时期的数学老师）甚至在报章撰文对经济文教问题发表评议。许多实例让我感觉／意味到时代社会在变迁，“新商人”逐渐了解知识与资讯的重要。他们在社会文化氛围的熏陶与再教育下，作出了若干蜕变；而方兴未艾的“商人文化”将从过去酒色财气、吃喝玩乐的话题渐而把重心转去时事大局一类重大议题(Issue)。

文化人应该克服自己那种既自大又自卑的情意结，衷诚与商界合作。

而生意人与企业家也应明白“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道理，给予文化活动经济上的支援与其他方式的挹注。文化人与经济人一样，都是国家的中坚份子，都能对社会国家作出贡献，而文化人如能与经济人联手，肯定在改善生活素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4.1989

“牛群直觉”与股市动向

“牛群直觉”(herd instinct)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提出来的，用来说明股市人口那种集体的焦虑不安、盲动与非理性行为。

小牛市渐成型

国内的股票市场已涨了大约有半年了。随著锡价的回升、屋业的好转，制造业的渐趋蓬勃，外资的流入，经济复苏的迹象已甚明朗。作为经济寒暑表的股市半年前即率先回扬那是十分自然的事。市场律告诉我们，股市通常比经济情况“先跑”半年到9个月。

这次股市的上涨，只能算是一个小牛市，它吸引了不少人，包括退休公教人员、小商人、家庭妇女以及各种身份的“新雀”蜂涌入场。

说起来，我国股票族的人口仍不算多。许多人（包括生意人在内）对股市的操作营运都不甚了了，只知道它是“金鱼缸”、“鳄鱼潭”，购买股票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变相的赌博。其实股票买卖是正当的经济活动，其意义与别的生意经营并无二致，而任何生意经营都必须冒一些风险，买卖股票亦然。

国人一般上缺乏企业投资的知识与资讯，再加上证券买卖这行业还不够普遍化是造成外界对股市作出种种猜测与疑虑的原因。日本的许多城市、超级市场和百货公司大多设有证券公司/股票行的专柜，购买股票就像买件商品那样方便。在美国，一般中学生通过夏令营讲师的解析以及杂志刊物办的“纸上股票投资”竞赛，很早就摸清了股市的门窍。

分散风险

笔者在股市的年资只有短短几年（1982年进场，以2元6角的价格买了

1千股马面粉)，平日研习的重心又非股票，自然无可能在这篇短评里提供什么“贴士”，有一个现象令我最感到惊心的是，股友那种全凭“牛群直觉”（herd instinct）来进行买和放的盲目冲动。

“牛群直觉”是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提出来，用来说明股市人口那种集体的焦虑不安，盲动与非理性行为。即使头脑精明的投资者一旦陷入“牛群”中，什么才智都用不上，只能被牛群的冲动牵著鼻子走，实在可怕。一些大户之所以能操纵股价的起落，便是因为他们觑准并且利用了这种牛群的盲动进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投机活动。

一些稳打稳扎的投资者，他们理性地分析国内外的经济因素、行业景气、政治气候、公司营运状况，从不到股票行“上班”，与股市维持安全距离，便是不想让自己为“牛群直觉”所感染。他们从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工商股、金融股、产业股、种植股都各购买若干，分散风险。他们的基本策略是以中、长期投资为主，机会到来亦偶作短线搏杀。

独行侠风

一个“正常”的股市，其公牛走势大致可分三个阶段：蕴酿的初期，股友一般上信心不足，买进的多是一些投机性浓的低价股；中期各种利好因素纷纷出笼，中价及稳健股于是受到垂青，同时期低价股起幅放缓，但涨势未竭；牛市后期低价与中价股都涨得差不多，高价及蓝筹股相形之下反而显得便宜，这时好消息满天飞，股友们觉得还是买业绩良好的公司股票安全，高价股与蓝筹股价位于是大幅上移。这时股市已是价高势危，只要有一个坏消息轻轻碰触，汽球便会爆破。

以上所述是一个较“正常”的牛市走势，中间当然有间歇性的套利活动，但涨的形势大致如此。摸清了公牛的形态，赢面自然较大。全身而退，离场休息也较易把握时机。但大马股市自1985年以来走势反覆不定，有时公牛只走到一半，才迈入中期，便因某些不利因素的打击而垮倒，股友们往往措手不及，被绑住成了大闸蟹。

我们的股票族以前对香港的恒生指数反应最敏锐，近几年则以道琼指数为导向，不过最近这一两年来我国的股市颇有独行侠之风，往往不以美日港台的股市指数马首是瞻，起落得有些扑朔迷离。国内的政治情况对股市的影响愈来愈大，政治人物的动向，言论常可左右股价的上下，这样的环境使“牛群直觉”更有机会肆虐。

过去某间公司的股票被炒起，总可放心跟4、5天，现在某只股票才刚起步，迈入第2天，套利者便纷纷涌现急著求售，赚个两三角钱的“对敲”（Contra）。这情形对股市的健全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如果明年（1990年）是大选年，而当前新巫统与巫统四十六的对峙局面维持不变，股市要有大作为恐怕难矣。

8.4.1989

“急功近利”面面观

在今天，还有那位学者肯皓首穷经？在艺术的领域，有多少个能像胡金铨那样“慢工出细货”？

中药炮制过程简化

老熟地的传统炮制方法是和酒蒸了再晒，晒干后贮藏一个时期，拿出来再蒸，如是者九蒸九晒然后切片。今日绝大多数的中药店把老熟地蒸上一两趟晒干切片便算数，九蒸九晒成了“天方夜谭”。

枳壳的炮制方法是先浸透，让它起泡发酵，然后切片炒干，现在多数中药行把枳壳洗干净，切片炒干便算了事，节省了许多过程和时间。还有柏紫仁，带点油质，宜炒干去油，不过今日许多中药行都省掉了炒这层麻烦的手续。

以上所述是此间某老字号中药店的东主告诉我的。他还补充说老熟地、枳壳、柏紫仁炮制过程简化，药性肯定没那么“道地”。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时间便是金钱，炮制过程复杂，店里便需多雇员工。药物效能稍逊，影响不大，没什么人会察觉，倒是多添员工，店里每月开销增加，那是可以马上感觉出来的。

“文化速食”

我的学生为了搞好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方便日后在社会上谋事，毅然参加吉隆坡某著名私立学院的英文速成班。3个月过后他们参加一项考试，大多数拿到C等，其中也有几个考获B等，不及格的学生则受劝告继续前去上课，念的是3个月前念的东西。他们每个人都付了360零吉的学费。根据学生的自我评估，他们并不觉得自己英语把握能力进步了多少。

这种“3个月内学好英语”或“100天国语没问题”的课程，是这个样样讲快、省时的社会的一种“文化速食”（Cultural fast food），它们正如市面上的其他速食，所提供的营养不仅有欠均衡，多吃还会伤及脾胃。

教育的速成风气，正如中药炮制过程的简化，反映了当前社会急功近利的现象，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急功近利的病毒其实充斥社会各阶层与各行业，寝假成为社会的常态。

在今天，还有那位学者肯皓首穷经？在艺术的领域，有多少个能像胡金铨那样“慢工出细货”？绝大多数人的时间观念都绝强，他们深谙“人生苦短，要发宜早”的道理，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最佳成绩来，在质方面他们没办法做到，只好在产品／服务的包装方面下工夫，“截长补短”。

一支真X.O.变成三支假X.O.

是的，“潮流兴包装”。只要大家看看今日的包装与60年代的一比，就不难见出今日的商品在外观方面精致了多少。包装精致化当然也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如果没有顾及实质的改善，对消费人而言实在很不公平，因为消费者付出更多的金钱，换取到的并不是改良的品质而是华而不实的外衣。

实际的情况可能更坏，生产者把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产品的外观上面去，对品质反而掉以轻心。去年国内发生的多宗老鼠粉中毒事件，肇祸的老鼠粉据说都特别洁白油亮，外观悦目。最近流通于市场的假X.O.用的是“真樽伪酒”，据行家透露：一支真X.O.可渗制成3支假X.O.，喝酒的人看到“真材实料的瓶子”，不虞有诈，便没注意到酒味是否有异。

酒楼厨房：人间地狱

还有华人的酒楼都十分讲究外观，以及内部的布置，务求金碧辉煌，

高贵优雅。菜肴的泡制也讲求色香味俱全，不仅要好吃，还要好看。可惜许多酒楼都只顾门面，对制作生产中心的庖厨的设备及卫生情况反而甚为忽略。有些酒楼后面的厨房，“苍蝇与灰尘齐飞，沟渠与馊水一色”，乌烟瘴气、邋遢不堪，与设于前面优雅的客座相较不啻“人间地狱”。这种只顾外观、不顾实际，只求好看、不讲内容的行为，长远来看，对华人饮食业是十分不利的。外国速食店之所以能在国内迅速崛起，原因至少有二：一是服务便捷，二是食物清洁，华人酒楼在“食物清洁”方面的形象，显然远逊于前者。

“急功近利”是商界通病，而这毛病引起的“并发症”便是诸般舍本逐末、倒行逆施的商业行为，“重视外观、轻忽实质”只是其中荦荦大者。面对这股逆潮，也真够社会心理学家、管理学家、教育家们伤脑筋的了。

12.4.1989

成就动机背后

要承认自己的局限，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老大的；要了解自己的性向，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肩负刺激而且充满挑战性底任务的。

事例一：健康婴孩亚军

假期赴首都，出席会议，约见朋友，讲斗数，买书充电，十分忙碌的9天。

我见到一位朋友，30岁不到，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十分独特的经验，一岁多的时候，他的母亲曾把他装扮起来参加一项婴儿健康比赛，结果他拿到了亚军，从那时起他便不断参加各式各样的竞赛。SRP, SPM, STPM，到挤进马大去念书拿到二等荣誉学位出来，今天在某间商业机构担任副经理为止，他说：

“我十分努力奋斗，奇怪的是每次出来总是居于佐贰，也就是亚军的位置，总是挤不到最前面去。不瞒您说，我是有挫折感的”

我不是心理学家，不能深入分析构成他这种心态的复杂因素。社会学有研究人格的形成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我猜想面前这位激动的年轻人，是被他昔年参加婴儿健康比赛得到亚军这个不快的“兽残经验”所笼罩，所桎梏住了。

刻苦耐劳、奋斗努力，后面的原动力是成就动机。过早的参与竞赛斗争，往往是祸非福。婴孩可能不懂人事，但并不等于说他没有感受。对于我面前这位年轻人来说，他无法抹去“始终攀不上第1名”的不快记忆，因为在一些场合总会有一些三姑六婆会提起，于是挫伤便形成了。

幸亏这挫伤并没有使他自暴自弃，这位年轻的公司副经理的“遭遇”其实并不是最坏的例子。这事例使我感觉到一个潜伏著的危机，要攀上社会阶梯最高层的成就动机对这年轻人的精神压力是太大了。我注意到他搅咖啡

时手在微微颤抖。他太紧张了，这样下去他会神经衰弱的。像他这种“自我期许”过强的人，如果他一直攀不上去，或遇到突如其来的挫折不升反降，他能抵受得住打击吗？他能“原谅”自己吗？

事例二：机要秘书的抉择

第2位朋友是一位公教人员，大学毕业，太太是职业女性，两口子加起来的每月薪酬超过3千零吉，生活安定优裕，但近来却为一些事情而感到烦恼。

那是因为这位朋友在某副部长竞选国会议员期间，曾出谋献策，在文告宣传、奔走联络方面出过力，副部长赏识其魄力才华，有意界于重任，邀他担任机要秘书（S.U.S.）。

这位朋友颇有意一试，毕竟从政较能发挥才具，也较有机会出人头地。他也了解一旦涉及实际政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不但得捐弃现时所享有的无羁无绊那种自由，更得向稳定宁谧的家居生活说“拜拜”。作为副部长的机要秘书，他得面对许多复杂的人事与公务，至于奔走忙碌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朋友40不到，精通三种语文。从他耸动的双眉与炯炯的眼神看得出他胸怀大志，成就动机煎迫著他，使他跃跃欲试想跨上疾行中的政治列车，但内心深处却有另一个声音在提醒他三思。他感到很为难，不知如何作出抉择。

名缰利锁与幸福的真谛

这里便涉及人生观以致于人生的终极意义的问题。人人都为名有利，所谓名缰利锁，能真正摆脱名利羁绊者，天下之大几人能够？但名利就等于幸福吗？

我想不是的。名利只是通向幸福的两条途径，它们充其量是幸福生活

的“有利条件”，绝非“绝对条件”或“充足条件”。只有在当事人于物质丰足，名成利就之余，还感到心境安详、精神充实，那才有幸福可言。

工作有工作的时间，休闲有休闲的时间，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的起码要求。事务可以繁多，但总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如果当事人觉得自己像卖了身似的，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他人的工具，三餐当一餐吃，一周见不到太太一趟，这样的工作纵使金钱酬报更优厚，更有机会见报扬名，但牺牲太多，“受伤”太重，恐怕并不划算。

不要给自己的成就动机所蒙蔽。要承认自己的局限，要了解自己的性向。不是每个人都适宜做老大的，对于某些人而言，宰辅的工作他们会更胜任愉快。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负肩刺激而且充满挑战性的任务的，对一些人来说，工作之余的钓鱼种花，比开会演讲还更重要呢！

25.4.1989

平心论“女强人”

“……女性本就比男性能干，我反而奇怪那些只用男性，而能成功的人。”
——高希均教授

“整个商业大环境似更利于女性管理阶层势力的膨胀。”
——温任平

假期在“茶缘”约见CL庄，她迟到了几分钟，一见面，她便对我和另两位友人说：“我是煮了中饭才出来的。”

CL庄现任某化妆品公司的副总经理。典型的女强人。我之所谓女强人指的是办事俐落、词锋锐利，信心坚强。（譬如说当我对她说，当前许多男仕还分不出Cologne和Toilette有何不同，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温任平，你错了。你有没有注意到男仕用香氛的人数，管他是Cologne还是Toilette，近几年作直斜线上升这个事实？”）头发梳理得整齐服贴，脸上的化妆适度。所谓“适度”对于明眼人来说并不含糊，在浓妆与淡妆之间拿捏住那点分寸，便是“适度”。

问题是：女强人工作之余还需煮饭烧菜、料理家务的吗？中国式（或东方社会）的女强人是不是与西方社会的女强人在标准方面有些什么不同？

新人种的崛起

欧美的女强人，通常都有一份薪酬优渥的行政、管理高职，每天工作量超过12个小时，晨起跑步或每周都有抽出若干时间做健身操（珍芳达那种健身舞可能是传媒渲染最著力的方式）有喝下午茶的习惯，衣饰讲究品味，有毅力，能干敏锐，多学多能。心理学家Natasha Josefowitz为这崛起中的新人种所作的定义是：“满足每个人的各种期望的女人。”（She's everything to

everyone）。要满足许多人的冀望，这当然是件难事，但有些才具不凡、意志坚定的女性做到了。

我有一个这样的看法，东方社会的女强人，既要扮演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又要肩负独当一面的主管/经理的公司任务，她们蒙受的压力和面对的考验，似比西方社会的女强人来得沉重与严峻。西式女强人只要能干加上精力充沛，衣著光鲜予人多才多艺的印象便庶几乎合格；东方式女强人则接近于“人得厨房，出得厅堂”，她们得演好“既传统而又新潮的”综合角色：她们是别人的好妻子，好母亲，和好的企管人才。

高希均的看法

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天下杂志》社长的高希均教授，有一次出席午餐宴受到询问何以《天下》从殷允芃（她是总编辑）到其他的编务人员多是女将。高教授的答覆犹似雷霆霹雳：

“一点也不奇怪，女性本就比男性能干；我反而奇怪那些只用男性，而能成功的人。”

我之所以用“雷霆霹雳”来形容高希均的语言力量，因为他的看法对我们当前这个男权占优的社会仍是逆耳的，也因为这样，我们更须认清一个事实：女性能攀上社会与企业的阶梯，并非男仕赐予她们的，而是她们自力自强的成果。

睡觉磨牙的女人

女强人的崛起与社会形态的变迁关系至为密切。女性的特质与性向在许多方面似更能契合现代企管的需求。只要大家环顾一下国内直销业，女性雇员远较男性雇员多出数倍，即可思过半矣。

女性的耐力，细心、敏感（相对于男性的粗枝大叶，脾气暴躁）使她们更能了解客户的需求，更易与顾客沟通。就此意义，在管理的条件与品质

方面，妇女甚至胜过她们的男性同业。

当然女性的能力并不囿限于直销、保险、产业经纪这类所谓“奔波劳碌、口舌不停”的行业，在策划、布署、营运方面，女性也证明了她们有良好的管理能力。

这是一个感性消费时代，许多次文化(Sub-culture)的塑造与产生，刺激著人们在感情上、心理上作出多面的认同（这通常也意味著多面的消费）。这些认同既表现在服饰器用方面，也表现在他们的趣味嗜好方面。女性管理者由于比男性更有耐心，更能了解别人的需求，在新的次文化一波波涌现时，整个商业大环境似乎更利于女性管理的阶层势力的膨胀。所以当我们在

此预言，愈来愈多的女强人将会出现，这趋势预测相信“虽不中亦不远”。女强人当然也有她们的问题，据一项调查显示，不少女强人有夜间睡觉磨牙的现象，这些现象代表了甚么？女强人的困境应如何纾解？这恐怕要另撰一文详加讨论才可说得清楚了。

6.5.1989

寻梦者的乐园

——谈“经验工业”

人们过去以拥有／保存产品为荣，当前的消费者则以体验各种新奇怪异的经验为傲。

经验消费者通常都在又怕又要的情况下，用白花花银子买下各类的经验产品。

近年来怡保成立了不少职业与技能训练学院，有些职业／半专业学院除了设有美容、裁剪、插花等课程，还提供“交际舞的学习与训练”。交际舞包括华尔滋、狐步、恰恰等项目。学员以30岁前后的男女青年居多。

这些有了固定职业的男女，学舞的目的不是为了登台表演，而是为了去接触一种新经验，并从这新奇的经验中去获取某种愉悦感与成就感。

舞蹈班的成员有些学舞是为了社交的需要，不过大部份学员，他们学舞是“为了接触一种新经验”，对他们来说，这经验所提供的“紧张快感”(titillation)是值得花钱去买的。

一圆歌星梦

记得3年前吉隆坡只有一家Japanese Lounge，今天我们却看到卡拉OK忽然像雨后春笋到处林立。卡拉OK的兴盛除了是日本消闲文化的人侵外，从社会经济与行为学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我的看法是卡拉OK这一行是新兴的“经验工业”(Experiential Industry)，它就像交际舞训练班那样提供的是经验与快感，虽然彼此的经验内涵与快感来源并不相同。卡拉OK提供场合／机会让酒客上台引吭高歌，一圆平生

未遂的歌星梦。如果大人先生们觉得这种寻梦行为几近儿戏，他们其实说中了大部份事实，许多经验工业都有游戏的色彩，都在不同程度上编织各种梦幻与假象，它们是某些经验的创造性模仿。

当前耗资庞大、规模最是可观的经验工业，一是旅游业、二是电影业。旅游当局安排游客用宫廷式的满汉全席，穿唐明皇或慈禧太后的古代服饰，参与峇峇的传统婚礼，试用土著狩猎用的喷管，这些经验犹似产品，是可以出售的，它们是“经验设计家”（experience designers）刻意制造出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心理附加值

各式各样的电子游戏，提供从驾快车到星际大战种种斗智斗速度的紧张经验，算起来这还算是小儿科，大型的经验仿造则是利用工艺、声光与电子去模造鬼屋、皇陵、迷宫等等吓人效果，供给人们各类奇异的感官刺激与体验。“经验消费者”（Experience Consumers）通常都在“又怕又要”的情况下，用白花花的银子去买下上述那些既真实而又最易逝去的经验产品。

经验工业有各种经营方式，可谓十分多元。不过所有的经验工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提供超乎实用层次的心理附加值。这心理附加值包括自豪感、新奇感、美感与快感以及不同程度的参与感。

我想我应该就“不同程度的参与感”这术语稍作诠释。像旅客被安排亲尝满汉全席，那是口腹之欲的参与；而用电子游戏的控制仪器去进行星球大战，那种参与就没有前者那么深刻与真切。玩电子游戏的人虽然也会感到紧张、刺激，但他们心里知道那不过是一场“游戏”。

电影是另一典型的经验工业产品。第八艺术制造人物、情节、故事、纠葛、冲突把观众的情绪扣住，把他们拖进剧情的发展里。当观众为剧中的人物故事所感动而欢笑或哭泣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已把自己“代人”到剧中人物的处境与经验里了。

电影制造出来的梦幻经验，创造了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真实而甚有

说服力的虚拟世界，观众乐于花钱，神游于其间，暂时忘却现实遭遇的不快，在另一个世界里去寻求某种“补偿”。

自我毁伤的倾向

世界上最古老／原始的经验工业当然是娼妓卖淫业，基于道德性的顾虑，本文无意详谈。我们只要看看卖淫的各种矫装／变相的销售，便不难想像这行业的市场潜能有多大。从按摩业到理发业，都有色情贩子渗透其中。听说国内南部某城市，一些夜总会甚至设特备节目：让每桌喝X.O.的酒客以抽签方式选伴侣，中奖者可与一名美女出外“拉埋天窗”。追求新奇经验（色情加上赌博）的此道中人，据悉趋之若鹜，有关夜总会门庭若市，生意十分兴旺。

人们过去以拥有／保存产品为荣，当前的消费者则以体验各种新奇怪异的经验为傲。这种意识思想的变迁意味著社会形态也在蜕变，而这蜕变事实上带有十分强烈的奢侈、浪费以及自我毁伤的成份。服食大麻和海洛因何尝不是为了追求奇异的经验与幻象？经验工业的蓬勃意味著什么？它带给人类社会究竟是福祉还是诅咒？社会学家到今天还没能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15.5.1989

经验工业的兴起，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新现象。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再满足于物质上的享受，而是追求精神上的满足。经验工业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而兴起的。它通过提供各种新奇、刺激、独特的体验，让人们在短暂的时间内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这种快感不仅来自于体验本身，更来自于人们对这种体验的渴望和追求。经验工业的兴起，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心理需求的变化，也反映了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对精神世界的探索。然而，经验工业的兴起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奢侈、浪费以及自我毁伤的倾向。人们在追求新奇体验的过程中，往往会忽视自己的身心健康，甚至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境地。因此，我们在享受经验工业带来的快感的同时，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其中的陷阱。

北地忍不住的春天

——谈当前的中国学运

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们？难道爱国真是一种罪名？纯洁、真诚的青年真是国家的祸害？觉悟不能相信。

——巴金：《家》

第2次五四运动

这半个月来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每天起床第一件事便是翻阅报章，希望多了解中国学运的最新发展。正在写著的一篇题为〈五四关怀的前瞻性〉，由于学运情况的急转直下，消息传来中国政府已下令军队镇压，使我的情绪大受干扰而无法完成。我相信国内有许多人，包括知识阶层与一般群众，都与我有同样或类近的感受。

这趟中国学运可以说是继70年前的五四运动的一种精神延续，因为70年前中国知识份子所追求与争取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仍是悬空理想，一直未能落实深植。去年《河殇》一书的出版与录影带的摄制主题预设“海洋文明”之优于“内陆文明”其实是在借题发挥，强烈地表达了人民对于既成体制，当前现实的不满。由于民心思变，胡耀邦的死燃起了大家的悲愤，结果是触发了“四·廿七”，成功的掀起“第2次五四运动”（借用李怡先生的话）。

就我们所能掌握到的资料，此趟中国学生吁请政府赋予人民更大的言论，集会自由，检举贪污腐败惩罚特权枉法，促进民主改革，增加教育拨款，改善民主，这些要求都合情合理，这些要求也正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与诉求。此所以学运才展开，便得到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支持。不仅农民工人加进了示威的行列，连教授、医生、军警、律师、检察官也抛开了公务

上的顾虑声援／参与学生运动。

老作家的反应

89岁的老作家冰心，几十年来不问政事，“与世无争”，这趟也乘坐车子前去慰问学生，车身悬著布条，上面写的标语是“学生是爱国者，我爱学生。冰心”读到这行文字，我禁不住流泪了。

身体虚弱，病著的巴金（85岁）在上海写了一封信给北京学生：“我想学生的要求是合理的。他们所做的是，正是我们过去无法做到的。中国的希望，就在他们手中。”他还说“我相信每个爱国的、正直的以及有良知的人，都会爱护和保护他们。”

读了这则报导，我把巴金的成名作《家》（曙光出版社，89年）找出来，在第60页我读到下面一段文字：

“……觉悟在人丛中拼命地拍掌。雨点不停地落在他的未戴帽子的头上，把他的头发打湿了。……他看得见兵士们的刺刀……广场上无数黑压压的人头在动。他设法压下他的愤怒。……他觉得自己快要憋得透不过气来了。士兵打学生的事来得太突然了，虽然以前就有当局要对付学生的风传，但是谁也想不到会出之于这种方式，这太卑鄙了！‘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们？难道爱国真是一种罪名？纯洁、真诚的青年真是国家的祸害？’他不能相信。”

以上所录是《家》这部小说的一段情节，描绘的是故事的人物觉慧参加学生示威运动当时所感所想，令人战栗的是觉慧的感想竟凶兆般地预告了当前学运所有参与者内心的愤懑与悲哀。《家》这部小说完成于60年前，《家》批判的是民初中国社会的封建、专制、愚昧、落后，60年过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愚昧落后依旧，只是形式变了，新瓶装的仍是旧酒！换了汤却没换药！中国学生仍须冒著被血洗的危险，为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老问题奔走诉求，而他们面对的困阻、障碍之顽强只有更甚于五四或30年代。

民主运动生命力不衰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是在虚掷岁月，因为别的国家早已开步向前走，而老大的中国却在同样的课题上打转兜圈。毛泽东时代是一言堂，邓小平时代也是一言堂。

从五四运动到当前学运的中国民主运动，称得上是一部血泪史，许多敢说敢言的知识份子被打成“反动派”。魏京生被关起来已经整整10个年头。学生搞学潮面对的是“秋后算账”的报复（毕业后被遣去偏僻山区工作）。为什么民主运动却能百折不挠，在压力下仍能日趋壮大呢？

我无法在这儿提供什么答案。也许“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可以约略诠释学生们的果敢与决心。握笔疾书的这一刻，我脑子里想到的是台湾诗人郑愁予的一句诗：“我们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民主力量的吐芽、苗长，多像那忍不住要莅临大地的春天啊！严酷的冬寒终会过去的，希望中国学生/老百姓有这个勇气与智慧熬过这凛冽的政治严冬。

26.5.1989

知识份子的“灵魂搜索”

今日华裔知识份子的危机，不在于“丧失了观念的战场”，而在于大多数知识份子都无法摆脱现实利/害的网罗。

读了祝家华先生的近作《知识份子的秋天》，心中颇有些感触。祝先生担心未来的社会是一个资讯与科技的世界，经济成了主导的力量，知识份子将“丧失了观念的战场”，而社会的变迁亦往往由“盲目的行动来决定”“并非人的观念所能改变”。

气魄承当

我很能了解隐藏在这些推断或陈述背后的文化关切。我也能认同知识份子所放射的观念力量底有限性。不过承认观念力量的局限并不等于说知识份子已无能为力或无所作为。恰好相反，当知识份子知道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力量有多大，力量到那里为止的时候，他才能真正了解他的职责与使命。

如实地说，知识份子不仅提出“观念”也提供“理想”。“观念”这个词蕴义广泛，科技的、经济的意念/理则均可称为观念，但这些观念停留在物质的层次，与知识份子赖以安心立命的价值选择恐怕在意义方面相去甚远。知识份子的人生看法与价值观通常都有鲜明的前瞻色彩与理想成份，此所以知识份子不仅通过自己对于所处身的环境/时代的了解与体悟，传达环境/时代的讯息，抑且超越当前环境/时代的时空限制，探索时代的趋向，塑造新的文明。

知识份子之与专业人士不同，在于后者“只通一技一艺”（所谓“专业”），而前者则“以天下为己任，以践仁为职守”，有一种“气魄承当”指的是儒者不畏权威，不惧权势，坚守原则，勇于抒发己见，敢于创造并推

动新思想的精神。

现实的利害

我认为今日国内的华裔知识份子的危机，不在于“丧失了观念的战场”（只要翻开报章，每天都听见观念与观念互相辩诘、激荡的声音），而在于大多数知识份子都无法摆脱现实利／害的网罗。为了金钱、官职、社会地位及其他物质诱惑，背弃了自己的社会良知。

朱自存先生要我留意，当前的一些“知识份子政客”从政前与从政后的言行表现，显示他已注意到现实权势对知识人的腐化作用。许多迹象告诉我们，好些知识份子为了现实利益，已投靠／依附某些党派或实力集团，摇身一变，晋身特权阶级。对这些特权阶级的新贵而言，知识不过是宣传的工具，知识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扭曲／宰割，以配合上峰预设了的宣传主题。

纯粹性受到污染

这里可能牵涉到另一问题，那便是知识份子从政之后，从一个观念人（Man of Ideas）变成一个行动人（Man of Action）所面对的困扰。孙中山先生能推翻满清，如果说是靠他的著述与言论，毋宁说是靠了他的实际行动较为确切：孙中山到处奔走营谋，联系帮会，筹募经费，成立革命党，打击清廷，从点到面把帝制掀翻。知识份子如果有匡时淑世的热忱，从政当然要比写文章直接了当许多；在国会或州议会里发言，也比在报章言论版提意见快捷有效。问题是知识份子一旦从政，即无可避免地须跟随党的方针／原则，也不能不逞心机，耍手段，其知识份子的“纯粹性”肯定受到相当程度之“污染”。也因此，有良知的知识份子从政之后，常常发觉“个人”与“组织”相悖，公私不能两全，适从无所，内外煎迫，处境尴尬。这方面我相信民政的许子根、郭洙镇、马华的陈祖排、翁诗杰等位先生，都有十分深刻的感受与体验。

摆在知识份子面前的抉择是，一是以观念思想的创发、传播、诠释为职志，对重大的社会文化课题提出意见，这些意见超乎党团与现实政治的利害，独立于权势之外。虽然意见的提出不如政治人物于议会发言那般具有时效，但往往能收潜移默化之功，对社会的变革发挥深远的影响。另一项选择是投身于热烘烘的政治烘炉里，以理想主导行动，希望藉此改善政经文教的现况，为族群、国家作出贡献。权术的运用固属难免，唯基本的原则与信念则不容屈曲，这同样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不过履践的时候往往遭遇困难。知识份子得胥视他个人的性情／性向作出选择。

观念主导行动

祝家华先生认为在深层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中，盲目的行动往往决定变化的内容与方向。某则以为人类社会要避免的众多罪恶当中，其中之一便是“盲目”，而观念主导行动是祛除盲目的一剂良药。祝先生指出当前的“整体社会已变成庞大的机械体系”，某则相信知识份子其中的一项任务，便是以其活泼的心智，同情的了解去阻遏社会总体的非人性化、机械化。在这个关键性的年代，国内的华裔知识份子宜乎作一番灵魂搜索，就自己应该做的、能力可做的、已经完成了的工作进行估衡省思，只有大家都愿意本著学术真诚／艺术良知去奉献一己之绵薄时，才能历经颠沛而无悔，才能为局面狭窄的马华社会开拓新境界。

9.6.1989



西式管理，中式口味

——中式快餐业的前景蠡测

一种结合了饮食中心食物多元化与西式咖啡屋的情调，布置方面中西合璧的中式小食快餐店将应运而生。

吉隆坡武吉敏登有两间中式小食店，或者你也可以称它们为中式快餐店，因为它们提供快速便捷的中式食物。

一天傍晚，我与川成走进其中一家小食店，坐下来，舒适地喝著我喜欢喝的锡兰茶。店里装了冷气，空气调节得很好。男女侍应生都穿著制服，领班还穿上外套大衣，予人一种专业饮食服务的感受与印象。而这种感受与印象过去通常只有在肯德基、麦当劳一类的西式速食店里才能领略到。

我一边喝茶，一边浏览桌上的食谱，并且拿出纸笔作了一项粗略的估计：

面 21 种，粥 19 种，烧味 10 种，烧味饭 10 种，小菜、煲仔菜 25 种，粉面 14 种，炖品 5 种，甜品 5 种，饮品啤酒 10 种。

肥佬陈小食店

看完了食谱，顿感眼花缭乱，一时拿不定主意叫些什么上来大快朵颐。心里涌上来是一种莫名的快意，西式速食店卖的不是鸡，便是汉堡包、薯条，或者比刹，种类实在不够多样化，而且都是些烧烤食品，肠胃怕燥的消费者肯定不会喜欢。中式小食，有粥有面，有菜肴炖品，便较能照顾到城市人的各种胃口。

我在想，如果食品种类甚为有限的西式速食店可以经营得“风生水起”，连锁店开了一间又一间，中式小食店如果配合现代企业的管理，肯定

可与之相颉颃，盈利潜能甚且过之，问题在于没有多少商贾，认真考虑经营中式快餐连锁店的可行性。

70年代初，陈立志先生（现任马华副总会长）在怡保杨加森路开了一家“肥佬陈小食店”，提供各类小食，由于泡制手法新颖，食物美味可口，一时生意滔滔，门庭若市。“肥佬陈”一词在怡市几成为“中式小食精品”的代称（这使我联想到肯德基炸鸡的慈祥老头标志）。可惜陈先生后来投身政治，无暇发展饮食业，否则他很有可能成为本区域中式小食快餐连锁店的创始人。

“东东”云吞面快餐

时至今日，中式小食快餐连锁店在新马两地虽未萌长，但在香港，它已不仅是一个纸上概念，香港的“东东”云吞面快餐连锁店1988年创设以来，盈利可观，到今年4月，发展迅速，在香港一地已陆续开设了6间分店。“东东”集团的首脑岑耀祖先生告诉记者，“东东”这名称是专家选的，这名称的读音任何人读起来都清澈、响亮、易记，岑先生的理想是把中国传统食物的云吞面“国际化”，目标自然是希望能藉此打进世界饮食市场。

“东东”搞云吞面国际化，我想这和香港的作为国际贸易要冲有关。就国内华族的饮食习尚来看，经营独沽一味的专食店胜算不高。我同意岑先生的见解，食物店走“专卖”路线是世界饮食业的重要趋势，不过国内城镇与香港这些一级大都会比较出现了“时差”（time lag）：大马的社会发展目前正值第二波中期，香港则面临第三波的蜕变，食物多元化仍是国内饮食业赖以成功的主要因素。近5年来，国内提供多样饮食选择的“饮食中心”如雨后春笋到处林立，或可资佐证。

不过，这些“饮食中心”有一弱点，便是食物的卫生水平仍甚可疑（比起街边粉档两桶水洗一百个碗的情况自然是改善了许多），管理方式仍是传统那一套（收钱的人这边才算了钞票银角，手也没洗，那边便赶著切鸡肉又

烧，想想看有多脏！）设备也有欠完善（没有空气调节，座位不够舒适）。

城市现代化、社会优裕化的结果是，人们愈来愈讲究环境的舒服、优雅，愈来愈留意食物泡制过程的清洁卫生（这与消费人意识的抬头有关），因此一种结合了饮食中心食品多元化与西式咖啡屋的情调，布置方面中西合璧的中式小食快餐店的应运而生，我以为乃大势所趋，踏上90年代后相信会大行其道。

120

《鸡同鸭讲》的预言

你有看过许冠文演的《鸡同鸭讲》吗？片子里中式鸭味，通过现代企业的管理与包装，终于克服困窘，击败西式炸鸡。对于像我这种从事文学研究而常常喜欢寻索现象背后底隐喻的人来说，《鸡同鸭讲》是一则预示性（foretelling）甚浓的现代寓言，“西式管理，中式口味”这个商业概念，最初也许会蒙受一些挫折，最终却必能扳回劣势，脱颖而出。

如果说露天或半露天“饮食中心”走的是普罗大众路线，那么中式小食快餐店的消费群主要是来自中产/小康阶层。城市“优皮族”（Yuppies）的诞生与繁殖，也肯定有利于中式小食快餐市场的拓展。

目前的情势是，中式小食快餐店在吉隆坡只有3几间，未能蔚为气候，而且我也还没看到同一徽号的中式快餐的连锁分店。有创业精神，而又对饮食业有兴趣/经验的商界人士，为什么还不在这方面动脑筋呢？

13.6.1989

“陈群川”一词的概念传递

公众人士的形象是从真实的人物身上抽出若干有关的属性（但不是所有的属性）化约成某些概念，社会群众便根据片断的、自以为是的概念去“理解”公众人物。

从王永庆谈起

最近笔者读到一篇文章论及“王永庆”一词的三种用法。王永庆是台湾塑胶集团的老板，是出了名的大财主。王永庆对台湾人而言不仅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而且也是“自力致富”的象征。据台湾综艺电视节目“周末派”所作的一项调查报告，王永庆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家原来竟是台湾青少年最崇拜的偶像。

这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国内的陈群川先生。陈氏曾经是政界领袖与商界巨擘，虽然陈群川已离开政界，但他坐牢2年出狱后的这段日子，仍是大众传媒的焦点，并没有因他的政治隐遁或生意失败而被人遗忘。陈群川的确是一个传奇性甚浓的人物。

当人们提起陈群川这个名字时，大家的心里便会出现不同的形象。不仅他的政敌与友人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即使他的支持者对他的“认识”亦不尽相同。

公众人物的形象

陈先生是一个公众人物，生活极忙，连他的特别助理谭亚木先生也得慨叹“相处的时间极少，商量公务要事，只能三言两语”，外界对陈群川的了解当然更不可能是亲身的体验。大家是透过报章、杂志等媒介的报导各自去捉摸他的形象。

121

这些形象通常都是从真实的人物身上抽出若干有关的属性（但不是所有的属性），化约成某些概念，这些概念都有以偏概全的缺憾，都不够完整。社会群众便是根据这些不周全的概念去“理解”陈群川的。这情形使我们想起“瞎子摸象”那则寓言。

由于陈群川是一个“概念化了的人物”（Conceptual Character），因此误解他的概念传播一定在所难免，有些误解甚且可能是刻意的中伤。而令当事人苦恼的是，他非但不知道误解他的是谁，误解他的程度有多深，更无从获知误解的负面影响目前渗透到社会的那个阶层、对他的个人事业起著怎样的作用。

公众人物是由大众传媒授精、怀孕，然后产生，他的解释也唯有进入传媒来个“形象再造”始可纠正。前些日子，陈群川为了婚姻问题，还有郑湘媛女士的结婚礼服的价钱问题备受误解／诟病，陈先生最后挺身而出向报界作出澄清，可为例证。

概念化了的陈群川

作为一个概念化了的人物，当人们提到陈群川这个词的时候，它的意思（也就是它背后所蕴蓄的概念）往往和当事人相去颇远。就记者的看法，陈群川一词至少蕴涵了下面的五种概念，那就是：

●第1种：陈群川意谓“慷慨多金，乐善好施”，在一些场合你可能听到有人那么说：“我又不是陈群川，那里可能捐那么多的钱！”

●第2种：陈群川意谓“冒险犯难，投机性强”，有人在股市里这么说：“最近他炒股票炒得好凶，他大概以为自己是陈群川吧！”

●第3种：陈群川意谓“事务多元，身兼数职”，父亲这样劝告儿子：“你认为自己有三头六臂吗？什么事都插一手，就算陈群川也吃不消啊！”

●第4种：陈群川意谓“衣服丽都，倜傥不凡”，上流社会酬酢的某个场合，有人如此品评：“X先生真帅，成个陈群川咁嘅款！”

●第5种：陈群川意谓“运势起伏，变化具戏剧性”，也许你会听到有人说类似这样的话：“昨天他仍是XX挂牌公司的老细，谁知一跤摔下来，今天倾家荡产，变成了陈群川，唉。”

有血有肉的陈群川

其实“陈群川”一词又何止涵盖上述5个概念而已，对某些人而言，“陈群川”也许是“事业失意，情场得意”的代称，或“少壮发迹，中年破败”的符号，这些代称或符号都有真实人物的某些属性，因此它们既不全对，亦非全错，“都有它们的道理”。

对于像陈群川这样的风云人物，要真个了解他，不能透过概念的简化，而要通过资料的汇编：把他早期的奋斗，少壮的腾达，从商的事迹，政界的活动与表现，以及他个人的心路历程，他的成败与悲欢整理成帙——换言之，便是为他立传。撰写这本书的人必须有学术的训练（最好能对国内的企业状况、政情以及社会背景都有相当的认识），态度必须中肯客观（以成败论英雄便非客观），才能把“概念化了的陈群川”还原为“有血有肉的陈群川”。我认为，陈先生作为一个“政经夹心人”的独特经验与感受，一定能提供读者某种震撼心魄的“智慧启发”。

18.6.1989

既要强悍，又要美丽

1979年香港在财经界担任主管／经理级的女奖不上10人，1984年杪（5年后），财经界的女主管人数跃增至200余人。这现象说明了什么？

最近我在首都约见了16位女主管，目的在于增进自己对女性管理阶层人员的了解。书本上的知识没有现实的佐证是缺乏说服力的，而国内不流行问卷式的社会调查报告，不易汇集资料，我只能通过自己的接触去了解面前的“新人种”。

要研究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我想不能不注意女性就业的情况，以及女性大步迈入男性职业市场的具体事实，女性大批进军就业市场，而且挤进了管理高阶还是近10年（也就是踏入80年代之后）迹象才趋明显的。1979年香港在财经界担任主管、经理级的女将不上10人，1984年年杪，一项调查显示财经企业的女主管人数已跃过200大关。女性管理阶层势力膨胀得那么快，令许多人都为之咋舌。

作为一个社会观察者与文化现象的业馀研究者，我对职业女性的朝向“既要强悍，又要美丽”这目标所作的种种努力最感兴趣。我约见的16位女主管，口才很好，有几位词锋甚至倾向于锐利，每个人的反应都十分灵敏，联想力也够强，这些客观的事实印证了我的一个看法，即：能够掌管要务的女性主管，绝非平庸之辈。比较之下，碌碌无奇的男性主管在任何机构都可以随手拈几个出来。

这16位女主管，有些共同点，值得我们留意：

男性观点：“爆炸头”不美

●她们上班，都穿长袖外套／大衣，这些外套／大衣肩宽都加阔，内

藏肩垫，这使他们的肩膀看起来比实际宽些，也较能予人一种庄重感。宽肩较具威仪，她们都懂得这道理。

●没有一位女主管的发型留“爆炸装”。她们都认为，爆炸装给人的印象是“野性”或“狂放”，与她们的主管身份有冲突。她们不喜留爆炸头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们在业务上接触到的男性几乎没有一个认为爆炸装是美的。

●她们都不穿花花绿绿，设计、色彩艳丽夺目的衣著。

●她们都穿著包趾，包跟的中高跟鞋。高跟鞋的颜色，大致上都能与衣饰的主色配搭。她们都带著一个中型的手提袋。

●她们的脸上都有化妆。除了其中3人由于经营的是美容护肤业著色较浓外，其余的女仕都倾向于雅淡。所有16位女主管都明白上班办事，化妆是一种礼貌也是对自己职业的最起码的尊重。16位主管当中有12人同意，高明的化妆是不轻易泄露自己上了妆这事实，尽量做到“不著痕迹地”凸出脸部五官轮廓，线条的优点，而把自己形貌的某些先天性缺憾淡化。她们用各种品牌的香氛，使自己清爽近人。

太胖影响专业女性形象

●所有16位女主管都有自己的车子，这似乎证明了一点：汽车是女性行政管理人员“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她们当中超过半数每年或隔载出国旅行一趟。有者3、4年才出去一次，其中有3位女主管是抽不出馀暇到国外旅行，但对旅行深感兴趣。所有16位女主管咸认为旅行是重要事项，“有机会一定要出国玩玩。”

●16位女主管当中有1人从事健身运动（其中以慢跑，打网球，跳韵律舞者最多），即使“抽不出时间”或“没有剩馀的精力”参加健身活动的其余5人，对自己的体重、身段同样十分留意。除了运动，大家都甚注意饮食的抑制，避免过胖，“因为太肥会影响到专业女性的形象，行动也不便。”

购物使自己觉得年轻

●所有受访的女主管都喜欢自己购物，原因可分6种：

- 1.购物可以松弛身心。
- 2.购物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有助精神卫生。
- 3.可以藉此接触到流行和新出炉的商品，增广见闻。
- 4.购物受到店员的礼待，内心有一种满足感。
- 5.自己赚到的钱，当然是自己花。
- 6.购物时感觉自己比实际岁数年轻。

以上资讯反映了16位女主管的生活与消费取向。由于受访人数太少，它的代表性显然是不足，不过它仍在相当程度上让我们窥见当前国内女性管理阶层的价值选择与行为习向。今日女性是既要强悍，又要美丽；既要保持女性的柔媚，又要兼具男性的果决；既要顾好家庭，又要搞好事业，这种二元性的社会角色实在不易扮演。

23.6.1989

文化总体的微分观察

——我看“新山模式”及其意义

陈徽崇自70年代中期以降，不断推广正统音乐，从作曲、声乐训练著手，培育音乐新血，为“新山模式”奠下稳固的基础。

“新山四陈”与“新山模式”

新山有四陈，四陈者何？曰陈徽崇、陈清水、陈再藩、陈志光4位先生是也。新山四陈加上相声高手姚新光、女高音叶莉蓉、搞理论的叶夏贵、郑云城，以及陈徽崇领导的合唱团、军铜乐队成员，陈清水的舞蹈团班底，“新山模式”——这名称是笔者杜撰的——可谓规模已具。

近年来新山的文化艺术活动蔚然可观。从端午座谈，诗曲演唱，到中秋传灯，无不别开生面，传为美谈。近期用廿四面大鼓之雄浑音响来凸显华人历法的廿四节令，构想新奇，创意十足，尤其令人赞叹。

当然新山文化活动的卓然有成，有它历史累积的促成因素。据我所知，陈徽崇自70年代中期以降，不断推广正统音乐，从作曲、声乐训练著手，十多年来也不知培育了多少音乐细胞。陈清水步武陈徽崇，而以培训舞蹈新血为职志，80年代以来成绩亦有目共睹。加上姚新光、陈志光的鬼马相声组合，还有一个擅于筹划营运的“行动派”陈再藩，文艺性演出的人才资源大抵不虞匮乏。

人才网络紧扣相系

“新山模式”之所以在新山“无往不利”（一些小挫折自然难免），视唱、造型及其他表现艺术之人才网络紧扣相系，形成一坚实阵容，我想是主

因。除以之外，新山也有它自身颇为特殊的人文环境。这个屹立于马来半岛南端的边城，华裔人口近20万，不多不少，方便号召；华团以中华公会为领导中心，因此活动由中华公会领衔，一切都好办；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又能凝聚各路豪杰的力量。

新山还有一有利之既成条件，那便是宽柔中学大礼堂提供了绝佳的舞台表演场所。这个大礼堂的舞台、灯光、幕景、设备都臻水准以上，可供大型演出。除了冷气调节一项尚付阙如之外，其他科技设备几可媲美吉隆坡的天后宫礼堂。据陈再藩相告，这许多年来宽中大礼堂每有演出，主办当局的赞助单位基于演出效果的需要，往往增设一些音响、灯光器材，久之宽中大礼堂的设备自然趋于齐备。有这么一个场所，恰逢这么一群有心人，“新山模式”自易发挥施为。我们都知道宽柔独中是南马华教的枢纽所在，其实宽中同时也是文化表演与展现的温床。宽中在民族艺术文化的传播、推行方面，它所扮演的角色我以为具有示范的作用。

吉隆坡的文化生态

陈再藩“好大喜功”（一笑），他有雄心把“新山模式”推广到国内其他大城去，首站便是吉隆坡。廿四面节令鼓，数度被首都团体“征召”，突出了陈徽崇的鼓魂形象，也加强了陈再藩北进的信心。4月底他与一群文友联手于首都办“漩涡之夜”，筹谋汇集文人、商贾的实力，为未来的文化出击开路，是北上的重要试探。

这项计划得到新山长者丹斯里郭鹤尧，吉隆坡的张景良、陈凯希、朱自存、骆静山、叶逢仪、陈友信，以及多位作家诗人、报章编辑、教育工作者的支持。可惜前来出席的企业界人士太少，“漩涡之夜”予人的感觉是文化人一厢情愿，议论纵横到头来仍缺乏企业界的实质挹注。“新山模式”在首都似不容易销行，因为“新山模式”是一群合作无间文化份子，结合当地最高华团组织领导人的支援，在一个广为当地市民熟知而又感到十分亲切的场所（宽中大礼堂）演出／展出，这三项文化生态因素，在吉隆坡这个国

内的一号大城里，要组合、衔接起来实在谈何容易。

陈再藩：猛龙过江？

张景良先生在“漩涡之夜”受邀致词，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欢迎像陈再藩先生这样热心的年轻人，从新山猛龙过江，前来吉隆坡……”（大意如此），张先生还讲了一些嘉许的话，不过个人却无法像张先生那么乐观。吉隆坡的领导中心不像新山那般单纯，中华大会堂、中华总商会、华人文化协会、各乡团总会、青团运、青运……无一不可领导群伦，要聚众力于一体反而戛戛乎其难。在人事方面，吉隆坡的文化份子亦不似新山同道那般 Closely-Knitted。即便是演出之地点，天后宫、马华大厦的三春礼堂、八打灵的公民中心，选择方面亦多了其他可能。要把“各有所属”、意见纷纭的首都文化份子“冶于一炉”，为一个共同目标奋斗，理论上做得到，履践起来却很困难。

我个人对“新山模式”的长期性战略作用的估测是：它肯定会造成某种程度上之震撼与刺激（“刺激”一词较当），从而间接影响了国内其他大城的文化／艺术表演的形式与内涵。这情形，或可以数学的微积分原理析论之。一间 Boutique 多增加一名车工，即可多裁制几件衣服，这增多了的边际产品（Marginal Product），便是微积分里的“微分”（differentiation）。同理，如果国内文化活动之总和为一函数，那么新山一地的文化动量便是此函数一端的细微变数（Variable），此变数之增加（其实是“强化”，因为人文活动无法量化），又会回过头来影响到函数另一端的文化总体的表现。

因此，我的观察是，“新山四陈”配合姚郑双叶的努力，虽难望迅速改变国内其他大城的文化／艺术表演现状，却可盼通过“新山模式”的展示与观摩，引发国内其他城镇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内心的回响，从而催化文艺演出／展现的创新意图与决心。如果你同意我的小小观察并稍稍留意，6月间巡回数地的“动地吟”现代诗朗唱会的组合形式，便不难看到“新山模式”的若干投影。

“命”“运”论衡

——一次学术性的试探

中国人一方面相信“命中注定”，另一方面又相信“人定胜天”，而归结于“尽人事而听天命”，汉宝德先生认为这是“健康的迷信观”。

“命运”一词是“命”与“运”两字的组合，这两个字的意义与内涵，似相反实相成，最后又能收到互补有无的作用。本篇尝试探讨这两个字的独立意义和“命运”这个词的实际指涉（reference）。

“命”有命定之意，所谓一切皆由命定，有识之士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乃有自由意志，尽其在我的辩诘。亚里斯多德曾经指出宇宙间固无巧合偶然的事，一切人事人物的兴衰更替，都有前因后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非铃羊挂角，皆有理则可循。自然界万千现象，都或简或繁有其秩序性，彼此互为因果，共生依存。

生老病死的宿命

既然宇宙现象——这里头包括了人类活动——均有因果条件造成生发变化，我们便不得不承认世间有“必然性”此一律则之存在。“命”的意义即指陈人类生存的某种必然性。这样说可能不够清楚，需要加以申论说明：我们都知道人皆无可遁逃于生、老、病、死，故此，生老病死此一自然律乃人与其他生物之共同宿命，圣奥古斯汀从时间观念看人，认识人乃“有限存在”，此一“有限存在”的格局便是人的宿命。常人一生必会遭遇某种程度之荣辱得失，这种必然性便具宿命的色彩。丧失智能，或无能感受的植物人可免成败休咎的经验，唯他们不属于正常人的范畴，不适用于一般性的论

断。

从过去到当前的人物，我们看到不少才智之士，郁郁不得志，一生奋斗经营，成就不过尔尔，反之，碌碌无奇之辈反以庸庸得厚福，因缘际遇，亨通显扬。这种例证不胜枚举。人们以为这是冥冥中的安排，乃命之所致，这种“前定”的思想（即相信一切都早已注定），几乎成了一般人的“共识”。这种“共识”建基于“命”的认知而忽略了“运”的营作（或把“命”视为“运”之同义），有其消极性的影响，人们容易把成败得失委诸天命，“认命”遂成了治疗挫折感的特效灵丹。

宗教思想的命定倾向

当前的伦理宗教信仰全知的神／上苍，由于神／上苍是全知，故能无所不知。祂知道人（从个人到全人类）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人们的未来将依照祂的前知而一一具现／发生。“先知”的出现受到尊崇顶礼，因为“先知”有预知未来的神通异禀。“先知”的出现与“先知”角色的受落，显示某种宗教思想的命定倾向。

相对于“命”的必然，是“运”的或然（probability）。所谓“或然”是可以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至于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少，则胥视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而定。如果“命”是人生整体的种种因果总汇，那么“运”便是人生流程的阶段发展。“命”指的是先天性（也即是前定）条件，“运”指的则是这种先天性、前定条件随著年龄，环境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变动而产生的消长变化。“命”既是“必然”，便无可改变；“运”既是“或然”，便能随机遇更迭而消长变化，出现种种“新的可能”。

尽人事而听天命

如此，则“命运”一词的意义表面看似矛盾抵牾，实则最能互补有无，反映中国人圆融的人生哲观；一方面相信“命中注定”，另一方面又相

信“人定胜天”，而归结于“尽人事而听天命”，汉宝德先生（名建筑师，现任台湾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认为“这是健康的迷信观”。“命”是不由自主；“运”却可以由自己主宰，奋斗努力是必须的，成败得失则有超乎个人能力的因素在促成或干扰。

希腊悲剧探讨命运旨最深刻的要算 Sophocles 的《伊狄柏斯王》。神话预言伊狄柏斯日后将杀父娶母（预言便是一种命定论）。事情的发展果然，伊狄柏斯后来在不认识生父的情况下杀了雷尤斯，悲剧的发生可谓“命中注定”（或预言应验），伊狄柏斯知道真相痛心疾首之余，乃把眼睛挖掉，自我放逐于天涯，这便是他个人的抉择，也是他自己选择要走的“运”。其实他还有别的选择，潜修忏悔，自杀谢罪都是。杀父是“命”固属无可避免，杀父后如何“处置”自己，则是自己可以主宰的“运”。

“运”的后天消长变化

中国术数家如果要在命理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必须先厘清命运的意义。四柱推命约有25万种命格组合，紫微斗数最多能排出2,488,320个命盘。中国人口有11亿，以斗数命盘来算，平均有450人共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命盘。如果我们说这450人每个的命运都“一模一样”（都有3个孩子，都结婚两次，同一天归西）岂非荒谬滑稽？除非我们肯定／认知“运”的后天消长变化，否则命如果一生来“不好”（所谓凶命），大可不必活下去。

子平与斗数只能寻出某种命格类型，以及这些类型的特性及先天性因素，至于这些特性及先天性因素怎样去配合、适应外在环境——包括学习新知、改善技能、选择行业（后者尤为重要）——则450人，人人不同，approach 互异，结果（应该说“成就”）当然就有差别了。

8.7.1989

职业中途异离发展

一开始便选择适合自己性情、志趣的行业，可免将来节外生枝。

20岁时适合当事人的职业，40岁时可能已变得缺乏挑战性。

兴趣与现职相抵

中年人最大的困扰莫过于在事业或婚姻半途，产生自我怀疑，继而“憬悟前非”，终于决定另觅他职或伴侣。这种现象即社会行为学之所谓“职业中途异离发展”（Mid-Career Development）与“婚姻中途异离发展”（Mid-Marriage Development）。

本文限于篇幅，仅能讨论前者。

造成职业中途异离，原因很多，不过大抵离不开下面3个范畴：

(1) 年轻时择业，不够深思熟虑。工作了十年八载，才逐渐发觉自己的兴趣与现职风马牛不相及。勉强屈就，乃是为了糊口，精神苦闷日甚，忍无可忍于是有辞职他就，另谋发展的动机。

(2) 人的个性会随著年龄的长大，阅历的增加，知识的扩充，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改变。20岁时适合当事人的工作或职业，40岁时可能已变得不够挑战性。当事人觉得工作枯燥乏味，一有机会便另寻发展。

(3) 从事一种工作／职业多年，一切都变得机械化，刻板化，业者每天照章行事，“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长此以往，这种厌倦心态可能会恶化为“耗尽并发症”（即 Burnt-Out Syndrome）。当事人对现状极度不满，自然会萌生转职之念。

转职失误，连累家人

不过转职说来容易，实行起来却问题多多。对于一个成了家，有了子女（通常孩子还在念中小学）的中年人，转职确是件伤透脑筋的大事。

转职除了要面对人事、工作环境的适应问题，当事人还需面对“会不会弄巧反拙”以致“连累到一家大小”的风险。

有时转职之后，拿到薪酬反而比现职还低，但新职位前景（包括擢升机会）甚佳，像这种情况，该去把握呢？还是放弃？实在费尽思量。

一份有挑战性的工作，通常也意味著较大的工作压力，较频繁的人际应酬，照顾家庭子女的时间也被剥夺了，一得换来一失，这样的转职划算吗？同样是个两难式困境。

一个政府公务员转职私人企业界，弃将来的退休金／恩俸金，取每年分得的红利，这样做会否“短视”？公家职位的好处在于稳定、生活有保障，但擢升机会似乎有限，每年加个30、40元，如此而已。如果薪金已臻顶点者则连这点“奖励”也没有了。薪酬年年如是，真是“怎一个愁字了得！”私人企业界常以才具能力奉酬，又有论功行赏的其他奖掖措施，对于有野心肯上进的人吸引力当然甚强，转职者担心的是公司能不能一帆风顺，长期赚钱，如果业务转滞，公司或裁员或减薪，岂非遭殃？鱼与熊掌，孰佳孰劣，真是费煞踌躇。

工作要有成就感

要避免就业中途的离异发展，最好第一步就要走对，一开始便选择适合自己性情、志趣的行业，可免将来另生枝节。

万一入错了行，应该趁年轻，没有家庭负累时尽快转职，踌躇犹豫，徒然蹉跎岁月，浪费自己的青春。从事自己喜欢做的行业，纵使薪酬低些，工作辛苦些，都无妨，重要的是自己要有成就感，精神要愉快。

至于有了家庭子女之累才出现职业中途异离现象的中年男女，要顾虑的问题确是多了许多。当事人不妨客观地把转职与留守现职的优势与劣势

（好处与坏处）在纸上逐一列下，然后权衡轻重，看清情势，作一决定。一旦作了决定便按照计划走，不可再患得患失。如果决定之后，又再两边眷顾，反覆犹疑，那会“非常痛苦”。

14.7.1989

名教·文字咒·政治权术

文字咒一祭起，其“镇制力”(coercive power)足以驱逐法理，谋杀逻辑，而自成一种判断的基准。

《南洋南报》主笔张景云先生5月份有一个演讲，题为“新文化运动：未完成改革。”他指出国内的华人政党犹似“新名教”群的堡垒，因为它们“动辄抬出民族大义”“靠口号、标语来从事政治斗争”。张先生的论见，深得吾心，兹稍作引申，冀唤起族群对此现象的关注。

名正言顺，师出有名

政党搞的名教活动，是利用沿袭下来的许多中国古训、成语、人物轶闻、历史掌故作为素材，刻意泡制，甚至不惜断章取义，使这些古训成语、轶闻掌故收到凸出个人或所属党团的形象，或贬抑敌人的效果。

华族一向讲求“名实相符”“名正言顺”，做什么好歹都得“师出有名”。名教的力量在华人的集体潜意识里可谓根深蒂固。政客跳槽可以解说成“弃暗投明”；后母虐待儿童可以美化为“玉不琢，不成器”；雇主剥削雇员可以合理化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亚飞勒索，地痞收保护费可以巧为解说成“劫富济贫”；至于黑道中人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自然便是“替天行道”了！名教感人、害人，可谓深矣。

而名教之渗透性，可见之于吾族日常用语的词汇。随手引录2例，读者或可从中窥见此种渗透的严重程度：

“上次我帮他的忙，让他渡过难关，这趟我只不过要他打个电话替我向老板讲情，他却推三推四。他妈的，他既不仁，就莫怪我不义！”

“我才打亚强几巴掌，亚强便离家出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其实我是

为他好啊！”

触犯禁忌一律有罪

小小不快，居然扯上了孔仁孟义，“仁”“义”这些字眼在这儿已完全丧失了儒家道统里的本义，而变成一种禁忌；触犯禁忌一律“有罪”。“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则是一种文字咒，咒语一祭起，其“镇制力”(coercive power)足以驱逐法理，谋杀逻辑，而自成一种判断依据。

活在为名教网罗所羁禁的华族，其实是很悲哀的。悲哀的原因有二：一、为名教羁绊的人无法正常地根据情理从事思考，对与错、是与非、黑与白，都得参照传统的那套行为定则，任何思想、举措（包括创造性行为）如果不是“古已有之”，便会被轻易斥为异端邪说。二、一个过度依赖名教去阐释、判别事况与现象的民族，往往忽视现实，面对现代文明，“回应”顾此失彼。大部份族人生活在由道德训诫、伦理准则所筑成的僵化形式里，自欺欺人，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长此以往，民族的文化资源势必斩丧流失。

〈正气歌〉的神话高度

几年前国内华人政党发生党争，一时文字咒满天飞，两派都斥责对方“不仁不义”之余，把“疾风知劲草”“岁寒方知松竹之后凋”等等法宝都搬出来。好的往自己脸上贴金，坏的当作飞镖瞄准敌人掷过去。孔孟、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孙中山，这些有份量的人物名字都无所遁逃，屡屡被祭起，有时作为攻讦、诋毁对手的利器，有时又被利用为驱魔的护身符。其中尤以文天祥的〈正气歌〉更被供奉至图腾祭礼的神话高度。而根据华人那套非忠即奸的简易二分法，先捧出〈正气歌〉慷慨激昂一番者是忠良之士，被骂的一方自然是奸佞之徒。

国内的一些政党除了善于引用古训、故实为自己矫装、粉饰外，还大量引进一些摩登的口号术语，为团队的策略/方针寻找合理化的藉口。这些

摩登的口号术语便是张景云先生抨击的“新名教”活动。常听见政客振振有词地说什么“三结合”“政经分家”“与华小共存亡”“打入国阵，纠正国阵”一类的口号、标语，这种文字咒的要弄终究不外是一种政治权术的运用，能否落实履践只有天知道，正如产品的实质好坏与宣传无关。这种新名教活动与旧名教的那套并无什么不同，只是词汇新颖些，摩登化了，骨子里华族为文字障所蒙蔽，被“意底牢结”（Ideology）所囿困的病态文化实体则依然故我。

我们这个老大的民族为各种旧的、新的文字和观念的金刚箍笼罩了那么多年，什么时候才能幡然惊醒，摆脱“自我作茧”的桎梏呢？

22.7.1989

“机会成本”举例

国会议员翁诗杰付出的机会成本是“小说家方野”；同理，YB廖金华付出的机会成本是“写诗和散文的杰伦”。

著名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尝谓：“如果任何人掌握住了‘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的观念，他就懂得了经济学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我觉得他的话很有意思，兹尝试把“机会成本”这观念放在当前现实与我认识的人物中略加阐发。

资源有限

所谓“机会成本”指的是某种资源用以生产X产品，即不可能用以生产Y产品或其他产品。因为资源有限，无法同时从事多种产品的制造。生产X产品的“机会成本”便是，放弃生产Y产品或其他产品的“代价”。

在现实生活中，一位律师为了从政，每周得抽出5个小时的时间来参加党团的会议或工作，这种政治活动的机会成本，是他损失了5个小时法律咨询的金钱收入；某企业家手上只有1千万马币的游资，仅够他在速食业与房屋业之间作一项投资抉择，如果他选择进军房屋业，他就必须付出“放弃搞速食业的机会成本”；一个作家答应为两家报章写专栏，他付出的机会成本是他必须大量减少他的诗／散文／小说这方面的创作。不少专栏作家都交不出文学作品来，原因在此；而更多的“文艺工作者”（也不知是谁那么缺德，发明了这个名词），甚至连笔都生锈了，因为文艺工作搞的是活动，这些活动与实际创作根本是两回事。

资源是有限的，包括人力资源，都有匮乏耗尽的时候。即便是富可敌国的企业体，精力充沛的工作狂，都有各自的围限。上帝在这方面很公平，赋予每个人每天24小时，扣掉8小时的睡眠，剩下不到16个小时可供驱

遣，一个人要把家庭、公司大小、里里外外的事项都照顾、管理得完美无懈，“非不为，乃不能也”。

国小与华小的抉择

此所以成功的职业女性，料理家务总比不上专职家庭主妇那么有条不紊，以致于纤尘不染，时间，精力都不允许她那么做。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家事的“偷工减料”是成为女强人需付出的部份机会成本。

当前的华人家长面对及龄上学的儿女，为国小与华小的抉择犹疑难决，伤透脑筋。念国小有望国语的基础较佳，升上中学免了念预备班省却一年时间，要付出的机会成本是“母语教育的严重忽略”，以及由于教育背景不同，儿女长大后与父母间极可能出现的思想分歧。而念华小的机会成本是国语的基础弱些，并且得多念一年才完成中五教育。当然这儿指陈的是一般情况，念国小同时也掌握好华文，或念华小国语水准标青者，都属例外。

一个中等家庭如果有3名子女（假设是1男2女），每个念书成绩都不错，但却挤不进实施固打制的国内大学，深造之途只有海外。这一来做家长的便得作出痛苦的抉择，让资质最好的孩子到国外深造，其余两个孩子，或半工半读拿个函授课程，或索性辍学工作帮补家计。一般中等家庭收入有限，经济资源不足，要让1名孩子到海外深造，便得让其他两名孩子作出割舍，这割舍便是机会成本。

翁诗杰与廖金华

文学界的朋友当中，从政的有翁诗杰与廖金华。翁诗杰的小说甚具潜力，大学时期曾获小说奖，记得好像不止一次，而以笔名“方野”享誉文坛。担任李金狮部长的政治秘书后，小说不写了，于文化、社会、政治课题倒有不少议论，思路绵密，颇有见地，难得的是，他的文章没有一般政治人物行文的偏颇肃杀之气。中选国会议员之后，于小说，评论都无暇兼顾，故

此翁诗杰积极从政的机会成本是“小说家方野”，也即是暂时（或长期）放弃文学创作。廖金华10年前曾于金宝金龙园笔者故居，与草风（陈永安）伉俪，陈蝶诸人畅论文学的人道主义，中选州议员，国会议员以来，付出的机会成本是“写诗与散文的杰伦”，代价亦可谓大矣。

本篇谈机会成本，卑之无甚高论，只是据高希均先生提出的观念多作举例，并稍加说明，祈对人对己有所启发，如此而已。

24.7.1989

有挫折，而无挫折感？

从事直销的同道，彼此需要互相安慰，互相激励，“相濡以沫”，以纾解销售挫折感形成的精神郁闷和紧张。

挫折会带来挫折感吗？挫折感会造成精神、心理的伤害吗？挫折感伤害的程度有多深？会不会使当事人因而壮志消磨，变得消极自卑？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不仅万物之灵的人会面对挫折和其他形式的障碍，别的动物同样会面对各色各样的不如意和打击。

跳蚤的自信受挫

科学家曾对跳蚤作了一项实验。通常跳蚤可跳跃的高度等于它的身长的四百倍，换言之，一只30公分高的酒杯是困不住它的。科学家把它放在杯底，然后在杯口加个盖，跳蚤每次跃起都碰到杯盖摔了下来，如是者让跳蚤反复跳跃10余次，跳蚤的“自信”渐失，能力弱化，再也跳不到杯口的高度。这时科学家把杯盖移开，但跳蚤只能跳个20余公分，无力跃离杯口。这实验告诉我们，跳蚤虽小，但它却和其他动物一样，它的信心及能力是会受到持续性的挫折所磨蚀的。

今日许多甫念完中五便出来谋事的年轻人，他们有些推销产品，有些做保险代理，面对到的挫折可真不少，产品直销与保险促销，要用到游说的工夫，脸皮薄、容易腼腆窘迫的人是做不来的。如果人事网打不开，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的生意做完了之后，便会有茫茫人海，“知音”或“对象”难寻之叹。即便是亲戚、朋友、同学，也不是每个都愿意购物、购保的，10个当中也许有一两个肯“应酬”。换言之，这些年轻人初涉社会便需面对“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的挫败，至于这种挫折对当事人究竟是磨练还是伤

害，实在很难说。

笔者曾就此点，在一个讲座上向大约100名即将中五毕业的学员进行即席调查。结果有38人认为这种挫败是一种心志的锻链，另有40人认为这会造成伤害。21人弃权，弃权的原因是“没有真正的体验，不敢肯定挫折会不会携来挫折感”。有一位学员的反应最奇特，他举了两次手。我开始以为他在开玩笑，于是请他起立解释，他说：“我想推销东西经常碰钉子，遭人白眼，一方面是一种磨练，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伤害，心理的伤痕是无形的。”

是磨练也是伤害

这位学员的模拟语其实是句充满智慧的语言。跳蚤跳不出加了盖的酒杯，久之能力便衰退，感情敏锐如人类不断遭遇打击和挫败，如果硬说对精神健康毫无负性影响，这样的高调我是不会相信的。短期的障碍、挫折确有磨砺心志的作用；长期的打击、失败，即便铁石心肠也会气馁颓丧的。

每次我看到沿门逐户兜售商品的年轻人，在别人的住宅铁栅前“Auntie, Auntie”的叫个不停，得到的反应是“我们甚么都不要”“爸妈都不在家”，我都不忍卒睹，悲悯之情直透胸臆。像这样粗暴的砥砺，对一个自尊心偏强的年轻人，打击相信不少，内心有没有流血则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当然，对那些一向只会用父母钱，从来不懂赚钱艰难的小伙子，用这种方式“折磨”他们三两个月，相信他们对金钱和职业的观念都会有较深刻的认识，未尝不是很好的orientation。不过，若是长期从事这种遭人冷待，为人抢白，甚至可能被恶狗追噬的行业，几年干下来，身心不“遍体鳞伤”者稀矣！

先以电话联络顾客

我担心自己把事情想得过于严重，为此，我曾问过学员当中一位在考了SRP后赴新加坡从事直销业的女生。她推销的是厨房用具，方法是按照电

话簿上面的号码，一个一个拨过去，想办法与对方定个日期登门介绍产品（这方法我看要比国内沿门逐户，按铃强售有礼貌得多，也减少受到恶劣对待的机率）。在电话中她也曾给人莫名其妙地骂过，但“因为不是面对面，不快的感觉是难免的，但不致于难堪”。有时与对方约好了日期、时间登门造访，去到时却发现大门深锁，或一声“今天不得空，改天吧！”便把她搁在门外，害她白跑一趟。“所幸这种情况并不多。”她补充了一句。

我问起她在头一个多月，有没有销出甚么产品，她说开头那几天因没经验毫无收获，后来情况逐渐好转，而令她高兴了老半天的是“我卖出的第一个Crock Pot，顾客竟是马来人。想不到我那蹩脚的马来话竟然管用！”她告诉我从事直销使她学会了许多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包括：谈吐、礼貌，对顾客心理的揣测与了解，对陌生环境的适应，以及怎样克服自己的内心障碍与恐惧。“比方说，我的马来话一向说得不好，平时怕讲，但面对马来顾客，为了做生意，我浑身解数，把所懂得的与似懂非懂的词汇都用出去，文法是不行，表情达意还可以，这种锻链以及锻练所带来的飞跃式进步，是我前所不曾经验过的。”然则沿门逐户的销售行为，也有它建设性的一面。初不可凭自己一厢情愿的“白领意识”轻率地为蓝领或其他工作行业“定评”。

加强精神武装

我注意到从事各种直销／促销业的人士，往往十分需要彼此互相打气，以振士气。产品推销难免有滞市的时候，与人谈投保，商品，好些时候话题才开始，对方便断然拒绝，人总是人，多少还是会感到难堪的。同事间互相安慰，互相鼓励，“相濡以沫”，可纾解挫折所形成的精神郁闷与紧张。

我参观过一些保险代理的办事处，看到办事处桌上、墙上贴了不少励志的标语和格言，我想目的亦在激发同侪的斗志。直销商常常举办各种形式的“心智激励”的训练班，也是提供精神武装，让业者可以经受得起销售不利的挫折打击。有挫折，而无挫折感（或只有轻度的挫折感），大概是直销

业者赖以“磨而不损，锲而不舍”的原因。拙文反覆谈论挫折是否会带来挫折感这问题，用的是辩证法，结果如何，存乎读者方寸之间，因每个人的自尊心强弱不同，化解精神／心灵的苦闷，能力亦各异也。

30.7.1989

中国象棋的文化背景

中国象棋卒老无功的残酷现实，反映了中国社会轻视军兵，所谓“好男不当兵”此一特殊文化现象。

年前赴台，与素有“纸上风云第一人”之称的高信疆先生见面。那时高信疆已辞去时报出版公司总编辑职位，开了一家“上秦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立体象棋，并广邀艺术界友好为象棋造型，“让中国象棋站起来！”。他送了两副造型象棋给我，一为董阳孜设计的书法象棋，一为蔡志忠设计的孙子兵团象棋，并把雕刻家朱铭送他的一对自铸金蝉分赠我与瑞安。

董阳孜是著名书法家，笔力苍劲、质朴、厚重，当代女书法家当中下笔挥毫游走龙蛇者本已不多，能像董氏那样一手字写得古意盎然者则更属罕见。蔡志忠以漫画形式谈禅与老庄，诠释儒释思想，为历史人物造像，他的卡通画册畅销港台新马，近作又常在国内报章转载，“蔡志忠”，这个名字对本地读者而言早已耳熟能详。笔者对这两副棋自是十分喜爱。

独缺皇帝这枚棋

想不到笔者携带这两副象棋返抵国门，却在首都苏邦机场碰上麻烦。关卡人员对它们颇为好奇，问我它们是何物，我答之于“Chinese Chess”，他们左看右看都觉不像。其中一人说：“They look more like Chinese antique to me”（“对我来说，它们看起来更像中国古董”）使我窘在当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里自忖：如果以中国古董估价付税，大概要破产矣。所幸关卡人员也只是口头讲讲，并没认真，他们把两副棋的棋子逐一拈上来反覆端详摩娑一番，验明并无其他异状便允放行。不过等到我出得机场，已足足迟了1个小时矣。

前面提到 Chinese Chess，究其实，中国象棋实在不能以“Chess”称之，盖 Chess 为西方观念，是一种“以擒获敌国元首／皇帝为鹄的之游戏”。中国象棋地位最高的棋子为将或帅，元首／皇帝根本没出过场，不符“捉皇帝”这观念，因此不能称之为 Chess。如果我们稍稍比较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之间的分别，或可窥见中国文化的特色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的一些歧异。

中国象棋没有皇帝这枚棋，更见皇帝地位之高不可攀。对中国人而言，皇帝是天子，在中国历史上，御驾亲征是罕有的事，不像在欧洲、西亚、中东一带，一国皇帝管辖的土地有限，皇帝亲统大军东征西讨，开疆辟土乃平常事。国际象棋有皇帝这枚棋，也可视为“古代西方社会的实况反映”。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皇帝地位尊崇，把皇帝当作游戏中的角色，即便是一流角色，也有亵渎之嫌。古中国的文化、政治体制都不允许皇帝被视为玩偶。

Bishop 能远攻近袭

国际象棋有“教士”（Bishop）及“皇后”（Queen）这两枚中国象棋所没有的棋子。中国的僧道从来不曾主过政，释道是一种哲学系统或宗教信仰，无涉于实际政治；而教皇不仅是宗教首脑，在政治事务方面亦有巨大影响力。国际象棋的“教士”，能远攻近袭，威力强猛，适足以反映教权于中古欧洲的显赫态势。中国象棋不设“皇后”（Queen）一子，因为皇后虽说母仪天下，其实不过是皇帝的禁脔之一，于宫中还享有若干实权，军政外交，皇后完全沾不上边。吕后、武则天、慈禧是“例外”也是“意外”。中国为一典型男权至上的社会，女性社会地位卑微从中国象棋不设后此一事实可窥见一斑。

最饶有兴味的是国际象棋与中国象棋的兵卒地位之差别。国际象棋走到底线的老卒可以晋升为车、后、象或马，威猛绝伦；中国象棋的老卒只能在敌方底线上左右徘徊，威力大减。老卒的不同待遇反映西方与中国社会对男儿从军的不同评价。在西方社会，军人尽忠职守，骁勇善战，可望与文官

那样出人头地，攀上社会高阶。而中国社会轻视军兵，“好男不当兵”此一意识几乎充斥于社会各阶层。士农工商，兵卒不在四民之列，其地位卑微可想而知。中国象棋“卒老无功”的残酷事实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

相对以兵卒的卑贱，是“士”的尊贵。士坐镇九宫，辅宰将帅，一副运筹帷幄的气派。

148

唐代象棋乃立体

说起来，中国象棋的“棋”字可写作“碁”或“碁”，视其制作材料是木块还是矿物而定。在唐代，中国象棋本是立体的，三国时代魏文帝的“弹碁赋”有载：“碁则玄木北干，素树西枝；洪纤若一，修短无差；象筹列植，一据双螭。”宋以降不知如何竟平面化成文字，从造型艺术的发展来看，这是一种“文化倒退”。经过了那么多年，到了20世纪80年代，高信疆先生凭他过人之文化洞识，决定恢复中国象棋的造型面貌，并且邀集了朱铭、欧豪年、陈正雄、席慕蓉、孙密德、汉宝德、杨柏林、陈秋吉、瘕弦、柯元馨、陈瑞献等多位艺术家提供观念与亲自设计，使中国象棋又掀起文化性的广泛关注。

假日赋闲在家，与老友谢川成以蔡志忠的孙子兵团象棋对弈，心中兴起颇多感触，乃不嫌琐屑，写成这篇有关象棋文化背景之短文（数年前曾写过另一篇），以为自己当前心境的注脚。

4.8.1989

现代人的“迷思”

一味以追求异性为乐、而又不肯结婚成家的“感性人”(esthete)，心理都稚嫩得很；所有成熟的人都有伦理意识，对人际交往都有一种责任感。

昨天收到三封朋友的来函，这几封信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点，它们均弃一般性的问候语，而以“祝忙”作结，这现象勾起我好些感触。现代人有不少自以为是的“迷思”(Myth)，而视“忙碌”为成功的象征，可谓其中莘莘大者。除此之外，现代人对于“成熟”的看法，亦十分奇特，可谓荒谬，本文尝试一并讨论之，希望藉此引起一般社会大众的自省。

149

迷思一：愈忙碌，愈成功

心理学家弗洛姆(Fromm)在他的名著《逃避自由》里尝谓：现代人有一错觉，以为自己愈忙碌，则愈成功，身价地位也愈高。他们把“忙碌”(busyness)和“事业”(business)混淆在一起，把它们看成一体。其实忙碌许多时候只是“无事奔忙”(busy doing nothing)，或“忙著却不知道忙些什么”。

忙碌使人们的血压增高，心脏蒙受的压力加大，健康更易受到损害，真是一无是处；偏偏有那么多人以忙碌衡量幸福，毋宁怪事。不少人，尤其是商家与政客，虽然口里抱怨“真是忙碌命”，但言词之间掩饰不住那一份属于所谓成功人士的沾沾自喜。富贵中人都喜欢以大忙人姿态出现，频频看表，表示约会一箩箩，排著队等著要见他的人多著呢，至于他的身份矜贵到什么地步，又与其忙碌程度成正比例。这实在是一种可怕的虚荣与自欺。积非成是的结果是，大家都在装忙，以示自己还混得不错，至少不致于落后。在这情形下，如果有人坦承：“我最近闲得很。”听者便可能联想到“看来他是不行了”或“他的事业恐怕走下坡了吧。”多么可笑的判断。

哲学家罗素曾在一篇题为〈赞美闲暇〉(In Praise of Idleness)的文章里指出：哲学也好，文化也好，均起源于闲暇中的抽象思维。生活没有闲暇，思想就会停滞，观念也难望有什么突破。说起来不仅思想观念需要闲暇去培养酝酿，任何艺术的创作都需要闲暇所提供的时间空档去完成。一个身心两忙的人，正如一个肌寒交迫的人一样，你还能期望他在思想、观念、艺术、文化方面有什么贡献？

150

忙里偷闲真好汉

懂得生活艺术的人，知道怎样忙里偷闲，也知道怎样调整自己的休息时间。他们可忙可闲，甚至亦忙亦闲，控制权在自己手里，不为他人的操纵。即使是闲中也可以忙著整理自己的思考点滴，读书印象，与友人谈话的感受所得。闲暇提供给他的是一个“让思想长上翅膀自由活泼地飞翔”的机会，我之所谓“亦忙亦闲”关键在此。工作狂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工作狂的身心系统已经“自我工具化”了，非不停操作不乐，懂得如何忙里偷闲才了不起。在出席一项重要会议前，去游泳池泡上一个小时，舒适身心，忘我一番，这是英雄好汉才能臻至的“无畏”境界。

下来谈现代人对“成熟”的迷思。我把这迷思分成两类，一是自诩为“I am not the marrying kind”的“感性人”(esthete)。按“感性人”一词为存在主义大师齐克果(Kierkegaard)所铸的新词。他指的是那些“一味以追求异性为乐而又不肯结婚成家”的都市猎人。这种心理稚嫩得很，不愿为人夫也不愿为人父，把恋爱视为感情的游戏，并以狩猎成果在友侪间传吹嘘，自鸣得意。他们以为自己“成熟”得可以摆脱婚姻的禁锢，而又可以享受到男女相处的乐趣，其实彼辈离开成熟的“伦理人”(ethite)远甚，所有成熟的人都有伦理意识，对人际交往都有一种责任感。

迷思二：烟酒象征成熟

另一类迷思，是以为会抽烟，能喝酒才算“成熟”。这当然和广告的渲染，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都有关系。许多人以为烟酒象征了人生的“真实”，这“真实”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其他的人文活动，广告、影片及一些传播媒介在后面推波逐澜，要人们相信“有型有款”者要抽好烟，喝烈酒，错觉和迷思一旦形成，久之便形成一种流行的社会习尚。

烟客酒徒心理都有缺憾(至少是不平衡)，而那些需要仰赖一支烟或一杯酒在手，才能稳定自己的情绪，“才能表现自我的才华”的人，都是不成熟的人。成熟的人懂得怎样清醒地自主、自处、自爱、自信，对人从容自然，不亢不卑。成熟的人也不急于表现自己的才具，而才具自然在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间焕发开去。一个四肢健全的人自己可以行走，毋需仰赖烟、酒这两根多馀的拐杖。

或许我们还可进一步引申，“成熟”是一种怡然自得的气质，是装不出来的。此所以有些老顽童永远给人长不大的感觉，而烟客酒鬼“满眼红丝、齿牙焦黄，气息中人欲呕”的猥琐邋遢，予人的印象不是“成熟”，而是“腐烂”。

9.8.1989

151

天狼星诗社：

“神话王国模式”的兴衰

天狼星诗社的存在除了提供年轻作者某种“文学启蒙”外，还以事实证明了：年轻人具备为追寻理想而忍受生活煎熬的浪漫热情和赤忱。

与报馆的朋友在电话里谈起“新山模式”，朋友说“你和你的朋友也可以搞一个怡保模式啊。”我告之以当前怡市锡业不振，屋业萧条，赞助人难求，表示“怡保模式”实无力促就。口里解释，心里却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当年创立的天狼星诗社，那个“神话王国模式”。我，也曾经是文化模式的建构份子。我心里想，却没敢说出来。

“神话王国”这一称谓，引自赖瑞和在学报月刊1973年6月号的一篇专访题目：〈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赖瑞和的看法如下：

“20世纪的文人都是有点怀念过去的，有点nostalgic的，总想拥有自己的一个神话世界。而廿世纪的文人更是一批需要爬进他们各自的神话世界的动物。一旦经营好一个神话世界，在西方，叶慈可以写他的Sailing to Byzantine或The Second Coming，卡夫卡可以写他的《审判》；在东方，施叔青可以写她的〈约伯的末裔〉，七等生可以写他的寓言小说。也许就在这种‘神话’意念下，霹雳有一群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天狼星诗社，向外面的世界摆了一个‘神话的姿势’。”

“这是一个有纪律有秩序的世界。……天狼星诗社及其分社的社员，得经常有创作，才不致被淘汰出去。他们每两个星期需交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篇小说，然后彼此交换、传阅、修改、讨论。”

出版手抄本《绿洲》

“在天狼星诗社的总社长温任平的领导下，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分工合作，默默创作，并且编了一个手抄（偶而也油印）的刊物《绿洲》，从1967年开始至今，一出便出了25期。在印刷业发达的时代，居然有人以手抄方式来出版刊物，从现实的眼光看来，真是一则神话。但他们却以这种方式，维持了他们不断创作的决心，沉醉在他们的快乐世界里面。”

“……除了编刊物外，他们还举行座谈会，爬山、野餐等活动。这些座谈会的记录，有些已经发表在《教与学月刊》及《蕉风月刊》上。”

“这种干劲，得有一种自以为是、牢不可破的信念来支持。这种信念，多少有点youthful romanticism, idealism, 不理睬现实考虑的意味。但只要他们不爬出由这种信念所支持的神话王国，他们便可以默默创作，快乐而认真的做他们的事，一如《仲夏夜之梦》里的金童玉女，深夜在树林中唱歌、跳舞。暂且不管《仲夏夜之梦》以后会发生的事。”

“唐宋八大家会议”

重读赖瑞和的文章，我的心里涌起许多异样的感触。瑞和的特稿发表于1973年6月，那年年底，天狼星的分社增至10个。温瑞安的书房墙壁辟了一个“振眉诗墙”，用壁报方式“发表”社员的重要作品。我本身则每月召开一项文学精英会议，这会议只许8位表现特出的社员参与。8位社员每月都得交上一篇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创作，影印成八份，在会议上传阅讨论，由我负责甄选出最佳作品。大家把是项文学聚会称为“唐宋八大家会议”。年轻人逞才使气，只看“唐宋八大家”聚会，便可想见一斑。记得温瑞安的第一篇玄幻小说〈凿痕〉，方娥真的散文〈长明灯〉，黄昏星的诗〈最后一条街〉都曾先后在“唐宋八大家”月聚上先后夺取过最佳创作奖。

天狼星诗社一直在做著《仲夏夜之梦》，第一次梦醒是在瑞安、娥真、李宗舜、周清啸、廖雁平等入赴台深造不久后发生。我与瑞安为了殷建

波于1975年辍学赴台事件闹得极不愉快。瑞安在台另创神州诗社。天狼星诗社一夜之间垮了半壁河山，幸亏仍有张树林、沈穿心、洪而亮、谢川成、黄海明、叶锦来、蓝启元、蓝薇、冬竹、郑荣香、孤秋、朝浪、潘天生、川草、凌如浪、林秋月、心茹等人撑住局面。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事纠纷开始冲击我们的神话王国。为了面对一个“没有了温瑞安”的天狼星新形势，我定下了1978年的整顿计划，于该年诗人节宣诗社进入“中兴时期”。1978、1979、1980年我和诗社几名成员，一口气策划出版了超过十本书，《大马新锐诗选》《天狼星诗选》都在这期间先后面世。1979年6月的诗人节，我在金马仑的聚会上宣称诗社晋人“起飞阶段”。

结婚是写作的坟墓

诗社于80年代初培植了好些文学新血，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张允秀、吴结心、廖牵心、游以飘、张芷乐等潜质可期的写作人才。但我这时对整个神话王国模式的有效操作，信心动摇。许多社员在工作、家庭的压力下打退堂鼓，女社员在婚后全部（注意“全部”这两个字）淡出文学界，包括被何柴良誉为“有潜力摇身一变成为另一个Emily Dickinson”的蓝薇、林秋月、郑荣香（飘云）都逃不过这公式，甚至一向执著坚持的蓝雨亭在订婚之后亦来信表示得尊重未来夫婿的意愿告别文坛。许多理想和现实无法取得协调。

为了扭转颓势，我与张树林、沈穿心、孤秋、暮静、朝浪等人在安顺成立了一家“世纪文化公司”售卖现代文学书刊，希望拥有一个据点，加强社员的凝聚力。可惜生意蹇滞，经营未善，不久便倒闭。诗社社员劳燕纷飞，各奔前程，任何神话都阻止不了它花果飘零的命运。他们有些积极读书，有些则到国外另谋发展（像风客、冬竹、陈美芬），大部份散居国内，服务于报界、教育界和杂志社。神话王国的神话色彩，片片剥落，诗社甚至没有能力提供社员小小的安身之所。

我不知道将来的天狼星诗社，会作出怎样的蜕变，不过我想它已经不

能再靠过去那个神话模式生存、发展。它必须面对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现实是它的根源，也是它的梦境，天狼星的前景是好是歹，也许一两年内情况会转为明朗化，那时再说吧！

20.8.1989

三十而立的马华现代文学

国内的诗坛活动，今年虽频频仍，但却没有一个活动是为了纪念现代文学30周年而发起的。中国学运爆发，大家都伤时忧国，心坎填得满满的，似乎再腾不出空间容纳别的东西。

1978年8月吧，当时在大马华人文化协会担任署理会长的郑良树博士写了一封信给我，邀我出席该年年底由文协主办的一项大型文学研讨会。两天的研讨会共宣读10篇论文，由新马两地的作家提呈，我负责谈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并需附上一份〈马华现代文学系事〉。

文学史料残缺不全

接下来是一段孵豆芽的日子。我花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写成了长文〈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文章的资料除了靠自己一直以来有留存的《蕉风》、《学生周报》（后来改为《学报》）及报章剪报外，我还从诗人艾文、小说家宋子衡借来了出版于60年代的《海天》、《荒原》、《银星》、《浪花》等刊物作为参考，这些刊物虽然“短命”，但对于文学趋势的索隐工作，却不无帮助。

不过，我却无法应良树学长之命，把现代文学系事整理出来，因为我发觉几场关于现代诗的论争，包括60年代中叶在马来亚《通报》〈晨钟〉版的现代诗辩战，70年代初诗人叶曼沙受到攻讦而离马赴台的“黑诗事件”，我手头的资料都不足，〈现代文学系事〉整理不出来，非不为乃不能。

写著有关马华现代文学的回顾，检讨与展望，我强烈地感觉到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重要性，以及马华文坛在这方面的严重荒疏。我甚至没法找到一套齐全的《蕉风月刊》，出版社本身没保存，马大中文图书馆零星星有几十本，也不“齐全”。

关键性的一年

马华现代文学究竟发轫于哪一年？这问题使我伤透了脑筋。台湾方面，50年代初纪弦组“现代派”，宣称接受“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的精神要素”，变革的形势鲜明，年份没有争论性。大马方面，虽然艾文、周唤都认为1959年3月6日白垚在《学生周报》137期发表的〈麻河静立〉可能是国内的第一首现代诗，但会不会以讹传讹，实在很难说。无论如何，我仍认为马华整体性的现代诗运动肇始于1959年，因为1959、1960《蕉风月刊》开始发表数量可观的现代诗，《蕉风》94期（1960年8月号）甚至特辟了一个“新诗讨论专辑”，一连数期，供各方发表意见。现代诗作为一个 Infant Terrible，开始受到广泛的注意，抨击与非议随之而至，白垚后来在《蕉风》写他的〈现代诗闲话〉为现代诗辩护。诗的论争在1969年代上半叶的马华文坛此起彼伏，赞赏与反对的声量几乎一样大。这时，《五月》、《犀牛》的现代诗作相继涌现，作品常见报端，现代诗经蔚成气候。〈麻河静立〉虽非国内第一首现代诗，我后来找到的资料和文献证明了这点（当另文讨论），但1959年仍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现代文学是通过现代诗作为“点的突破”，造成运动所需的能量和态势，最终带动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的起步和发展的。

1980年，天狼星出版社出版了《愤怒的回顾》，副题为“马华现代文学运动21周年纪念专册”。书由我主编，蓝启元、谢川成任副主编，分论述、访谈、资料3部份。论述部份除了收入我的序论〈马华现代文学的几个重要阶段〉外，还收录了几篇论文，它们是：

（1）张树林：〈马华现代散文三重镇〉。

（2）蓝启文：〈马华现代文学新生代作者的困扰〉。

（3）沈穿心：〈马华现代诗的中心主题试探〉。

（4）谢川成：〈以宋子衡、菊凡为例略论马华现代短篇小说的题材与表现〉。

我们也以访问/笔谈方式请姚拓、锺夏田、王润华、吴天才、郑良树、杨升桥、陈徽崇、叶啸、李锦宗、宋子衡等位先生发表他们对已届21岁成年的现代文学底看法。

25 周年的庆典

1984年，马华现代文学运动的25周年，我在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州分会的理事会议上，提出了主办“第一届全国现代文学会议”暨“现代诗发表会”的计划，获得通过。是年4月，文协邀得大约60位诗人作家云集于怡保怡东酒店14楼举行2天的会议，以文类分组方式，讨论25年来的马华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的成果。会上宣读了3篇论文，分别由永乐多斯谈戏剧，温瑞安谈诗，我本人谈散文。在“现代诗发表会”，陈徽崇的数位高足唱〈流放是一种伤〉，徽崇亲自击鼓。天狼星诗社的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张允秀、朱明宋、吴结心、胡丽庄以独唱、二重唱及合唱方式发表了她们自谱的诗曲。那是我们为了纪念马华现代文学25周年而举行的庆典。

今年是1989年，马华现代文学“隆重”迈入三十而立之年。国内诗坛活动，今年颇为频仍，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活动是为了纪念现代文学的30周年而发起的，也没有一家报章杂志注意到马华现代30周年这事实，而以座谈、专辑、访谈的方式纪念它，凸出它，回顾过去瞻望来兹。

几位老友去年曾向我表示“会以现代文学的30周年为一凸出重点”，中国学运爆发，大家都忧国伤时，心坎似乎涨得满满的，再腾不出多馀的空间去容纳其他的东西。情形如此，令人喟叹。我本拟续继《大马诗选》、《大马新锐诗选》、《天狼星诗选》再与友人筹编一套新的诗选，亦因意见分歧被迫搁置。

我能做的是，今年我会出版一册个人双语诗集《扇形地带》(Kawasan Berbentuk Kipas)，这是我与潜默、张锦良合作的“结晶”，算是我对现代文学30诞辰掬上的一柱心香。个人力量有限，仅能及此；其他毋需多说。

26.8.1989

与姚新光谈相声衣钵

相声训练需要场地、人手、经费，尤以经费一项最是举足轻重，这不是3几个热心人肯去拼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与姚新光通了半个小时的电话，那一端传来的华语虽在酒后仍那么字正腔圆，使我有点吃惊。是的，就是那个以相声闻名的姚新光。最近他还成了众所瞩目的金牌司仪，在许多场合上“主持大局”。

我和姚新光谈的是相声的衣钵传承问题。个人于相声的认识甚浅，只知道相声艺术即使在中国大陆，也不能算当红的民间艺术。相声正如其他的中国传统民间技艺，像木偶戏，歌仔戏等，正面临日趋式微没落的危机。

据何怀硕的研究，“相声”一词始于清乾嘉年间，原称“象生”、“像生”，古老的汉书却称作“象人”。从“象人”“象生”“像生”到今天的“相声”，中间历经不少变化。大抵“象”意味模仿，“人”或“生”指的是演艺的人。“相声”是一种既说又唱加上动作演出的技艺，这种多元表现可以“说、学、逗、唱”涵括之。相声之要义在于把芸芸众生的百态、声口生动地摹拟出来，内容可以诙谐，可以笑谑，可以幽默，最忌粗鄙、荤黄、下流。

不采“正面击”

相声的演员在台上可能扮演小丑，但我想他与马戏班的小丑角色是不同的。当相声演员引人发笑的时候，他的用意不在胡闹，笑的内里往往另有深意，只是表达的方式曲折，常是寓庄于谐。当他讥讽社会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时，演员弃滔滔雄辩或所谓“正面击”(Frontal attack)，而采取旁敲侧击的策略，“刺痛你但却没让你流血”。

我想相声艺术之难，难在声调的控驭，语言的机智运用，现场听众的

情绪掌握，和动作表情的恰如其份。华语讲得纯正，能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的人，虽然具备了相声演员的“必要条件”却并非“充足条件”。

国内讲得一口好华语的年轻一代本来就不多，再要从他们当中挑出对相声有学习兴趣而又具备前面我所提到的种种能力/条件者，更是少之又少。声调、语言、表情这些演技能力多少得靠点天赋，拥有这些特殊禀赋的年轻人，志趣可能在念法律，从事社会工作或干脆参与政治活动，不一定看中相声这个大冷门。怪不得连姚新光也得承认：“相声人才往往可遇不可求。”

然则国内的相声艺术怎样才能赓续下去？去年吉隆坡剧艺研究会主办第1届“全国相声比赛”，姚新光参与策划，并邀得台湾的王振全、常忆君担任评判并上台讲演示范。据悉，来自马六甲、新山、首都、檳城的相声组合表现最出色。

相声实验工作坊

全国相声比赛过后，《光华日报》在北马一连搞了几项推广相声的活动，包括今年6月假檳城中华大会堂举办相声交流会，姚新光、苏达夫、陈志光、陈淑凤，以及出炉不久的冠军组合李振铨、姚智祥均受邀前去表演，北马一带一时风起云涌，掀起了学习和演出相声的热潮。

7月下旬，第6届全国华团文化节于马六甲举行，相声被列为文化表演项目之一。

鼓起热潮，引起社会对相声表演的广泛注意，演讲、示范、比赛，都是发扬光大的有效途径。唯相声艺术的扎根工作到头来仍需实际的学习和训练才可期开花结果，让新的血轮源源不绝。

我在电话中问姚新光有无计划成立“相声实验工作坊”，姚老的答覆显得有些犹豫。我想这不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计划容易，实践困难，相声训练需要场地、人手、经费，尤以经费一项最是举足轻重，而这不是3几个热心人肯去拼就可以解决的。不要忘了国内所有的相声艺员都是业馀的。

姚新光8月前去沙巴，他大概是下定了决心要把相声的火种传播开去，“先引起大家的注意再说！”他的话不无道理。

30.8.1989

近打购物中心的文化景观

购物中心的商品组合，一方面反映人们的消费习尚与偏嗜，另一方面也带引人们认同某些新的生活型态。因此，购物中心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主导性的文化角色。

162 在一个饭局上，我恰与乔治市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陈孟苏局绅并肩而坐。陈先生谈了许多关于百货公司的企管经理与心得，使我如沐春风，获益匪浅。

陈孟苏局绅的眼光

当年Super Kinta初创，商界人士多不怎样看好。因为地点设在怡保大巴刹楼上，楼下有卖鸡鸭的，有卖鱼虾的，有卖蔬菜的，空气中混杂了各种异味，顾客又怎会有兴趣去那样的地方？但陈孟苏有信心，近打购物中心地点适中，属于一级旺区，顾客来源没有问题。至于大巴刹的负性氛围，只要公司内部装潢美观、货物齐备、价钱合理、服务周到，能予人宾至如归的舒适感，便不致形成大碍。

事实证明了对陈先生的看法是对的，至少到今天为止，是正确的。1983年近打购物中心启业，1984年的营业额约5,000万元，1986年增至6,500万，去年增长至7,000万元。“近打”在奠定了业务基础后，近年又引进了日资与日本技术，进一步扩充；第一著棋便是耗资近500万元大事装修，把整间百货公司布置、设计得更高贵、华丽。

犹似置身美术馆

我特别欣赏那些圆形、方形组合而成的木架使购物中心的内部景观具

备了造型艺术的趣味，使购物者几疑置身于画廊或美术馆，一些立体造型的艺术感可能源自“至简主义”(Minimalism)或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美学观念。我尤其喜欢入口询问处那个甚有气派的空间，两边的侧廊配合地面两条半圆弧线所造成的错觉，使人联想到“一双张开了的、欢迎你到来的热情胳臂”。

化妆品部门，时装部(女性)的布置与设计，我觉得最具美感。服装模特儿的陈列，位置和角度都取得好，颇方便顾客边行边浏览。底层主要甬道的加宽，也使“近打”的吞吐量增大，化解/减轻了季节性大倾销期间人们摩顶接踵的挤迫感。

书籍部：聊备一格

当然，可改善的地方仍不少。男装衣饰部不同品牌的摊格一字排开，整齐是够整齐，就是缺乏些变化。布正部对面，发型屋侧边那3间试衣室狭窄如囚笼，试穿衣裤，腾挪之际手脚每每碰及板壁，令人十分不自在。试衣室内的水银灯光黯淡无力，顾客即使穿上锦衣华服亦难显出什么神采。玩具部的圆形木架设计新颖兼且能衬出“儿童乐园”的意趣，相形之下，文具部与书籍部传统式的货架摆设，便显得单调和缺乏创意。铁架间的阡陌型过道，由于十分狭窄，容易酿致身体碰撞，尤其令人不快。坦白说，文具/书籍部给我的印象非常之坏。当我发现近打购物中心装修之后，连我一向用惯了的25x20格的精品“中文稿纸”也找不到，我不禁为文具/书籍部在百样杂陈里聊备一格的“命运”而兴叹。

书籍的种类与“内容”亦十分偏狭，大多是些关于命理风水，食谱中药的书。小说有两大类，一为岑凯伦的言情小说，一为倪匡(卫斯理)的科幻小说。不仅文学书籍付诸阙如，其他知识性的书亦寥寥可数。台湾的著名出版社如远流、洪范、尔雅、九歌的书在这儿绝迹。几部香港博益印行的书，清一色鬼怪小说，反映了采购者品味的卑劣。博益出版的袋装书(台湾称为“掌中书”)内容极多样化，不仅提供各类知识资讯，而且题材以反映

都市生活与文化为主，应该会受到一般大众的欢迎，实无必要以古灵精怪为号召以广招徕。

城市人的阅读趣味

怡保有不少爱书人，这些爱书人对市内的文具店以及那些只卖考试参考书的书局普遍感到失望。他们通常得等候一年数趟的书展场合，才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书。近打购物中心的书籍如果给予扩充，在内容趣味方面照顾到城市人所关心的课题，包括企业管理、社会心理、上班族文化，大众行为研究，只要书价合理，销量必然可观。超级市场/购物中心售卖畅销书乃全球性现象，不过文学著述亦不一定就是“营业毒药”，怡市多间独中、国中的华文学会成员都是可能的文学读者与消费者。

形式与内容并重的改善

或许我们应该认清一个事实。购物中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组合，一方面反映人们的消费习尚与偏嗜，另一方面也带引人们“认同”某些新的生活型态（举一个例子来说，时装与化妆品的被凸出意味著人们愈来愈重视服饰与外型）。就这个层次而言，购物中心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主导的文化角色。如果上列题材的书籍可以销行，那也征示著怡保市民一般上对知识资讯感到兴趣，渴望发掘自己的潜能，热心于生活品质的改进。

陈孟苏先生似乎也对书籍部的现状不甚惬意，他告诉我他有计划把该部门的气氛幽雅化，并置放椅子或小型沙发，让消费者可以坐下来从容阅览自己喜爱的书刊。我希望他的构想快快落实，造福乡梓（应该说是“造福锡都”），我也希望书籍部的改善是“形式”与“内容”并重，不仅在装潢、布置、设计方面让我们感觉到那是个恬适的书坊，也应该在书籍的素质方面证明那是个思想和观念的供应站。如果受到邀请，笔者将乐意担任Super Kinta书籍采购部的义务咨询顾问。

13.9.1989

一个文化人的两件心事

把某个社区重建为古迹保护区，这对国民有特殊的教育意义。

我们的读者对反映现代生活脉动的各类资讯，兴趣较浓。国内中文出版业要谋突破，不妨在这方面著手。

心事一：把茨厂街一带发展成历史保护区

我于城市策划的知识可谓极其贫乏，又不懂如何才能找到这方面的资讯/理论，十分困恼。

个人对吉隆坡茨厂街、陈氏书院附近区域有一份偏爱，总觉得可以通过城市规划与重塑，把这个脏乱、破败的老旧街市发展成为一个既具历史特色又有经济潜能的古迹保护区。

马六甲三保山的维护与美化工程，已让我们看到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三保山一方面是国民共有记忆的见证；另一方面历史古迹的保存吸引了国内外可观的游客前来观览，也为古城带来不少经济实惠。

我觉得茨厂街、陈氏书院这特殊区域，如果能予重修、美化并增置观光设施，它同样能像三保山那样，成为一个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中心兼旅游胜地。

把某个社区重建为古迹保护区，这对国民有不寻常的教育意义。首先拟议中的工程势必成为社区甚至社区以外的热门话题，从而引发大家对文物保存此种举措的意义进行思考/探讨，这肯定会强化人们的历史感与文化遗产意识。纵使社区重修和发展计划，限于政府条文，只能臻至局部的成功，但这件事的争取与奋斗过程所唤起的“历史自觉”，影响将十分深巨，对文化重建工作所造成的冲击将是正面的，建设性的。

我这一厢情愿、缺乏学理基础的愿望不知道可行性如何，真希望熟谙

城市设计与规划的吴木炎先生有以教我，解我疑惑。

心事二：搞好国内的中文出版业

当前国内的中文书籍出版业，萎靡不振。除了吉隆坡十方出版社较有计划外，其他出版单位一年里头难得印行一两本书。出版社打游击式的出书情况，自然谈不上什么长期性的目标和销售策略的厘定。

就笔者所观察到的，国内的知识消费市场，并不如大家想像的那么差劲。台湾的远流，洪范，希代，香港的博益，明窗，华汉都颇受欢迎。笔者最近去茨厂街的大众书局，选购有关广告、公关、创业这类题材的书，发觉黄沾、林燕妮、纪文凤、文绮贞、林俊明、龙飞立等人的书才运到数天，便被采购一空，而据我打听到的消息，购买这类书籍的多是30岁前后的年轻人。还有与城市文化、自我提升、企管知识有关的书籍亦颇畅销，可见书籍的是否能销要看题材，国内读者对那些能够准确反映现代社会脉动的各类资讯一般上兴趣较浓。

国内能写好文章的人不少，各行各业的知识资料，我相信都有人能整理出来，而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港台经验毕竟反映的是异国情况，以我国政经文教为背景写成的著述，相信对国内读者更有用，也更亲切。

本地印行的书籍，售价通常比港台的廉宜（约便宜三份之一），在竞争方面，占了一些优势。当然在书的设计，纸张甚至字体方面，本地书籍的确较为逊色。不过这只是书的包装问题，有意搞这行业的商界人士不难在包装及美工设计方面锐意改善，以国内目前的出版技术，亦不难做到。问题乃在商界对中文出版业的“信心危机”，个人以为只要发掘到适当的人撰写当前读书界有兴趣研究的课题，销路的前景应该是乐观的。即便是广告公关这部门，也没有必要非黄沾、纪文凤、文绮贞、詹宏志不可，国内的广告人/文案好手如罗百里、游川、谭亚木等人的经验和知识，如果能撰写成书，同样会受到欢迎。

文学书籍，销路比较难料，我想好的小说和散文是卖得出去的。

国内的文化人，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当前的中文出版业瓶颈？文人与商贾能否合作？我们的中文出版业，目前正处于严重贫血状态，不仅需资金作为血轮，也需要理想/观念作为营养，让它健康茁壮。

18.9.1989

“核心文学细胞”

——谈国内的文学结社与同仁杂志

不要小看《椰子屋》、《青梳小站》系列这些季刊式的文丛，一个区域的文学状况有没有活力，是蓬勃还是萎弱，除了报章的文学园地，另一个可靠的指标便是同仁杂志的量和质。

168

从“核心教育细胞”谈起

“……即使在世界最著名的学府里，如果仔细观察真正的‘核心教育细胞’，也是只有十余人，最多不过数十人的师生小团体。……‘核心教育细胞’通常包括一位教授（导师），他的研究助手（包括副教授、助理教授、研究员）以及直接或间接由他指导的学生。‘核心教育细胞’有时是有形的组织，例如这位教授所主持的实验室或研究中心；有时是无形的组织，通常是环绕著这位教授所自然形成的小团体。教授是小团体的‘核心’。‘核心教育细胞’的教育功能，通常是通过讨论会（Seminar）的方式发挥。真正重要的知识传授，往往并不在课堂，而是经由这种小规模讨论会进行。”

“孔子和他的门生，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都是‘核心教育细胞’的范本。其实学校大小并不太重要，有多少平方公尺并不太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有了一套办法，培养出活泼的‘核心教育细胞’。”

“‘核心教育细胞’是‘细胞’，因为它能生长，培养出新的人才，再构成新的‘细胞’，这样一代代繁殖下去。”

上述3段引文摘自张系国的一篇题为《私人兴学》的文章，“核心教育细胞”是他创造的词语，用来说明大学里头的同侪团体所发挥的教育功能。我觉得张系国这项观察，也适宜用在文学结社与同仁杂志这些活动、组织上，只要我们在称谓上改为“核心文学细胞”即可。

重视创作成果

台湾的创世纪诗社，香港的诗风社，新加坡的五月诗社，国内的天狼星诗社、星座诗社、天蝎座文友会、文风社、马大文友会、金石诗社，都可以说是一个个“核心文学细胞”。它们“分裂”、“繁殖”，培养新血，感染他人，让“种籽”——文学的种籽——一代一代传下去。

这些团体与会馆式的文艺组织不同，在于它们甚少发文告，从不召开什么记者招待会，不愿把时间浪费在开会，更不肯为那些繁文褥节、大而无当的议案伤神。这些同侪团体重视的是创作成果。成员们见面每以“我最近写了1篇令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的小说，你要不要看看？”鄙人的近作5首昨天见报啦，你们读了没有？有什么批评，快快说。”作开场白，大家的神色流露出来的是一份创作的骄傲和喜悦。

有时大家也会交换“情报”：像“冯青的诗集《天河的水声》，好极了！不买回来看简直愧为天狼星诗社第6代弟子。”有时又会为一些课题而议论不休：“张曼娟的《海水正蓝》的吸引力在那里？何以一卖就是60、70版那么疯狂？这现象说明了什么？是大家看腻了琼瑶、玄小佛、亦舒吗？两性关系、婚外情、代间纠葛一类题材是不是今日高中生、大学生以及年轻上班族普遍感到兴趣的课题？马华小说家如果有人写类似的书，反应会怎样？……”当然像近期《蕉风月刊》特辟篇幅，邀请多位名家评论某篇小说，这“不寻常的编排”也会引起同侪团体的注意和谈论。

“核心文学细胞”的知识传授，确是通过各种小规模讨论会进行的。有些讨论会甚至不具规模、不拘形式，席地而坐促膝畅谈固然可以讨论，三杯两盏淡酒（通常是啤酒）、一小叠花生，同样可以“传道授业”抑且“耳提面授”。

169

《椰子屋》与《青梳小站》

同仁杂志的功能与同侪团体亦近似，不同点在于同仁杂志得每隔一个

时期出版一本杂志或刊物。5年前开始面世的《椰子屋》系列，去年才出炉的《青梳小站》系列，还有今年出了创刊号的《金石诗刊》都是此类同仁杂志。杂志虽然也发表外稿，但主要稿源得靠志同道合的十个八个老友提供。通常编辑人也是撰稿人，每有专题报导，编辑必需亲力亲为，从“找料”到“煮炒”一脚踢，既吃力又好玩。编这类刊物，物质报酬几等于零（通常都没有稿费），精神的鼓舞力量却非同小可。好些作家（包括港台新马）便是从同仁杂志的实际编务与撰稿工作磨练出一副好身手与那股对文学的执著坚持的。

《椰子屋》近期的编辑阵容是庄若、加爱、比尔；《青梳小站》的班底是陈全兴、陈雨颜、陈佑然、李恒义、董志健、欧宗敏。他们都是写作甚勤的“六字辈”（即诞生于60年代）的文坛新血。他们当下的文学表现仍以诗艺最出色，能诗能文的好手也不少。

不要小看这些一年只出几册，季刊式的系列文丛，一个区域的文学有没有活力，是蓬勃还是萎弱，除了报章的文学园地，另一个可靠的指标便是同仁杂志有多少份，内容表现又怎样。《椰子屋》与《青梳小站》系列也发表“七字辈”的文坛新鲜人的作品，提供甚佳的创作训练。最近《青梳小站》还打进了国内许多中学的图书馆，与一些华文学会取得联系，这种类似细胞分裂的文学繁殖，尤其可喜。

29.9.1989

演讲活动的省思

谁来演讲，听众的素质，讲与听之间可能产生什么程度的交应关系，主办当局应该考虑周详。

名专栏作家亮轩先生，2年前写了一篇题为〈说清楚与听清楚〉的文章，发表在《自由青年》，提到“时间也是一种资源”不可浪费，应该“以正确的认识来处理演讲活动，做一个称职的演说人或听众，则可以把时间资源发挥出高效率。”他的话很有意思，或许我可就国内当前状况略作补充。

胜算甚高的活动

70年代下半叶以降，国内演讲之风渐渐盛行。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一、1978年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在首都联邦酒店举办为期两天的文学研讨会，听众反应良好，使后继者对主办研讨会、讲座一类活动的成功率有了信心。二、社会繁荣，民生富足，人们解决了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需求外，很自然会渴求精神的某种充实，他们乐意从其他管道／方式多汲取一些知识与资讯。以上两点，可以视为社会内部机能的促成因素。

对于个别社团来说，主办单位在众多文娱活动中较垂青于演讲一项，理由是一、演讲活动不难举办，只要受邀的演讲人点头，便可进行。二、开销不大，主办当局通常只需付给演讲者起码的车马费，提供住宿膳食，就连演讲津贴也可省下。这么廉宜的人力，不好好利用，岂非暴殄天物？三、只要演讲人名字够响亮，不愁没有听众，许多人都有强烈的好奇心，希望能一睹学者／作家／诗人／专业人士的风采为快，因此主办讲座“胜算甚高”。

也因为这样，主办当局通常考虑的是开销、演讲者、场地（最好能免费）、听众来源这4项，对最需要考虑的问题诸如“举办是项演讲的动机是

什么？目标是什么？”、“这个讲座对听众会产生怎样的教育效果？”反易忽略。迈入80年代，各类讲座／研讨会／座谈会举办得相当频密，好些演讲活动便予人“人有我有”、凑热闹的感觉。讲的人漫不经心（手上连讲稿也没有，完全是“空手人白刃”的姿态），听的人亦毫不在意（半数听众都在闭目养神，或乾脆会周公去了）。一些场合的听众来源，还得靠主办当局通过校董的关系，向当地中学借来了3、4班高三学生权充门面，一个研讨会／讲座如果有三份之一甚或半数这类“咖哩菲”性质的演员听众，又怎能期望台上、台下思想沟通、意见交流呢？

凑数的乌合之众

去年一位诗人受邀前去某中学华文学会谈诗，唇焦舌敝，一个钟头下来，轮到学生自由提问，第1个问题竟是“请问甚么是文学？”。另一位作家今年出席某文艺工作营，他负责谈散文，过后他碰到的问题同样绝：“X老师，请问散文和作文有什么不同？”遇到类似这种情形，我们有理由怀疑，在座的听众，可能并非自愿参加者，而是在主办当局的负责人“死拉活扯”下莫名其妙地进了来，又莫名其妙地乱问一通，结果露出马脚。如果时间确如亮轩所言是一种资源，这资源是有限的，讲者、听众都不必要作出这样的浪费。

说起来演讲能力是一种先天的禀赋，有学问才情的人不一定善于登台演说；而能言善道、口若悬河者亦不一定言之有物。许多例证显示，喜欢逞口舌机锋的人，学养往往高不到那里去。能写能说，擅于思考、巧于表达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某些演讲，听来沉闷，内容却甚丰富，需要心智成熟的成人听众才能真个体味，中学生去听可能不甚了了。因此，谁来演讲，听众的素质，讲与听之间将会产生什么程度的交应关系，都是主办当局应该考虑周详的。

人力资源的虚耗

近这两三年来，国内一些演讲场合，偶尔也会邀请作家／学者谈些“自我提升”、“生活修养”、“人生展望”一类的通俗性课题，由于这些课题并非作家／学者的本行，他们的意见只可视为某种参考，不宜奉为权威的定论。作家／学者的经验虽可引为某些论点的佐证，但不一定具备足够的普遍性，可用在他们身上的情况未必适用于其他的人，用亮轩的话：“有没有名声与说得对不对更无必然关系。”听众考虑作家／学者的论见时，应该“就事论事”、保持客观，实不必慑于演讲人的声威。

最后一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演讲会的成功举办与否，不宜以听众人数的多寡作断。学者演讲（譬如杨振宁教授），到场恭聆者可能只有寥寥几十名学术界人士，听众本身也是知识精英。而学者可能选择这么一个“人数在精不在多”的场合，逐字宣读他的研究心得。对一般人来说，这演讲当然是枯燥无比，对内行人而言，却可能是难得一遇的“资讯盛宴”。相反的，某些演讲场合，台下听众上千，却泰半是硬拉来凑数的乌合之众，讲者口若悬河，可惜大多言不及义，听众只有在听到笑话时才偶而爆开一阵哄笑，其他时候都在假寐状态，虚耗人力资源，莫甚于此。

3.10.1989

劳资利益的均衡

购物中心里头的好些产品促销员，在减价倾销期间(可长达10天)以及周六、星期天，工作12小时，站得脚都肿了，小腿浮起红点，却拿不到半分钱的超时加班费，公司每天补回2元的吃饭津贴。劳工部知道这种剥削的存在吗？

一个社会要安定，仅凭“富足”恐怕还是不够的。如果贫富悬殊，或者富足的只占总人口的10%，而在贫穷线上挣扎的人们却占了六、七十巴仙，这社会迟早会出岔子。任何严刑峻法也防范不了。理由很简单，贫穷者本就一无所有，“横竖都死，不如搏一搏”。这种“搏一搏”的心态也不知酿致多少讹骗、偷盗、枪劫事件，可以说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贫富悬殊：社会病态

因此，我觉得一个社会要安宁，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损有余以奉不足”，让其他社会阶层也能分享富裕丰足的成果。任何一个有点良知的人，都不可能忍受杜甫诗中所描绘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这不是什么高调，而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

我们的社会充满了这种“有余”与“不足”的经济所得不均的现象：这边是歌台舞榭，那边是穷乡僻壤；有钱人请一桌人吃饭的消费，往往够一个5口之家1个月的生活开销；在大洋房后面，每天女佣都得倒掉许多吃剩的菜肴，在垃圾堆旁边，每天都有流浪汉在捡破烂。这种社会现象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其同为社会病态则一。

最低薪酬的制定

要扼制经济利益分配严重不均，改善中下层人民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可从几方面着手。目前政府施行的征收所得税的累进方式，是缩短贫富鸿沟的途径之一。另者，劳工部应制定最低薪酬标准，并立法严禁雇主支付低于此标准之薪酬。我知道有些政党支部，雇用女书记，工作时间朝九晚五，月薪只付马币100元，这么菲薄的薪金，也亏“为民服务”的政党付得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童工受剥削的现象，不少童工年龄不过11、12岁便得到咖啡店里捧茶扫地，在街边食物摊洗碗碟，在竹厂里织箩筐，每天雇主只付回2元到5元的日薪，这种非人待遇，有关当局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禁止之，违法之雇主亦应绳之以法。

超时工作：加班费

我私下调查过吉隆坡的好几家购物中心，发现里头一些公司的产品促销员，每天的工作时间通常达9小时。在大促销/大减价期间(为期3、2天者有之，季节性的倾销可长达10天)，以及周末礼拜，工作时间自早上10时到晚上10时。员工们忙碌了12个小时，站到脚也酸了，肿了(连鞋也穿不进去)，甚至小腿上浮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点，却拿不到半分钱的超时加班费。一些公司只补回2元作为吃饭津贴，剥削员工、罔顾员工们的福利到这么残酷的地步，不知道劳工部知道这回事吗？

员工也是人，公司赚钱是员工落力工作、推销、把产品卖出去，公司才受惠的。资方不能只顾自己，而忽视了员工的福利和权益。卖出去的100元产品，促销员抽回3%/4%的佣金，那是劳资双方的契约，并不是什么“恩赐”，超过规定小时的额外工作量，算回加班费，是天公地道的。

组织工会：集体谈判

其实在购物中心工作的好些产品（从洗发精到化妆品）促销员，他们都深刻感受到被剥削这事实。问题是他们犹似一群游兵散勇，没有工会为他们争取权益。而销售员一类的工作流动性很大，员工们似不曾认真考虑过组织职工会以形成集体谈判力量的需切性。为了照顾劳资双方利益的均衡发展，劳工部应考虑设一小组协助劳方组织工会，消除剥削，改善员工的待遇与工作条件。

甚至时至今日，仍有某些商行／工厂走法律的漏洞，不替员工缴交公积金；一些园丘工友形同奴隶，整天劳作，没有休闲康乐活动，而所谓医药照顾只有黄药水、胶布和Penadol。反观资方大员，穿金戴银，出入马赛地，生活得如同王侯一般，这现象不仅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也是落伍的象征。一个贤明的政府没理由坐视不理。查清楚各行各业的收入状况，制订方案，使社会朝向均富的方向改革，此其时也。

10.10.1989

“情势律”与“突破策略”

突破策略往往是一个危机方案，它减少官样文章（像开会、填表），而通过更有效的途径（像打电话分配工作），采取行动，著手整顿与改革。

全国大选的竞选将近，各政党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应战，这趟大选的胜败，一方面要看过去数年来各党的政治表现，个别国州议员的服务绩效（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各党对于当前与未来数个月的“情势律”的了解／把握，以及“突破策略”的规划／运用。

所有政党，不管在朝还是在野，都必须面对下面这3个问题：

- 我党究竟在过去与现在扮演什么角色？
- 我党将来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 我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才是最有利可行的？

双重标准，多面手法

“情势律”（The Law of the Situation）一词非我所杜撰，首创人是玛丽·弗勒（Mary P. Follet），她是美国第一位企业体的咨询顾问，在她担任一家窗帘公司的顾问期间，她成功地说服了公司的总裁，使他了解公司从事的并非窗帘业而是“光线控制业”。这个新的经营概念的自觉使该公司的业务迅速发展，并走向多元化。“情势律”的认识使当事人作出这样的自我质询：“我正在做著的是什么行业？我扮演著什么角色？这行业有前途吗？我能否有效地扮演这角色，并且带来成果？”

政党扮演的角色极为多元，政经文教各范畴，它们都得插上一手。也由于政党角色之多元，政党本身往往沦为 at your service 的服务机构，自己反而缺少了一套政治原则作为最基本也是最强而有力的导向。国内好些政党

或玩弄双重标准，或耍弄多面手法，政客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种缺乏政治原则的伎俩，或可欺骗所有人于一时，或长时间哄骗住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蒙蔽所有的人。

政治原则对政党的重要性犹似策略目标之于企业体。美国航空太空总署(NASA)的策略目标是“在10年内把人送上去月球”，这个强而有力、明确具体的策略导向，使组织里头上下下的人都朝著这目标努力。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做著甚么。只有具体明确的策略目标可以动员组织的所有力量，这事实或可供国内以华人为基础的各政党参考。

如果NASA定下的是“在太空竞争领域居于首要地位”或“通过太空拓展造福人类”一类大而无当的目标，组织成员将因为目标的1.有欠明确、2.难以衡量、3.遥不可及而松弛、懒散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国内政党在这个阶段标榜“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不易赢取选民的原因。目标太远，会使组织及党的支持者难以适从，改进计划难以厘定；纵使改进计划厘定了，改进的程度也难以追踪衡量。

一连串的自我质询

政党要在这阶段筹思“突破策略”(Break-through Strategy，这个词乃管理学者 Robert Schaffer 所创)，它们一定会这样自我质询：

●当前的政治气候是怎样的？政经文教现状如何？人民最关注的是些什么课题？我党的处境如何？以我党的能力在这阶段要运用什么策略才能发挥最佳的政治宣传效果与实际功能？

●我党现有的人力／资源如何？怎样利用这些原有条件，增强党的效率／冲力，以配合“突破策略”的运用？

●我党内部组织那些环节较弱？怎样改善？应该加强那些环节（各局／小组／委员会）使“突破策略”得以充份发挥？

●如何把“突破策略”分割成不同的次目标和短期性目标，使突破策略的进度，可从次目标的臻至／完成及短期性成果的获取加以客观衡度？

使命感与责任感

笔者之所以撷用 Schaffer 的“突破策略”来谈政党于新策略的制定，因为政党其实也是一个企业体，它与其他企业体一样需要党员／员工的全力以赴，追求绩效。成功的“突破策略”会使所有参与其事的人对工作计划产生使命感，以及对计划成败得失产生责任感。而且突破策略往往是一个“危机方案”(A Crisis Formula)，它肯定会减少党或企业内部的种种官样文章（像浪费时间在开会，据我所知马华高层有时一天得赶赴3、4场会议），而通过更有效的途径（像打电话）分配工作，立即著手整顿和改革。与其把时间虚掷在夸夸其言的会议上，不如马上采取行动。只有行动可以带来成果。

笔者无意否定长期性目标的重要性，本文前面提到党的政治原则即是长期目标的另一称谓。不过我们也应了解，没有短期的次目标与成果，奢言“人类和平，全民团结”之类的理想是空洞和不切实际的。

9.11.1989

“后现代主义”的工业美学

消费者的美学感受已从“巨型的向往”转移到“精致的崇尚”。如果说“大即是美”是现代主义的某种倾向，那么“轻薄短小”便是普遍受到认同的“后现代主义”工业美学观。

拙文〈近打购物中心的文化景观〉发表之后，收到了10多封来信，其中有6封对笔者于该文提到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一词甚感兴趣，希望我多写篇文章进一步谈论。笔者于这方面的认识尚浅，只能避重就轻谈当前的工业社会在迈入“后现代”阶段的一些征兆与变化，供有心人参照／思考。

美国的工业社会大概是在迈入80年代才进入所谓后现代阶段的。未来学家奈思比(John Naisbitt)在《大趋势》一书以“资讯社会”这词，点出未来社会的变动焦点在于资讯传递方式的改进与电脑科技的发展。另一位著名的社会观察家杜佛勒(Alvin Toffler)认为未来的文明将从农业时代、工业革命演化到“第三波的社会”。

历史发展的辩证者

杜佛勒的过人处在于他能看出历史发展的辩证性。他在早期出版的一部著作《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指出“一用即弃文化”(Throw-away Culture)将成为消费时代的主要特征。他用“一时性”(Transience)一词来说明物质／产品用后即弃的现象。但在较近期的著作《第三波》里他却以辩证的方式指出人们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消耗挥霍之后，渐渐了解到资源的有限性，在石油危机发生之后全世界的人都有这种普遍的警觉，人们开始反省自己的消费习惯与态度，并且从过去的那种一用即弃的习尚转向购置一些好用而又耐用的东西。如果70年代的一用即弃文化是“现代主义”，那么80年代的选购好用

耐用产品的“反动行为”，便是“后现代主义”的表现。

以上所述也许较为抽象，让我们举些较具体的例子，60年代以迄70年代早期，几乎所有工业国(尤其是欧美诸先进国家)咸认为“大即是美”。车子要大型才是高贵的，傢俬、冰箱、电视都走向大型化(读者相信还记得，国内好些家庭过去也曾一度以能拥有一台26寸的大型电视为荣)，因为“大型化”几与“高级化”同义。70年代中叶，美国汽车公司曾对未来的汽车市场作了一项调查，当时大家都知道石油涨价这事实，而到1980年每加仑汽油预测会涨到美金1元40分左右，但市场调查的结论竟是：

“即使汽油每加仑涨到美金1元40分，大型车耗费更大，但美国人喜好大型车的趋向保持不变。”

消费趋向预测错误

这个要命的结论使美国汽车在大型车的范畴内原地踏步，没有把力量投注到小型车的开发。这一著失误后果严重，美国汽车在进入1980年那年开始便为“轻、薄、短、小”的日本汽车迎头赶上，耗油的美国大房车的销售量在全世界各地直线下跌，连美国本土的汽车市场也为日本小型车大幅蚕食掉。日本各类小型车之所以受到欢迎，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省油(省钱)，另一个原因是汽车消费者对车的美学感受已从“巨型的向往”转移到“精致的崇尚”。如果说“大即是美”是现代主义的某种倾向，那么“轻薄短小”便是普遍受到认可的“后现代主义”工业美学观。

工业美学的转向亦见诸于都市建筑外型／外观的变更。60、70年代世界各大都会的高楼大厦都是一栋栋密封的玻璃立体物，玻璃窗后面悬著厚厚的帷幕。这些外壁用玻璃窗砌成的大厦，由于玻璃隔热／隔冷的效果都差，因此热天必须开动冷气，冷天又必须开启暖气以调节室内的气温，因此耗费能源极巨。80年代以降(1980年对欧美工业先进国而言，是一个“现代”与“后现代”的重要分水岭)，资源有限感使人们重新考虑城市大厦节省能源，减少开销的需切性。

玻璃帷幕大厦在整容

在美国，一些建筑物的外壁已开始镶砌上大理石、砖块和混凝土；日本的许多新建塔楼也镶贴上磁砖、石装饰和小型窗口，这些“后现代”式的高楼大厦的隔热/隔冷效果都胜于玻璃大厦，换言之，它们都较节省能源。

在台北，许多栋大型建筑正在进行“后现代”式的“改头换面”，这现象也许值得国内从事于城市策划与建筑设计的人士留意。著名的龙普大饭店于1988年5月卸下了它的咖啡色玻璃帷幕而代之以颇为传统的灰白相间的大理石外观设计。希尔顿大酒店于1989年3月装修完成，拆下的安全护帐后面，密封的落地厚墙不见了，新的外型设计是一幅木棧格子窗，使室内、室外的“沟通”变得可能。这种建筑美容所形成的新的都市景观都是迈向“后现代”的征兆，反映出工业社会的美学感受正在迅速蜕变中。

本文无意为“后现代”下什么定论，因为“后现代”的意涵十分庞杂、多元，和充满了不可测知的变数。我们甚至无法测定“后现代”会向那个方向走，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它与追求大型、消耗大量资源、崇尚高速和机能化的现代主义将背道而驰。“后现代主义”甚至带点复古/怀旧的倾向或意味，但它也不是“古典主义”，原因是“古典主义”根本容纳不下“后现代”庞杂多变及资讯密集这些特色。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工业美学，囿于笔者学力之不足，所论仅及皮毛，但愿高明之士能不吝给予匡正、补充。

18.12.1989

华文出版业景观

关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及谋生之道一类的知识性书籍，在国内颇为阅读人口受落。为甚么我们不多撰述出版这方面的书？

90年代伊始，马来西亚的经济前景乐观。世界经济重心，如果真的如许多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逐渐转移至亚太地区，那么马来西亚将必然是其中一个受惠国。可以预期的是，大马社会将会成为一个愈来愈蓬勃的大众消费社会，企业化经营逐步代替家庭式小生意。处在这个大幅度社会蜕变关头的马华出版业，它的前景又会是怎样的呢？

大众消费社会讲求货品包装，讲究市场策略，这已不是60年代“有货就能卖出去”的年代，市面充斥货物，消费人有太多的选择。就以书籍一项来说，本地书刊将面对港台各类书籍的严峻挑战。如果我们的作品内容比不上别人，包装又不够吸引力，行销方面打的又是散兵游勇式的“游击战”（这家书局摆放10本8本，那个小镇托朋友代售3、5、7本），马华各类作品与港台同类作品较量，肯定屈居下风。而这种颓势，除非有识之士、有志之士力挽狂澜，否则情况绝不会奇迹似的“自动好转”。

“十方”与“紫藤”

国内有潜能的出版单位，就笔者观察到的是，一为十方出版社，一为紫藤（马）有限公司。“十方”出了不少书，近期似乎侧重于佛教文化/佛学的阐扬，设计包装虽稍逊于港台书籍，但内容颇扎实，书价亦较港台书籍廉宜，在坊间具一定的竞争力。而且十方出版社与白屋书坊是姐妹店，“十方”出版印行的书，白屋书坊是当然的分销重点。我觉得“十方”如果加强它的组织及行销网，它的潜力实不容忽视。

紫藤出版的书，封面、插画、内页设计、包装都极其讲究。据我所

知，紫藤有它自己的创意小组，张凤鸣、傅兴汉、陈婵菁是这个创意小组的成员，也因此紫藤出版的书在外观方面一般上较国内出版社印行的书出色。紫藤出的书设计古色古香，以雅淡悦目取胜。在企业形象(Corporate Identity)方面，紫藤成功地凸出了它的民族本位与文化寻根的取向。至于这企业形象能不能为大众消费社会广泛受落，则尚待时日考验。

知识人口的需求

大众消费的运作在“求”与“供”。国内的华文出版业固不必囿限于文学/文艺作品这范畴。国内的华文出版社，多由3几名写作者凑合组成，出的是自己的书，3几本诗/散文/小说印行之后，出版社便陷入冬眠状态，这种“短线经营”肯定搞不出甚么名堂。我想国内华文读者群对政经文教关心应该甚于对文学/文艺的兴趣吧，出版社作为一个牟利的营业单位，必须考虑市场的需求，甚至主动发掘市场潜在的需求。目前坊间还可看到一些马华文艺作品，至于国内出版的知识性、社会性的书籍反而鲜见，这毋宁是十分不健全的现象。大马有500万华人，我们的知识人口没有理由会少过文学人口的。

访谈录代替撰述

笔者最近在隆市作过一项调查，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大众心理丛刊”、“社会趋势丛书”以及香港博益出版的“关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谋生之道”的书（从广告人、时装趋向、富豪发迹史到优皮的品味偏嗜的报导）都相当畅销。我相信国内也有不少人，在他们各自的行业领域内表现卓越者，为甚么国内的华文出版界不尝试出版这些人的“心得”或“经验”呢？如果当事人没有能力撰述，则可由访员/编者以对话方式整理成篇，台湾的殷允芃、林清玄、李昂，他们在这方面的成果足资参照。我相信政经文教、各行各业的翘楚他们的奋斗/体验，对读者将会是十分有用的资讯，也因此

我认为这些书会拥有它的读书群，换言之，这些书具备了“能销”的内在条件。

至于书籍能否畅销的外部条件，那包括书籍的整体包装、设计、价目、宣传（怎样引起消费大众的注意）这是出版商的问题，关乎营销策略的运用。书要有内容，这还不够，还得外观悦目，让人爱不释手，“有购买的冲动”。国内一些出版单位，如果仍沿袭50、60年那种“朴实无华”（封面犹似Manila Card似的单色、印上黑色的书名及作者名称），又怎能与设计精美、内容充实的洪范、尔雅、九歌等国外出版社印行的书籍较量？

29.11.1990

我看马大“校园文学”

校园文学的危机有二：一是它的“校园属性”使作品的内容偏窄化，于社会现实著墨较少。一是它的短暂性与过渡性，一些写作好手先后毕业离校，校园文学的表现水平甚难维系不坠。

186

马大毕业生能以中文写诗、散文或小说评论者，人数可观，香火始终不绝如缕。远的不说，从鲁铤、温祥英、晴川以降，我们有郑可达、小黑、潜默、方昂、谢川成、叶宁、许友彬以及崛起于80年代下半季在文学方面表现不俗的林添拱、何国忠、骆耀庭、程可欣、林若隐、孙彦庄、陈全兴、潘碧华、禩素莱、庄松华、张光达、郑采雯、郭莲花、林云龙、张嫦好、叶秋云、张秀兰、陈湘琳、徐一翔、莫顺宗、锺石均、林幸谦、张玉怀、杨锦龙、朱旭龙等诸家，名单既长，健笔众多，令人瞩目。

多人获大专文学奖

以“健笔”称彼等，初非朋友之间的捧场语。上述文坛新鲜人当中，有十多位曾先后夺大专文学奖，他们或扬威于散文领域，或啸傲于诗歌王国，或以故事情节出奇制胜居小说部门之榜首。尤有甚者，其中能诗能文，既写散文又攻小说，而同时获得两三个大奖的“高手”亦所在多有，林添拱、孙彦庄、潘碧华、林若隐、庄松华、陈全兴、禩素莱可为例证。我以为大专文学奖的设立，除了发掘写作人才外还有某种文学认可的意义，对年轻作家地位的肯定／奠立作用颇大，至于文学奖的颁发对国内各大专院校的校园文学的提倡、推广的推波逐澜，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这群文坛新血与当年温祥英、郑可达这些前行代以及方昂、小黑、叶宁这些少壮派，情况相当不同。过去这些“前辈”在大学阶段的写作纯属个人志趣或嗜好，并无结社或搞起一种风气的企图，作风接近独行侠。而何国

忠、林添拱、潘碧华等辈，擅于组织，人缘又好，便能化整为零，把众多的游离份子(Vagabonds)组成一支劲旅，形成自己的阵势。马大文友会的成立，“文学双周”的举办，以及稍后文采、泽吟出版社的先后成立，见证了马大这群文学青年整体力量一旦汇聚，能做的事实不少。

马大文友会的成立

我认为马大校园文学的滥觞，大约始于1984年年杪马大文友会的成立。文友会是一个非正式团体，是典型的文人结社。先提出文友会这概念的大概是骆耀庭，这宝贵的资料是林添拱电话里向我提供的。后来的演变是骆耀庭并没有当上甚么龙头老大，反而由林添拱、陈全兴、程可欣、林若隐、庄松华以及骆耀庭本人轮流担任个别聚会的召集人。在“齐齐夹band”搞文学方面，上述诸子的贡献是难分轩轾的。文友会经常举办不定期的文学聚会，很多点子／意念便是在众人笑谈喝饮包庄水的情况下产生的。文友会后来还出了一部合集《舒卷有馀情》，纪念了这群年青学子的这段文学因缘。

187

文学双周与泽吟出版社

“文学双周”的举办始于1985年，那时马大华文学会尚未获批准成立，文学双周只能算是中文系的学术活动，策划人是中文系的林添拱、程可欣，工程系的骆耀庭，理科教育系的林若隐，医学系的陈全兴。文学双周的成功举办，使后之继者有勇气踵事增华。而文学双周的节目也一届比一届多元化，不过每届都有主办文学讲座，邀请国内资深作家前去演讲。文学双周也办过诗、散文的创作比赛，学生的反应热烈。迄今文学双周已办了6届，不仅成了马大中文系常年活动的重头戏，而且俨然成为中文系的可贵传统的一部份。

文学双周在校园内既造成有利的文学气候，由林添拱以文采出版社为名推出的陈全兴著《医学生手记》以及程可欣著《马大湖边的日子》销路便顺利打开，可欣的散文集卖了4版，收了个满堂红。1987年何国忠、许玉华

组泽吟出版社，第1本出的是《马大散文集》，第一版很快就卖完，泽吟出师有利，于是乘胜追击，迄今出书7册，平均每年大约出书两本，以国内文学类书籍的出版量来看，泽吟的成绩已算不错的了。泽吟的执行编辑是潘碧华，是个策划能手，听说她最近编纂著李国七的首部诗集，相信不久即可面世。

马大校园文学从文友会到泽吟的成立，规模已具。问题在于校园文学的会否从盛而衰，渐走下坡？校园文学有它先天的局限性，那是它的“校园属性”。这属性使校园作品的题材有偏窄之嫌（应该说不够广阔），内容往往离不开校园框框的喜怒哀乐、师友因缘再加上一点对生命时间的遐思联想，于社会现实著墨较少。

校园文学的活力与蜕变

校园文学的另一危机是它的短暂性与过渡性。大学3、4年的学习生活一瞬即逝。学生离开校门，校园文学自然便难以为继，马大文友会于1988年的宣告风流云散便是一例。而且某些年马大写作人才恰好八方风雨会中州，校园文学自然大放异彩，接下去数载如果写作人才缺乏，即使文学双周仍每年有人在办，也只是表面热闹而已，难以维持校园文学活力于不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校园文学会作出某种蜕变是自然定律的运作，谁也改变不了。大学生总有一天会离开校门，进入社会，人的心智、年龄也会从成长趋向成熟。从活动面去看，陈全兴离开马大，搞了一份名叫《青梳小站》系列的文学期刊；林添拱的文采出版社替国大、拉曼学院的同学连续出了几部集子，也可以说替其他大专院校的校园文学做了些扎根落实的工作。

从作品内容来看，潘碧华文章有强烈的文化感，孙彦庄则创意十足，何国忠的知识份子情怀，程可欣的婉约善感，林若隐的都市情调与人文关怀，以及褪素莱的人若蒲柳下笔却挟风雷，这些年轻作家都有能量把校园文学提升到更高的艺术层次去。只是这些蜕变恐怕要另一篇专文才能交待清楚了。

19.1.1991

“丸不出盘”：新年的文化效应

宋史专家柯莱基(Edward A.Kracke Jr.)尝谓宋代社会之一特色为“在传统中求变”，也即是“丸不出盘”，虽上下回旋，来回滚荡，其根基恒在圆盘之内。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比喻来描绘华人文化传统的若干流变。

紫藤坊的黄先生来电，邀我参加农历新年期间于天后宫举行的大规模“庙会”，我因工作关系不能参与其盛，不过这触媒却使我联想到华人新年的经济作用与文化效应，以及两者相辅相成的实质意义。

购物中心张灯结彩

1990年的圣诞节才过了两个星期，我便可从吉隆坡的大街小巷感觉到新年即将莅临的讯息，而传达这讯息最有力的媒介／管道是市内大小不一的购物中心。里头新到的年货：蕉柑、腊味、年糕……以及各种应景的布置装饰，都似乎在提醒我，新年将至，购物正适其时。

为了凸出农历新年节日的那份喜气，以及取其吉利，购物中心都张灯结彩，而所有的布饰、灯饰、纸饰皆以红色为主调，并衬以其他光鲜的色彩。一些购物中心还匠心独运，以龙、凤、仙女、弥勒佛等华人传统物事作为焦点装饰。辛未年是羊年，“羊”字又与吉祥的“祥”字同韵，羊头／羊角的变体乃成为了当下流行的主题设计。

Lot 10有丝竹音乐的现场演奏，武吉敏登广场有人当众挥毫写春联，也有人示范中国结这门手艺。篆刻陶艺、古董摆设、灯笼挂饰、冬梅盆栽使许多本来西化色彩十分浓厚的购物中心忽然间增添了几许东方情调与中华色彩。

大传统与小传统

研究社会文化的朋友，也许会觉得这是“华洋混杂”，也是“华人文化鄙俗化”的表征。不过，不要紧，民俗文化是不能免俗的，因为俗世的土壤可让它生根茁壮。人类学有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如哲学思想艺术（像儒道的学说）非所有阶层的人所能享有，只有少数肯读书又勤于思考的精英份子才能参与。小传统则由农村乡下的习尚、信仰行为、手工艺制作、游乐的方式累积而成。值得注意的是，小传统里的书法、篆刻、剪纸、陶塑、茶艺、舞蹈、拳术也有不少重要的观念其实可以贯通到大传统的艺术或学术思想这些层次去，而成为大传统有机组成的一部份血肉。在购物中心，我观察到的是华人民俗文化利用现代化的包装，以另一个面貌去表现自己。这发现（应该说是体悟）使我感到十分愉快。

对市内各购物中心的商家而言，渲染年节的气氛，无非是为了刺激消费人的购兴。过年也好，中秋也好，都是绝佳的促销时机，至于节日的“文化性”他们是甚少考虑的。生意人关心的是“如何利用节日去搞好销路”，文化人却利用节日之便展出自己的作品，传递一些重要的文化讯息／观念。说得严重点，文化艺术工作者是利用商家所提供的方便做些“礼乐教化”的大事。双方各适其所，大家都得其所哉。

庙会：文化大会串

“庙会”比一般购物中心宽敞，有较大的腾挪空间，也较自由，一些活动面较大或性质较不宜购物中心的文化表演包括：高跷行，舞狮、舞龙，卜卦算命，江湖卖艺以致于神说／传说中人物的戏剧性跑场，都可以在庙会里各展身手，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大会串。

庙会当然是一个“年货市”，它渲染了节庆热哄哄的欢乐氛围，一些平时不易看到的事物像面泥人，龙须糖应该会勾起许多人的思古幽情。

有心人置身其间，则可以从庙会各行各业的铺陈展示中，窥见传统与

现代融会绾接的种种可能。是的，民俗传统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必须努力变形／变相始能适应生存：从紫藤坊的推广茶艺，到王品棠学长的孜孜于太极拳理论，再到叶逢仪兄的麻雀画（管见以为叶氏继承了丰子恺简朴纯净的漫画传统），我都看到“丸不出盘”而又求新求变的创造企图。不过，这已经有点话出题外了。

4.2.1991

科威特经验的启示

13世纪，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曾把伊拉克与科威特并在一起，如果伊拉克据此就说科威特是它的领土，这回出兵是收复失地，那么土耳其岂非更有理由说伊拉克是它的属地？

192

伊拉克一夜之间吞并科威特，举世震惊。伊拉克与科威特都是回教国，份属手足，两伊战争，科威特又曾大量经援伊拉克，何以沙胆胡申竟那么绝，硬把自己的兄弟吞下？理由无他，科威特实在太富庶了！

伊拉克与伊朗打了8年战，穷兵黩武的结果是债台高筑，民不聊生。而它的敌人伊朗，经过战争的巨创后，却力谋社会重建，科梅尼长老逝世正适其时，使伊朗的务实派力量有机会抬头，也使社经重建的整顿工作很快步上轨道。

伊拉克则不然。沙胆胡申面对战后的满目疮痍，不谋根治之策，反而不顾一切举债扩军。他的策划是“截军事之强补经济之短”，时机一成熟（他名副其实地拥有一支百万雄师），便动武强行掠夺他国的财富。

科威特只有2万5千个士兵，战斗力与胡申精锐的共和国卫队根本不能相较，科威特成了伊拉克第一个要吞噬的对象，毋宁是必然的。如果侵占科威特“顺利”（应该说面对的国际压力没那么大的话），沙地阿拉伯这个国富兵力不强的国家可能会成为胡申的下一个要掠夺的目标。

我们现在评议科威特富国而不懂强兵，是事后孔明于事无补。不过，从一个国家的覆亡（当然大家都看得出来科威特复国的机会甚浓），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宝贵的教训。

第19省：收复失地？

胡申指责科威特酋长萨巴赫是个淫虫，大小老婆有几百个，言下之

意，有“这种淫棍人人得而诛之”的意思。这种指责其实没什么意义。胡申本人的后宫佳丽，又岂会少过萨巴赫？这不能构成兴兵的理由。至于说科威特以前是伊拉克的领土，现在兴兵是“收复失地”，也是强词夺理。不错，在13世纪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曾把伊拉克、科威特都并在其版图内，如果因为这样科威特就成了前者的第19省，那么土耳其岂非可以堂而皇之地说伊拉克也是它的属地？

伊拉克要对付科威特，纯粹是觊觎对方的财富，想据为己有。而科威特的富庶情况只要看它的教育制度即可窥见一斑。科国人民，从小学、中学一直念到博士，一律免费。在籍学生除了免费读书，还可拿到政府优渥的津贴。许多科威特的年轻人，领取了政府的公费加上津贴，并没有认真念书，终日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科威特的有钱佬实在太多了，他们位居工商界要津，坐冷气间，驾名牌车，平日职务只是签签支票文件，出席会议，粗重繁琐的蓝领、白领工作则由外国人卖命。这也是为什么外国员工的总人数比科威特人口还多的原因。

科威特商贾，多的是只懂坐享其成，不事生产的家伙。由于科国政府限定商业执照只能发给国家公民，外国人不能沾指，不少科威特人申请到执照后便转给外国人经营，说好四六分账或五五分账。别人辛苦赚到的钱，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拿个4、5成。这情形与我国过去相当流行的“亚里峇峇”联营模式，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石击卵的一战

科国人生活优裕，饱暖之余自然会思淫欲。科威特是回教国，酒色征逐不便在国内明目张胆进行，解决方法是每年出国3、4个月到法国、丹麦、日本、泰国这个地方去“公干”。科威特有这么多人过著这么糜烂的生活，一旦面对外侮，那能不迅速战败？科威特在24小时内全境失守，很多人都感到诧异，“怎么这么不济事，起码也可顶几天吧！”了解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勇悍以及科威特军力之窝囊，便会懂得这真的是以石击卵的一战。

193

科威特的亡国经验是居安不能思危的明证。从一个家庭，到一个社群，到整个国家，居安不能思危，都可能因为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而崩溃瓦解。强大如罗马帝国，骄奢淫逸而终于亡国，科威特人少兵弱，钱财又到处露白，想不惹祸，难矣！科威特的经验或可给我们若干警惕。

18.2.1991

密宗：业障转化

坊间有不少杂志把密宗渲染得神乎其技，诡异神秘与邪教无异。其实习密端在意志焦点之集中，精神力量的提升。密宗修到高层即成“大圆满”，而那正是禅宗的境界。

社会愈文明，人类面对的困扰愈多，这现象反映了文化本身的吊诡性。人们追求真知、真理，希望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和超越，这历程会碰到不少障碍物，这种障碍是“我执”，也是“无明”。

当人们尝试用打坐的方式去祛除妄念，求取内在的统一时，他会发现思绪是最难控驭的，人愈想统一自己，愈是被分歧的力量所拉扯；他愈想统一万物，与大自然万物融浑成一体，他愈容易被众多矛盾的思想将他和他个别事物区分开来。他会感到极度的烦躁不安。初习打坐静修的朋友相信都有过类似的经验。

业障如毒物

面对这些障碍，犹似面对有毒的花草（当然这只是一个譬喻）。面对有毒的花草，佛教小乘（Hinayana）的态度是“戒畏”，也即是远离这些毒物，不要看它，不可沾惹它。小乘行者有他们须遵守的清规戒律去避开这些障碍。

而佛教大乘（Mahayana）的教诲是毒物虽然有毒，我们仍可接近它，只要我们知道怎样去解毒，而解毒剂端在对“空性”的体验。大乘行者排除业力（Karma）的方法是从“非有”——也即是对事物“非真实”的体验中，使业力消弭于无形，就像溪流归海了无痕迹，雪落雪地，确曾发生，其实是什么都没发生那样的浑然。

佛教密乘（Tantrayana）面对业力，却一无惧畏，他们既不逃避，也不依

凭解毒剂防身，而是接近它，消化它，进而转化它。大乘是“即烦恼即菩提”，而藏密宗则是“转烦恼为菩提”，重点即在“转”这个节骨眼上。

业力转化

笔者替朋友谢川成斗数论命，根据命盘所示，他目下的大限（从26岁到35岁）空劫独坐，三方不见禄，有钱财损失，感情挫伤之虞。

我没法替朋友消灾解难，也没化凶为吉的神通，筹思良久，觉得纾解之道仍在密宗的业力转化一途。斗数载于“道藏”，而内容却有不少佛家的因素，应可相行不悖。于是我向川成建议：“利用这10载时光，做学问，多创作，不要投资做生意，并且早些把自己的感情生活安顿好。”川成听后颌首，似有所悟。

接下来的日子，我目睹川成买下一栋房子结婚，然后替一家出版社编教科书，每天作息定时，“不求闻达于诸侯”，却又能自得其乐。这种把凶曜的负性力量消化，转化为正面的用途，正是密宗应对业力的有效法门。

疲打的一代

文明的压力，产生了本世纪的“焦虑的一代”、“失落的一代”这些“疲打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我们看到嬉痞士的出现，LSD的流行，性欲的泛滥。存在主义救不了他们。认识到人生的荒谬性而无法作出超越，正是许多知识人的共同精神困局。

20世纪的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疏离现象。许多人诅咒这种文明，甚至以反建制或其他更激烈的手段试图摧毁文明的现状。其实这种种过激反应，只会带来毁伤，带给人类世界更大的混乱。“创世纪”第6章预言人由于本身的罪愆，结果造成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最终灭绝。人类果真会上这条自我毁灭的路吗？这是所有关心人类未来的人萦心之念。

西藏密宗的大手印一系，认为面对文明的繁华与混乱，纾解的法门

是：如婴儿观佛殿。

婴儿观佛殿

我们知道西藏佛寺，不仅外观宏伟堂皇，内里的佛殿还装潢得美轮美奂，金壁辉煌。对于一个婴孩而言，他对佛殿周遭的瑰丽装饰，雄奇的佛像，五彩斑斓的壁画固然无比好奇，但这种好奇并没有沾上世俗的种种偏见。婴孩只是好奇，喜欢观赏，对新奇绚丽的装饰自然地流露一份赤子的仰慕之情。稚子无知，因此亦无所执。

面对繁华多变的人类文明，如果能以婴儿观佛殿的态度去对待，就不致于产生对抗，破坏等种种负性的思想与行动。

循序渐进：证量

坊间有不少杂志书刊，把密宗渲染得神乎其技，诡异神秘与邪教无异，其实习密端在意志焦点的凝集，精神力量的提升，密宗修到高层即成“大圆满”，而那是禅宗的境界。

习禅与习密不同处在于，禅修一心，习密却得按部就班，结印、坐定、持咒、加持、祈祷、观想等许多步骤或“阶梯”。一个人穷一生岁月往往只能臻至某阶梯，无法再跨前，但每一级的修持却有每一级的证量，修行者会享受到不同层次的“法乐”。至于密乘行者会否具备神通则是个别的造化。习密与学习其他学科，基本方法并无二致，都是循序渐进以致于豁然开悟。坊间把密宗与黑巫术并列，那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5.4.1991

复古潮流的社会诱因

社会成员眷恋‘过去’的程度，往往与他们对现实的不满程度成正比。

符号的复制：重温旧梦

我对1988年以降，国内时装，店面装饰的复古倾向一直十分留意。这种复古趋势，港台虽也有些迹象，但比较上还是个别的喜爱，而不是有代表性的风尚，像刘嘉玲就常穿仿古服饰，但这只是她的个人偏嗜，而不是香港的时装潮流。

大马的情况不大一样，我认为国内的仿古、复古趋向大约是在1988年蕴酿，并在1992年农历新年的前几个星期“煞有介事”的流行起来。

时间流逝，没有人可以重拾曩昔的时光。我们没有时间机器，生活在90年代的我们无法遁回30年代或50年代去。但时间流动也不是完全没有留下痕迹的。在某段时间里（通常我们会说“某个时期”），某种特殊的发型、某种款式的服装、鞋子、器具，甚至当时电影的化妆特征，便是那段时间所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其实是一组有其文化意义的符号，代表或反映某个过去的年代底风貌。

人们虽不可能在形体上回返过去，却能凭著上述符号的“再制”（你也可以说是“赝制”）所营造出来的氛围让身处其间的人得以重温旧梦。吉隆坡的万隆百货公司以“旧情绵绵”为主调搞新春促销，该公司的美工人员把油灯、旧木梳、旧收音机、老式手提包、50、60年代的电影明星人头照，双妹牌花露水、儿童乐园封面设计，珍珠片作装饰的T-Shirt，滚边宽袖的仿古“时装”摆置在一起，并且不断播放周璇、吴莺音、白光等人的旧歌，努力去唤起人们30年代至60年代的记忆。另一间百货公司美罗则以老式针车、旧电话、旧热水壶、烛台、面盆、木屐、旗袍、衫裤为摆设凸出东方情

调与5、60年代的“时代感觉”。

时间的乡愁：心理认同

是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复制出某个过往时期的“时代感觉”。“感觉”这两个字眼尤其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那是精神和心灵层次的抽象事物，它的基调是浪漫的。时代感觉往往是事物加上气氛所携给我们的心灵悸动，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异样的悸动称为“时间的乡愁”。

重要的是，“时代感觉”可以成为文化和心里认同的对象。从商业战略来看，“时代感觉”因为可以挂在消费人的嘴边而成为热门话题，故此它可以形成企业促销的热点／主题。像前面我提过的万隆与美罗便是利用这卖点，销售具有30年代至50、60年代设计特色和东方风味的仿古服装。我要在这儿指出的是，这些仿古服饰的设计人其实无意“售卖历史”，他们明了没有那位绅士淑女是带著买古董的心情去购买衣著的。仿古服装或复古服饰无非是今日流行的设计加上宽袖高领、绸缎滚边、肚兜图案，古色古香的纽扣，把新的设计概念和旧的款式结合在一起的创意游戏。而万隆和美罗的复古并非是孤立的个例，在吉隆坡众多的购物中心，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不同的复古方式和表现（Lot 10底层的假山、曲桥、泥塑、石墩岂是随意摆设在一起的！），这股复古潮流，征示了什么？或者我们应该问，这样的复古趋势反映了华社的那种处境与心态？

怀旧的情绪：消费软体

真相往往令人难堪。社会成员眷恋“过去”的程度，反映的正是这些成员对“现实”不满的程度以及对前景感到茫然的程度。愈是不安稳、前途难卜、价值混乱的环境，愈能产生强烈的怀旧情绪。最近一位在吉隆坡做竹帘（也卖木帘）的厂家黄桢修先生告诉我，竹帘和木帘的市场需求这一年来不减反增，有求过于供之势。他对商店门饰的复古倾向“感到惊奇”。古风

能够刮起来是有它的社会心理因素和群众基础的，今日华社面对的困难重重，内外交煎，形势窘迫，50、60年代的稳定、平静、简朴，反而是大家缅怀与认同的对象。任何地方都有人特别喜爱某个年代，这或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陈凯希先生开的“百老汇”夜总会有一批常客在捧场底原因。这些常客在“百老汇”的老歌气氛里重温30年代到60年代的旧梦，并且乐在其中。也许“百老汇”只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它反映的只是一小撮人的“时代偏嗜”，不足为虑。但今日种种迹象都显示，近似百老汇的怀旧情绪正迅速扩散、弥漫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而且形成“消费软体”，我们是不是应该就这个社会有这么多人由于感到失落、不安而需藉“历史”（或过去的记忆）以寻求自我的慰藉这现象提出诘问和深思呢？

26.2.1992

文化社区：总体营造

重新为文化街定位，见证了后现代的颠覆性，也让我们见证了这种颠覆后面的文化社区总体营造的决心。

本世纪末的最后一个中秋，南洋商报联同大将书行、商务印书馆、O.U.咖啡座在文化街演出一出“世纪末的华丽”，把本世纪初的人事人物带到观众眼前，让人恍似置身于旧上海滩的十里洋场。看惯连续剧的会联想到许文强与冯程程；熟悉历史的也许会联想到杜月笙与赛金花；爱好文学的可能会联想到胡兰成与张爱玲。华裔族群的文化想像既有复古的意图，也有虚拟的倾向。

对于驻足旁观的外国人，文化街的中秋夜是一场文化杂耍，没有固定的舞台，不必按编导的意思走位，对白来去总是那几句寒喧，即兴式的挥洒，有时也可以造成与观众的某种互动，但都点到为止，原因是群众还不习惯像泰国人参与泼水节那般融入，他们宁愿像驻足于停车场不远的外国人那样，以一个“他者”（Other）的身份来看眼前这出好戏。

他们的镁光灯闪了又闪，摄影机记录下来的是异国的风土人情。照片里的映象肯定比明信片上面那些呆板的景观出色生动许多。对于他们，东方充满了的是难以解码的文化图象（icon），深邃幽秘，引人遐思。

对我这个隐匿而关切的文化观察者而言，我注意到女仕们眉目如画，鬋髻皆见，但不会去探究她们的发型较像周璇抑是阮玲玉，我更在意的是演出者如何运用大将书行那一带的空间，并且把它的潜能发掘出来。方位的空间不重要，处境的空间才重要。

世纪末的华丽

如果那晚平面的笙歌曼舞是明喻，立体的楼台怨女是暗喻，我要探索

的是，把朱天文的小说《世纪末的华丽》“在地化”(localised)，成为“文化街的华丽世纪末”底曲喻(conceit)用意为何。老实说，在细雨纷飞、夜凉如水的文化街场，粥一般的灯光在漫漶，我解读、体会到的世纪末沧桑，远甚于世纪末的华丽。主办单位之一的商务印书馆，本身拥有43载的历史记忆，却以“记忆回收”的方式征求百年老照，是在嵌定记忆吗？这样做是历史(Histoire)的再发现，抑或是今昔参差对照，目的在于演义另一则文明的故事(histoire)？

与我同行的香港友人说，或许我们可以从“想像的乡愁”(imagined nostalgia)的角度去切入、诠释这个中秋夜聚。朋友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可能察觉到这出文化表演欠缺深度。他大概是正确的。只是我的考量向度与他不一样。我更重视文化街这个空间所开展出来的时间变化，以及在迎接千禧的时间关口，文化街这个场域的空间变化。先要闪电才有雷响。先让文化街带给群众历史的（也即是时间的）讯息，才能在这跨世纪的当儿（又是时间）锁定当前这空间建构自己的文化城邦。

神话建构的企图

其实这种类似以小说的虚构去建构吉隆坡的另一则神话的企图，在两年前“今夜不打烊”的嘉年华会(carnival)上已初露端倪，近期Ou咖啡座的开幕，粤剧伶人与男高音陈容的街头演唱那种多声部并置(syncrisis)，中秋过后的每个星期天的“假日走廊”(街头演出)，都可看出主事人的企图心。傅兴汉把戏院街与肃杀的警察局街(Jalan Balai Polis)一带，重新定位为文化街这一举措，见证了后现代的颠覆性，也让我们看到这种颠覆后面的文化社区总体营造的决心。邻近的百年陈氏书院是一个象征，文化街这个场域的16家大小书局（各类书摊不算在内）才是文化街的硬体建设。这些条件使文化社区的塑造/建构在唯利是图、熙熙攘攘的吉隆坡成为可以实践底梦。

我提到“梦”这个字，是有渊源的。两个月前，傅承得在一封电传信件说：“兴汉和我都在做梦，并且付出不少社会成本，老师您也有做梦的条

件……。”看来织梦真的不简单，虽然我们不一定要把话题扯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那么自我膨胀。

我同意朋友的另一项观察，复古、拟古都是庄谐体(serio-comical)的历史模拟，让看热闹的与看门道的都能受落。我想补充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紫藤三杰（加上古灵精怪主意多多的林福南）显然有这计划以文化动员的声势，把市井的力量、知识界的力量、文化艺术界的力量整合起来，在文化街开辟出一块人文舞台。

据我所知，大将事业社的编辑部近日自惹兰燕美移师大将书行楼上，而“变革厅”则继续充当文学与工商管理学的讲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许这些民间谚语正道出了一个文化格局当前蓄势待发的态势。吉隆坡有不少的“自由流动资源”（余英时教授把知识份子、文化人都冠以这称谓），如果文化街的宏图可以开展，吉隆坡不仅多了一个自我塑就的文化社区，更重要的是，其他文化创业者可能监于此一个例的成功，刺激他们跟著上路。由于商务历史悠久，大将充满新锐之气，强势媒体又能配合，所谓得道多助，我有理由相信，华社内部的文化呆滞现象有望作出点与线的突破。

温任平在知识和观念上能不断保鲜，尽管这些篇什都是大约10年前的旧作，间中社会与文化环境不断变迁，细心的读者决计不会有吃馊饭的感觉。

这些文章使我想起Roland Barthes一系列以Mythologies为总题的短文，Umberto Eco后来也有类似的发挥，学理哲思都很“后现代”，是晚近西方文化界少见的佳品。这个联想不是比较，那样说将是不伦不类，我只是觉得马华文化界应该有人做这种小事、写这类小文章，剖出事物的精灵，描出情境的脉络。

——张景云

我对自己的了解是，我有不务正业(如果文学是正业)的倾向。从“特约评论”题材内容的庞杂，读者即不难窥见一斑。从创意促销到密宗修行，从劳资利益到经验工业，从演讲做秀到饮食文化，都是我有兴趣探测的场域。吾非通才，却常有逾界的企图与野心。

——温任平



大
特
观
上
04

ISBN 983-9768-38-7



9 789839 768381